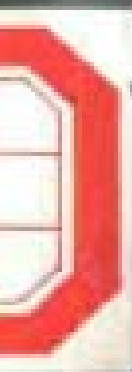


我对历史的看法

黎东方史学丛议



HAIWAI XUE ZHE WEN CONG

我对历史的看法

黎东方史学丛议

学林出版社



外学者丛书

关鸿 魏平主编

K03
L105

我对历史的看法

——黎东方史学丛议

作 者:黎东方

特约编辑:胡宗英

责任编辑:张建一

装帧设计:沈兆荣 周剑峰

出 版:学林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上海天华印刷厂

版 次: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9

字 数:15 万

印 数:5000 册

定 价:13.50 元

ISBN 7—80616—335—2/I·160

138198

d

出版缘起

中国几千年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曾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特别是时光进入 20 世纪,在中西方文化冲撞与交融的大背景下,更是涌现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们才思横溢、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建树颇丰,从而又大大丰富了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使之独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批学者中的有些人长期侨居和治学于海外,造成大陆读者对他们的研究成果、治学生涯及本人的学养、处世了解甚少。为此,我社决定推出“海外学者文丛”。诚然,我们并不赞同其中一些学者对中国政治的某些态度及本丛书中的部分学术观点,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他们的学术文化成就的认同。唯其如此,作为了解和研究中国 20 世纪学术文化状况和学者风貌的一种补充,本丛书自有独特的出版价值。鉴于大

F661/58-13

陆在当今语法体系等方面与海外的习惯有些不同,因此,在编辑过程中作了少量删节,特此说明。

学林出版社
1997年1月

卷首语

黎东方原名智廉，祖籍河南，1907年出生于江苏东台。其父黎塗字衡平，清末举人，仕于江南。

他先受母教，诵读经史。后入小学，九岁从师习英文。稍长，负笈远游，就读于上海南洋大学附中、北京清华大学，专攻史学，为梁启超最后及门弟子。后又游学巴黎大学，从名师学习史学和哲学，专修法国大革命史。1931年以所著《比列志士记》获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随后即回国，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主讲历史哲学、法国大革命史和西洋通史。其高足有夏鼐等人，卓然有成。

“九一八”事起，他因支援东北义勇军，不容于国民党北方当局，乃仓促南下，转任广州中山大学。后又应教育部长陈立夫之请，至重庆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工作，兼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常务委员。抗战期

间,除继续执教,时应各地之请、为各界人士讲演历史,通识古今,激励抗战。他擅长讲演,有雄辨之才,能深入浅出,绘声绘色,发前人所未发,听众闻所未闻,场场座无虚席,一时传为佳话。

抗战胜利后,他应赛珍珠之邀赴美,助编《亚洲杂志》,未及就任,又被福尔蒙州大学聘请创办远东学系,此举为全美大学最早者。

1948年归国任贵州大学历史系主任,1949年再次赴美。在美国和台湾续任大学教职。一生的学识经验,积而为讲史之学,几十年如一日,蜚声士林,欧美争聘。

他在著述之暇,曾多次用英语在各大城市作公开演讲,弘扬中国文化,不亚抗战时之谈笑风生。他身在海外,情系宗邦,念念不忘归根,以八十五高龄撰写《我们的根》,使在欧美出生的华人后代及海峡两岸的中华儿女认识我中华民族如何缔造了大好河山和优美文化,其一片真挚的爱国情怀,令人肃然起敬。

他已出版专著四十余部,其中《世界联邦论》等法文著作,《东方分析》、《第二次中日战争》等英文著作和《中国历史通论》、《西洋通史序论》等中文著作。本丛书所选《我对历史的看法》是东方先生最有影响的著述之一。东方先生还特意为此书的大陆版作了增补修订,撰写序言,我们深表谢意。

弁 言

由于萧关鸿先生的鼓励及学林出版社同仁的热心,我这本《我对历史的看法》获得以简体字版见正于大陆史学界之机会。原版的几篇文字,也藉此机会酌量改换,去掉无关宏旨的,改用与整个中国历史有血脉相连的几篇。谢谢天风社的林太乙女士,台北商务印书馆的张连生先生,华欣出版社的程国强先生,黄埔出版社的章文仪先生,正中书局与远东书局的浦家麟先生,文化大学出版部的李福臻女士,远流出版社的王崇文先生,与传记文学社的刘绍唐先生,我永久记得他们在过去与现在对我种种协助。我尤其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崔美明女士把我介绍给萧先生。

目 录

目 录

卷首语	1
弁 言	1
我对历史的看法	1
中国文化之历史的分析	14
孔子传略	26
战国秦的发展	95
楚汉战史	99
三国战史	136
淝水之战	169
一个拚命的留学生玄奘	174
王安石	187
耶律楚材	199
张居正	210
吴三桂觉悟经过	225
八国联军与辛丑和约	234
武昌起义的完整史实	257

我对历史的看法

因为我是一个学习历史的人，同时又是一个三民主义的信仰者，便有几位朋友，要我写一篇关于民生史观的文章。在这里，我应该提起逝世已久之纪云樵同志，当我还在法国读书的时候，他就已经从革命高潮笼罩着的南京，写了一封信给我，勉励我在这一方面努力。现今时隔近二十年，而我的学业依然无甚成就，这是我引为十分惭愧的。

一直到了今天，我依然不敢以民生史观的标题来写一本书，或是一篇文章。这由于我关于历史的书籍读得太少，关于历史的内容又观察得太不充分，并且总理孙中山先生所留给我们的论及民生史观的遗言，又如此的简括，令一个仅获见总理一面而未能亲承教诲的后生如我，不敢于许多不明了的地方妄加揣测。因此在今天，我只敢写一些我个人对于历史的看法，

不敢说这就是民生史观。

严格地说,以我的学力而论,我配不配已经有一个看法,根本也成问题,只是权且写来,作为一种读书报告罢了。

所谓历史,普通只是单指人类历史而言。若就广义的字义来说,则凡是宇宙间一切曾经有过的现象,都可以称做历史。

这便是历史一词的真义。它是过去了的,它是杳然不可捉摸的。史料仅是它的残骸。我们凭藉一点点史料,来写历史,或讲历史;无非是按照我们从“现在”所得的个人经验去想象“过去”的情形而已。

况且我们每一个人所能接触得到、体验得到的“现在”,也极其有限。我们连记录一部现代史资格都没有,焉能写出人类全部的去,或甚至把握整个宇宙的去,以探寻其中进化的轨迹?

诚然如此,困难尽管困难,人们追求理解的欲望却随着每一时代哲学与科学的进步程度,而时时表露出来。远在西洋有正反合的历史解释以前,中国就已经有了一治一乱的见解。在西汉我们又有过五行相生相克的历史观。

到了 20 世纪业已过了一半的今天,各方面的进步已经不容许我们再从一个先定的原则出发,以演绎的方式去推论各时代的历史发展。我们似乎只有采用归纳的方法,先集中一切可能有的材料,加以分类与标明,求得其中的同异:从同的里面找出一些原则,再把所异的地方加在那些原则里面,作为制限。

如此的方法虽未必即能给予研究者以正面的结果,却能在消极方面先打破若干错误的成见。五行相生相克之说姑不必论,一治一乱的说法就立刻显露了它的破绽。我觉得治之日短,而乱之日长。人们惯言商代有五治五乱,我觉得在商代三十一位天子之中,若仅有成汤、太甲、太戊、盘庚、武丁五朝是治世,则其余二十六朝便是乱世。商代应该称之为五治二十六乱。汉唐两代,比较地可以称为盛世,而按其实际,前者仅有文景之治,后者仅有贞观之治,为时均不甚长。西洋的历史亦复如此。所谓罗马帝国,也仅有安东尼一代可以称为黄金时代而已。至于一分一合的说法,也是分的时候未必相等于合的时候。倘若所说的合,是指的中国之“本部”,则夏商西周为合,春秋战国为分,秦汉为合,魏晋南北朝为分,隋唐为合,五代两宋为分;元明清又合。究其实际,则合中有分,分中有合。我们即便承认此一治一乱与一合一分的公式,包含有一张一弛的真理,也得不到什么实际的教训。因为倘若我们是处在某一“合”的时期,我们并不能预言究竟要再经若干时日,又入“分”的阶段。

这一治一乱与一合一分,可以称为历史的两分法。正反合的说法,便可以称为历史的三分法。就内容来看,三分法似乎要充实得多。三分法说一切的制度与文化,都要由正变为反,由这个东西变成不是这个东西,末了又变成兼有这个东西的原来成分与反于这个东西的新的成分。这比起一治一乱、一合一分、循环主义的旧看法,当然是进了一步。然而人类历史

之中,也确包含一些循环重演的现象,又包含一些昙花一现,正而不反,或反而不合的东西。进化本身,实在没有正反合三字所暗示的那么整齐。

在我们中国,还有另一种四分历史的办法,便是穷变通久四字。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久则穷。我感觉到它的内容,比起正反合来,又要充实一些。它而且不是循环主义的;第二个穷字是变了以后的穷,是另一制度的穷,并非原来制度的穷。这似乎是很合理的进化过程。问题在于:穷的时候未必能变。是谁来变?是制度本身会变?还是有人来将它变?既是要靠人来变它,人也许有时不懂得,或不愿意来变它呢!

五德终始或五行相生相克之说,未尝不是一种历史的五分法。可惜它以金木水火土来与历代的祥瑞相配合,未免太牵强。金的确能克木,金也的确可以称作“为土所生”,但这似乎是一种“数学”,而不容易引用到历史上面来。

狭义的历史既是专指人类的历史而言,则人的成分自然不容忽视。倘若历史的本身会变,而人类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则此种变的背后,若不是上帝,定为一种支配宇宙间任何变动的“总原则”。截至现在为止,此“总原则”还没有被人们发现。

退一步说,我们在没有发现它以前,姑且承认它有;它所支配的历史,是谁的历史呢?是宇宙的历史,而人类的历史包括其中。

· 可惜我们已知的宇宙历史,实在是太少了,还不

能从宇宙史与人类史的比较之中,求得若干共同的现象。我们仅能知道,由星云而产生太阳,分出地球,造成太阳系;在地球上,先有火,后有岩石,后有水,后有生物;在生物之中,先有水生之下等动植物,后有登陆之较高等动植物,先有无脊椎动物,后有有脊椎动物,最后又有人类。这样说来似乎全是顺利的发展,却完全是一种乐观的看法。其实如此的发展,包括了不少次的挫折,又依赖了无数的不可预期的“巧合”,才偶然侥幸而有如此的结果。老实说,人类之所以能够产生,能够存在,能够进化到一跃而为万物之灵,也的确是侥幸。

这侥幸或“巧合的作弄”也许便是宇宙间一切变化的总原则吧?那又未免太近于悲观了。真正的总原则,似乎便在那侥幸与不侥幸之间,靠巧合与不靠巧合之间。

我们所谈的历史,毕竟是只谈人类的历史。那支配一切的总原则如果存在,当我们专谈人类历史的时候,也应该先支配了人类,再表现到人类的历史上面来。撇开了人类本身,人的本性,来解释人类史的变化历程,等于撇开了李鸿章,来写一本李鸿章的传记。这实在是荒唐得很。

有些人,专就地理的因素来解释历史,有所谓地理史观,认为地理的环境,足以决定历史上的变化。若说地理环境关系很大,这原是很合理的:例如草原地带,容易产生游牧大帝国。但是我们决不能说,凡是草原地带一定产生游牧大帝国。一定要添入某一

帝王的野心与能力,以及多数能征惯战的拥护者,与足供侵略征服的若干比较无能的四邻,这才可以出现一个大的游牧帝国。

较之地理史观略高一筹的便是经济史观。经济,是人类的经济:这似乎以人类自己的情形,来解释人类的历史了。可惜经济史观的理论家常常偏到制度方面:认为制度的变化足以决定人类的变化,不曾晓得制度本身原是由人所造。

倘若我们真愿意先研究人类本身,再研究人类的历史,而研究的时候又能忠实于归纳法,则我们便可以得到类似于下面所列的结论。

人类在求生存的一点上,实在与其他的生物没有什么不同。人类为什么要求生存,何以知道求生存?那么,动物何以都要知道觅食,要求偶;植物何以要知道要吸收日光水分,要开花结果?中国的圣人说,“食、色,性也”;又说,“饮食、男女,人之大伦也”。这真是基于宇宙论的一种颠扑不破的真理。

人类在求生存的过程上,初则以小群各自为战与异类的动物相斗;等到生齿日繁而自然界的供给有限,便免不了互相争夺,发生同类相残的现象。这在动物之中,如蜜蜂,如蚂蚁,也未尝没有。

所不同的,似乎是人类特有一种人性。这人性细细分析起来,也并非上帝所赋予,而是长期的对毒蛇猛兽、敌族敌国的战斗,所养成的一种同仇心与互助习惯的发展。

随着人生的发展,我们看到人类求生存的方法,

是一天一天地进步。初则各人仅顾一人一氏族之不被杀害,不遭饥饿,与不致绝灭,其后逐渐扩大范围,图谋一部落,一国家的共同生存。于是政治的组织,跟着血统的组织而成为必要;种种工具与武器的发明,也逐渐地加速加多。等到有了文字,一切的经验都得到堪以累积的基础。而人之所以为人,便迥非蜜蜂、蚂蚁之流所能望其项背。

此后的人类,便是有“史”以后的人类,较之有史以前的人类,在生活的内容上骤然丰富起来。从暗中摸索的“动物群”的生活,一跃而进于有理性的生活。单就时间来说,自从文字发明以来,离开现在,还短得很,差不多仅是昨天的事,至多可说是一万年而已。(中国之已知的文字史料,始于商朝,仅有四千年左右;埃及的历史始于公元前4241年,亦仅有六千年左右;假定图形文字的发明又早于此,也不过一万年左右。)倘若人类果然是诞生于二百万年以前,则我们写一部二百页的人类史,便仅有最后一页的下半页,可以填入几行文字,足见人类史可写部分之短。

在如此短促的半页文字之中,要看出如何正确的大道理来,原不是件容易的事。况且有很多民族,一盛而永衰,一兴而永灭,留下来的痕迹很少。单就现尚存在的若干民族而论,由于语言文字的极度纷歧,我们也很难完全了解每一民族的历史,以求得彼此间的异同,与整个人类的进化经过。

姑就中国与欧洲这两大区域的局部进化,来加以分析,人类的历史在有了文字以后,正如未有文字

以前一样，都是求生存的历史：所不同的，是组织的能力加强，分工的趋势加甚，而人性的陶冶也进步不少。

表现于中国的，在史前三皇时之氏族并立，五帝时之部族结盟，在史后有夏代之始有朝代，商代之始有畿领，西周之始行分封，中经春秋战国之纷扰，而结束为秦汉以来之大一统。大一统的局面，屡经磨炼，而终能存在、以确保中华民族的安全生存。

表现于欧洲的，在史前有克罗马尼翁等种族，在史后有希腊人及高卢人之城邦联盟及部落联盟，有罗马人之城邦帝国，日耳曼人之封建帝国，中经黑暗时期诸侯爵主之割据，而结束为偌大独立王国，演进为今日之若干由混合民族所组成的所谓民族国家，以分别保障若干千万居民的生存。

这是政治。其中又有不少关于制度方面的变迁：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内部的各项政权的分立或集中，法律的制定与执行，人才的登庸方式与黜陟方式、军队的招募、编配、训练、风纪等等。

再就经济的方面来说。人类能获得食衣住行四大需要的集体满足，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稍有能力的个人，要解决自己一人的问题，并不甚难：他可以采取渔猎的方式（在今天依然可以），或牧畜的方式，或耕种、贸易、制造，任一方式。他要解决一家的问题，就颇为不易。再进一步，一个民族的领导者或若干领导分子，要满足全民族的四大需要，就着实艰巨得很。原因不在于经济本身，而在于政治及文化。

要动员民族的力量,来共同解决全民族的经济问题,这就必须先有健全的组织。组织就是政治。要使得生产技术的进步能跟得上人口的增加,这就必须有随时都在进步着的学术。学术便是文化。

在中国,周期的旱潦之灾,与周期的农民暴动,造成了不幸的若干换朝代的内战。按其实际,这不是经济本身的周期恐慌,而是政治制度的周期败坏。中山先生很明白地指出,君主制度的缺点之一,为第一二代之帝王可以很贤,第三四代养于宫中,长于妇人之手,便不会很好,以后就只能每况愈下。我敢引申一句,帝王们因为是孤立而隔绝于人民的,所以惟有依赖宦官外戚,与宦官外戚为友。这些宦官外戚,就成为每一朝代的致命伤,而水利工程照例于开朝之时注重,于中叶以后不讲,造成人为的旱潦之灾。加上照例被弄坏的税收制度与货币制度,便自然而然地造成周期的农民暴动。

在欧洲,农民问题也常常变成很严重。它不是由于旱潦之灾(在欧洲没有黄河),而是爆发在土地分配的不均上面。雅典、斯巴达、罗马,均曾因此而发生内战,以罗马为最激烈。到了中世以后,除了偶有“水平派”的暴动以外,问题似乎由于封建关系的树立(贫富得以互相依赖)而稍见减轻,然而法国大革命就包含了不少农民求解放的成分。在此处,我们又不得不注明,法国大革命期间农民的情形与中国历次朝代革命的农民情形不同:在中国是民不聊生,在法国却是农民生活远优于当时欧洲的邻邦,革命思想的传播,唤

醒了他们争求彻底解放的意识。等到 19 世纪以后,工业突然发达,吸收了不少的农民,使得乡间的土地问题不再严重,把革命的重心转移到城市工人的肩上。

自从人类从渔猎社会进化到游牧社会,就已经有了初步的分工:一部分的人仍旧渔猎,另一部分逐渐愈多的人从事游牧。其后有了耕种,也就频添了逐渐愈多的农夫了,而渔猎者与游牧者的百分比就逐渐减少。至于贸易及制造两项,原本是自从渔猎社会以来就已经有的,到了商业革命及工业革命以后,也居然各自形成一大专业,先后成为商业时代及工业时代的社会中坚。如此的分工趋势,倘若不连带发生财富分配的问题,原本是值得庆幸的事。

少数人之占有财富,而多数人供其奔走,虽则是经济方面的现象,其实渊源于政治上的阶级。阶级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极古的时候,此一氏族以武力征服彼一氏族。马克思认为阶级仅仅是经济的,我不敢加以苟同。但是马氏认为近代之资本家,正是中古封君,与古代自由民之化身,确有独到之处。这正是说明资本家渊源于自由民,工人渊源于奴隶,经济上的壁垒渊源于政治上的壁垒,与鄙说颇为相合。

最后谈到文化或学术方面。这较之政治及经济两者,更能影响于人类的生存。工具的发明,武器的发明,耕种技术的改进,工业机器的制造,新的政治学理,新的经济学理,都是学术方面的事。仅仅列举这一些标题,已经可以看出,学术是如何地支配着政治

与经济的进化了。

我们所不可不注意的，是学术常由极少数的先知先觉来倡导，而多数的大众未必乐于奉行，并且不良的政治与经济，也常常摧残或阻碍学术的进步。

但是一个抱有救世心肠的志士，倘若本人是处于无拳无勇的地位，他的最好方法，还是先从学术入手。学术在取得别人的了解以后，有时也竟如风卷残云，顷刻而风靡天下。物理学方面的牛顿、爱因斯坦姑不必论，即就政治学理与经济学理来说，我们中国的孔子与西洋的马克思，实是极堪注意的例证。

我们离开孔子太久，亦许已经不能充分认识孔子的伟大。我们不妨将孔子以后的战国与孔子以前的春秋略作一比。先就小节而论，淫乱与弑君的情形就少得多。倘就大的方面来讲，孔子所想望的西周集权统一之治，到了三传四传的弟子之手，也毕竟实现。还有，他是主张教育平民化的一人，其结果使得布衣卿相成为可能，而秦汉以后二千年的专制政治居然包含了平民政治的成分不少，与西洋的专制政治迥然不同。

马克思列于孔子之旁，自然颇有逊色。但是他在百年以来欧洲工人中的地位，显然未可抹杀。他能够以一篇宣言，两三本书，造成纠缠不已的劳资纠纷，发动了两次国际工人的组织，亲自领导了巴黎的两次流血，又间接于死后鼓动成功俄国的大革命，使得一万五千万以上的苏联人民，奉他的一字一句为不可窜易的经典。如此的魔力，也确实值得我们注意。我们应

该承认(无论是赞成他的或反对他的),马克思这一位学术家,所受于他当时政治环境与经济环境的影响,远不如他自己所影响于身后的欧洲政治与欧洲经济的进化之大。

就在这一点上,又显露了经济史观(马氏自己学说之一)的破绽。文化既能影响经济,可见经济并非下层建筑,文化亦非上层建筑。

依我个人愚见,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彼此互为影响,难以分出孰为主从。倘必欲察别毫厘,似乎在最初的时候,人类的知识未开,经济的活动最关紧要。其次,人类互相残杀,人与人争的情形愈演愈烈,政治的组织便日求其坚强,也常常以经济与文化二者,屈从政治方面的要求。再其后,学术日益发达,逐渐领导人类入于共同征服自然的途径,政治与经济将要逐渐于学术的指导之下,入于合理化的境界。

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究竟是人类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活动的主人翁,是人类,不是无知的地球,亦非浑浑然的大自然。地球上某一局部的特殊现状,支配不了人类。大自然的适用于全宇宙的简单而抽象的定律,也解释不了人类的繁复历史。能够解释人类历史的,依然是人类自身的特性。这与一般生物的特性,在基础上没有什么两样:求生存。所不同的,动植物仅知为个体或有限的群体求生存,人类却逐渐发展到知道为全民族全人类求集团的生存。这便是所谓人性。一部人类的历史,正是人类逐渐扩大其团结范围,以共求生存的历史。

以上便是截至今日为止,我所能有的一种关于历史的看法,我很希望今后能有机会加以补充或修正。

(1943 年)

中国文化之历史的分析

中国文化是什么？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在史前时代的生活方式，与两汉时代的不同，与现在的更不同。因此我们不能说，中国文化是自古以来一成不变的。现在，我们要复兴中国文化，决不是要恢复史前时代的中国文化，也不是要恢复两汉时代的中国文化，或任何一个特定的时代的中国文化，而是把握过去若干时代我们祖先的经验精华，加上西洋各国以及日本、印度等国的文化之中的值得采取之处，配合当前与未来的需要，综合起来，发扬光大。这样，才是名副其实的复兴中国文化。

因此，我们不应该复古，应该考古、评古。考，是求真。单是考，不够。要评，评出一个好与坏来。好的，留下；坏的，不要。那些是坏的呢？一夫多妻、裹小脚、抽鸦片等等。那些是好的呢？做儿子孝顺父

母,当学生尊敬师长、交朋友守信用等等,很多很多。

今天,我对诸位讲“中国文化之历史的分析”,既非考古,亦非评古,而是就个人浅见所及,分析中国文化在历史中如何形成,如何变化,如何达到今日所有的形态与实质,藉供在场诸位以及场外有志于复兴中国文化的人士参考。

文化这个名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上似乎是与“德治”二字意义相同。“文”是文德,不是武力,更不是暴力。“化”是化行一方,化行天下。最成功的文化大师,是周公。周公的父亲是周文王。文王把周国化得叫虞芮两国的人见了,便不好意思再打官司。周公制礼作乐,化行天下。

文化成为英文 culture 的翻译,是鸦片战争以后,西风东渐的结果。英文除了 culture 以外,还有一个名词 civilization,译成“文明”,也有人把 civilization 与 culture 混为一谈,均译成“文化”。严格说来,就有了文字以后的西洋历史而论, culture 是精神方面的, civilization, 是物质方面的。我们却又把 civilization 分为两种,称之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其实,在西洋人看来,有了文字以后的精神文明不是 Civilization, 而是 Culture。

不过,西洋人也未必对。他们把有史以前,亦即有文字以前的人类发展情形,也称为旧石器文化(paleolithic culture)、新石器文化(neolithic culture)等等。那时候,精神方面的发展决不如物质方面的显著。

我们中国在史前时代,便已有过值得自豪的文明

或文化。我们的老祖宗“北京人”，在四、五十万年以前已经懂得用火。那时候，欧美两洲没有人，只有野兽。非洲有介乎猿猴与人之间的猿人，却不懂得用火。有些考古家说，北京人并非我们的祖先。我说，他确是我们的祖先。我们的上面两个门牙，和北京人的上面两个门牙同为播箕型。在北京人以后，山顶洞人以前，我们又有过一万代左右的祖先，他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旧石器，例如手斧、刮刀、槌子等等，制作得不比欧洲西部人的旧石器差，而比他们早，比他们古。到了新石器时代，我们有玉，他们没有；我们的彩陶比他们的漂亮。近东要到了铜石并用时代，才产生一些似乎比我们的更加漂亮的彩陶。我们的黑陶，又黑又亮，薄得像蛋壳子一样。他们也有，没有我们的多。我们的灰陶，有素的，也有拍花纹的，叫做拍纹陶。拍纹陶上的纹、图案，很丰富。

尧舜与夏朝，是属于新石器时代，还是属于有史以后的青铜器时代？这个问题，今天的考古家还不曾能够答复。就青铜器面论，我们的是世界第一。质量好，图案精，体积大。质量好，由于把红铜与锡配合得当。图案精，由于发明了“熔蜡法”。体积大，由于炉子大，火力强，可能又由于烟囱高，风箱够劲。

商朝不仅有美丽大方的青铜器，又有整齐美观的甲骨文字。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字如此整齐，不像是刚刚创行了两三百年的文字。由此推论，夏朝不可能没有，大禹也不可能仅仅是神话中的一个神，或传说中的半神半人的英雄。自然，夏朝究竟怎样，仍有待

于地下发掘。

商朝的一篇文献，盘庚，最值得宝贵。它告诉我们，盘庚之时的商朝政府，机构相当完备，盘庚之时的商国，不是一个小国家。盘庚的盘字，是写错的，应该是般字，意思是搬家的搬字。搬字的挑手旁。是很晚以后，也许是汉朝以后才被人加上去的。正如蝴蝶的蝴字，以前也没有虫旁。（请诸位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说，商朝的文献上已有“胡蝶”二字。）般庚，是一位搬家的国王，本名叫做庚，后世称他为般庚，以别于大庚、祖庚等等。

商朝又有六十天之干支周，与具有十三月亦即闰月的历法。西洋到今天还没有六十天的干支周，也没有兼顾到月亮圆不圆的太阳历。有人称商朝以来的中国历法为阴历，很错。中国历法是阴阳兼顾的合历，而且从商朝以来不断在改进，改进到清朝康熙年间，差不多已经十分准确。

周朝初年的青铜器，比商朝的更好。周朝中叶的反而退步，末年的却又好了起来，但作风大不相同。这个在青铜器方面的变化，反映了整个周朝的政治与一般文化。西周，真是郁郁乎文哉，领域虽则限于渭河与黄河中游下游，但是有制度、有礼、有太平。是的，在制度上是封建！封建并非绝对的不好。就它的时代效用而论，拿封建比封建，古埃及的封建与中古西欧德法英意四国的封建，都比我们中国西周的封建差得远。西周用封建的方法把文化的根苗遍栽于当时中国的四面八方的据点。

封建在春秋时期蜕变,产生了五霸、三桓,也产生了孔子。孔子本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向往周公,称许管仲,着眼于大同而下手于小康,想第一步铲除鲁国境内三桓的小割据,第二步铲除中国境内晋楚齐秦等等大割据。他铲除三桓的小割据,不成;周游列国,也找不到一个肯让他当伊尹周公的汤武;于是,回到故乡,透过教育,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与下一代以后的后世。他“有教无类”,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位以教育公诸平民的大革命家。他不仅是封建蜕变中的骄子,也是加速这蜕变,使得蜕变终于完成的人。他所教的是什么呢?是一套以伦理为基础,以平民政治为形式,以先庶后富,先富后教为步骤,以“有耻且格”为理想的政治哲学。他不仅教礼乐,也教书数,也教射御。

曾子、子思、孟子,是把孔子学说发扬光大的三个人。他们的《大学》、《中庸》、《孟子》,分别发挥了诚正修齐治平之道,以及民为贵,君为轻的平民主义的革命思想。他们三人固然是孔子的一传、再传、三传的弟子,固然都是以孔子的教训为出发点,却也每人加进了不少自己的心得,反映了自己的时代背景。严格说来,曾子或子思或孟子的思想不完全是孔子的思想。正因为如此,儒家哲学的内容才更丰富。

进一步说,倘若中国文化的哲学部份,仅有儒家一家,日子久了,也免不了显得单调,而逐渐衰朽。有了战国时期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与魏晋以后的佛家,对儒家批评、攻击、补充;这才充实了中国文化的哲学部分。儒家经过了这些考验而终于胜利;显现了

它的真正价值。

中国人到了两汉,差不多都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至少是在伦理方面。这并非偶然。然而两汉时代的普通的中国人,作了儒家,也未尝绝对舍弃了其他各家的可以受用之处。所谓可以受用之处,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就一个政治家来说,他可以外儒内法。就一个教育家来说,他可以外儒内道,或是儒道合一。一个学者,像董仲舒,被人认为是公羊派的大儒,却在《春秋繁露》之中兼有了十足阴阳家的、甚至巫师的风格。公孙弘是不是纯粹的儒家,更成问题。反过来说,制律的张苍也不能算是法家。到了东汉,马融郑玄该算是以训诂儒家经典为专业的醇儒了,然而他们是不是在思想上也是百分之百的儒家呢?倒是那无所不谈、无所不敢谈的王充,颇有孟子型儒家的气质。

两汉知名之士的表现,可谓五光十色,而谁也脱不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思想。一般的老百姓,都不反对孝,也都不反对仁义。这就够了,这就使得中国文化在两汉有了定型。思想而外,两汉的政治机构、经济活动、社会形态、文学体裁,甚至所谓正史的体裁,建筑、雕刻以及图画的作风等等,都达到了成熟的阶段而继续存在于两汉结束以后,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时。当然,这些都是只就大体而言。

换句话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自从两汉以来,有两千多年除了受佛教思想的渗透以外,没有多大的变动。西洋人之中的肤浅观察家,因此便说中国文化根本是不求进步,不能进步的文化。在中国也有若干人

以为中国文化与进步互不相容,要中国文化便不能有进步,要进步便必须抛弃中国文化,至少必须打倒中国文化之中的主要部分孔家店。他们说,文化无所谓国别,只有程度上的不同。中国文化是古代的文化,或封建的文化;西洋文化是现代的,全世界各地早晚都该接受的文化。

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两汉的中国文化定型能够延长到民国初年?有一种什么力量阻挡时间之潮,不让它被时间侵蚀、摧毁?中国人对于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文化,为什么比对任何一个长则两三百,短则三五年的朝代,更加忠心?是不是这个文化有深合于中国人的内心要求之处,有深合于任何一国的人,任何一个种族的分子的内心要求之处?简单言之,这个文化是不是根本合于人类的天性?

他们更应该作深一层的研究,研究中国文化自从两汉以来是否毫无进步,或进步得不及西洋文化多。论思想,它吸收来自印度、健陀罗与西藏的佛教,而且创造了自己的天台宗、禅宗;它把儒家的心与性的概念扩充

化商力、

续通鉴,若干部纪事本末等等,是不是也比得上正史体的史记、汉书?金石文字的研究,书籍真伪的考订,文集与诗文集的印行,地方志之相当普遍。这些,都是两汉以后,五四以前,史学确有长足进步的证据。论艺术,在建筑方面,西汉的未央宫尽管很好,唐朝的大明宫未必不如,而明朝在北平的故宫的确更好。在雕刻方面,北魏的云冈佛像、唐太宗昭陵的六骏以及明朝十三陵的翁仲,总该比得过东汉武梁祠的浮雕吧!在图画方面,汉光武的二十八将之像,究竟比唐朝画家所画的帝后之像如何,难以猜测,然而两汉的确不曾有过一个画家,比得上李思训、王维、巨然、夏珪、马远、倪瓚、唐寅、八大山人、石涛这些人。论音乐,两汉如何,也难考,至少也不曾有杂剧、温州戏、昆曲、榔子和平剧。

全盘西化论者每每说科学在中国不能生根。为什么科学不能在中国生根,他们不肯明讲。其实,他们认定中国文化犹如杂草,把土壤中的养料都消耗了,因此而种子栽下去生不了根。他们把科学看成为只有西洋才有,不知道中国从很古的时候起,早就有了科学,不仅生了根,而且长成了大树,发展成树林。科学之中最基本的一种是数学。我们中国的数学相当发达。18世纪以前的世界各国,在数学方面赶得上我们的,很少。天文学与数学有密切的关系。18世纪以前的各国,在天文学方面赶得上我们的也不多。谈到物理学,在牛顿出世的一年,中国明朝的方以智,出版了他的《物理小识》。谈到化学,我们在18

世纪以前也不比别人差。锑的提炼,比谁都早。硫黄与朱砂、水银,更是葛洪以来炼丹家朝夕把玩的东西。在工程方面,万里长城不是不懂工程的人所造得出来的。马钧的水车,也许是学自中央亚细亚,然而毫无科学头脑的人即使学也学不会。指南车,据李书华先生研究,和指南针没有关系;正因为与指南针没有关系,在机械发明的历史上它的地位更高。指南针在未与罗盘发生关系以前,便已被中国人装在小木鱼上,放在一碗水里,帮助航海。火药,可能在汉朝已有,但无论如何至迟在唐朝已有。医学进步到有了像华佗所用的麻醉剂,也不简单。《本草纲目》把药用植物分门别类加以个别描写与分析,也不能不算是科学上的一个里程碑。由此看来,科学在中国确是已经生了根。发明地震仪的张衡与著有《伤寒论》的张仲景是两汉科学家的代表。两汉以后,中国不断地有堪比于而且超过了张衡及张仲景的科学家。

18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在科学方面落后,在行政管理与司法程序上也落后,然而在伦理思想上不曾落后,在文学、史学与艺术上不曾落后。

中国文化早就有了基础。这个基础并不坏。换它,不必要,也不可能。想从西洋搬一个来,搬不来;即使搬来了,也放不进去,除非把已有的文化连根拔去,彻底捣毁。文化,非一座房屋可比。改建一座房屋,屋内的人可以迁出。倘若要把中国文化彻底捣毁,另换基础,重新建造,那么,在改建文化的期间我们中国人搬到那儿去?

鸦片战争给了若干中国人以刺激,于是产生以张之洞为发言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建议。这建议的本身并不太错。五四前后的人,说体用不可分开,要接受西学的用,就必须连体都接受。这句话也不太错。错的是:走向极端,说文化是整个的:要接受,便得接受全部。于是,出现了“全盘西化论”。首先主张这“全盘西化论”的,不是胡适,胡适并不赞成全盘西化论;而是陈序经。

陈序经和他的同调之士,从来不曾对西洋文化作过一次历史的分析。他们未尝不知道,西洋文化今古不同;只是为了偷懒及行文方便,以所谓“现代的西洋文化”作为概括的西洋文化的统称,于是民主与科学便成为他们的西洋文化的两大内容。他们忽略了基督教教义在西洋文化中的重要,也忽略了文艺复兴以来个人主义的思潮。他们最大的错误,是把英、法、德、美、苏俄这许多极不相同的文化混为一谈,而统称为西洋文化,要我们全部接受。试问我们怎么能够在接受全部美国式的西洋文化之时,同时又接受苏俄式的西洋文化?

而且,欧美各国的西洋文化,现今仍在变动之中,并未停滞在一九一九年不再变动、以便我们全文照抄。所以,不仅全盘西化不可能,连全盘美化、全盘俄化也不可能。

中国人在历史上一向是乐于接受别人的文化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一个例子。张骞把葡萄与苜蓿从帕米尔以西带回来,是另一个例子。此外,胡瓜、胡

豆、胡床、胡琴、胡椒，都是外国东西。花生、番茄、洋山芋，也都是外国东西。吃的用的以外，唱的也不少，是学自外国。例如，词中的菩萨蛮。宗教，更是来者不拒。我们中国人爱新鲜，只要是外来的，什么宗教都肯信：佛教、景教、牟尼教、回教、天主教、基督教。只有犹太教在表面上是例外。最近，在台北新生南路又有了一座巴哈伊教的大教堂。

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吸收西洋的各种文化，也不可能拒绝。在唐朝，我们已经让景教进来。局部的西化，可说是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鸦片战争以后，局部的西化加速加强。五四以后，更速更强。今日，最速最强。在座的诸位没有一人不是西装革履，我也是如此。这便是中国人不反对局部西化的极好的证明。然而在我们之间，没有一人像钱玄同一样，主张由政府下命令，禁止中国人说中国话，禁止中国人写中国字，看中国书，要所有的中国人改说英语、只写英文，只读英文书。这也证明了中国文化毕竟是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有自己的一套，虽则喜欢新鲜，喜欢方便，却也不肯忘本，不肯连祖宗都不要，不肯抛弃深合人性的儒家伦理，也不愿意妄自菲薄，说我们自己是根本不配民主、不够资格研究科学的民族。中国文化的历史告诉我们，我们有以仁爱为中心的伦理，以平民为主人的政治哲学，我们有生了根，长成了树，发展成了树林的科学。我们对西洋各国的文化，正如对日本、印度等国的文化，只须、也只能够，取它之长，补我之短。

总之，中国文化从历史上来分析，是一种不断在进步的文化，因此也是具有光明的前途的文化。

孔子传略

一、早年

西方人称呼我们的圣人为 Confucius。这个拉丁化了的人名,源自中文“孔夫子”三个字,亦即后世中国学者对孔子所用的尊称,意思是“我们所尊敬的老师”。

孔子的真正姓名是孔丘:姓孔名丘。

孔家是从今日河南东部的宋国,迁进来山东南部的鲁国的。(宋是公爵国,鲁是侯爵国。)^①

正如一般的移民家庭,孔家来到鲁国以后,一切必须从头做起。过了两代以后,有一位孔纥(字叔梁,被有些历史家称为叔梁纥),在鲁国的军队中有勇敢的表现^②,才获得了鄆邑邑宰的地位。鄆邑是一个小

城，在鲁国国都之南十个英里左右。

孔纥是孔子的父亲。他在孔子三岁的时候逝世，留下颜氏夫人、孔子以及前任夫人某氏所生的几个女儿与姨太太某氏所生的一个跛足儿子孟皮。

在如此情况之下，孔子和他的母亲自然很苦。她可能不得不让出在鄆邑的邑宰官邸，给接任的新邑宰居住。她于是因此，或由于别的原因，而搬到国都去住。国都的名字也叫做鲁，与国名相同。她在国都把孔子抚养成人。

孔子逐渐长成为一个很乖的男孩子，不喜欢玩一般小孩子所玩的游戏。他喜欢模仿成年人在公共场所或庙宇中所行的典礼。他喜欢集合邻近的若干男孩，手中拿了小型的想像中的祭器^③，两脚时进时退，鞠躬行礼，边跳边唱。

母亲教他读浅近的读物，也教他写基本的字汇。她没有力量送他进政府所办的学校去学习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她需要留他在家中，帮她做种种的杂务；也需要他在城内或近郊各地，作一些短期零工，赚一点小钱贴补家用。

孔子（虽则不能进政府学校），却也学会了全部六艺。他用自修的方式完成学业。他观察六艺的专家怎样做他们的事，也选择在这些专家脾气好的时候向他们请教他所不甚了解的细节，然后一一加以学习。

六艺是射箭，驾驶（军用与民用的）马车，书写，数学，音乐与礼。礼的内容很多，包括礼仪、礼俗、礼法。

孔子喜欢射箭，不久便成了有名的射手^④。他常

常练射。有一次，他在一家菜园子练射，来欣赏他的射术的人如此之多，他们站在一起，像墙一样（观者如堵）。

孔子的驾车技术也好，好得可以与任何有经验的军人相比。在他中年以后，有人嘲笑他样样精通而没有一样可以称为他的专长（“博学而无所成名”）。他用幽默的语气回答说：“我当年确是应该集中精力于某一行业或手艺，以取得专家之名。也许我可能选定了驾驶，作为我的专长^⑤。”（“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他的书法造诣更高。有一块石碑，碑上的铭文是依照他所写的字而刻。至于他的文章如何，我们只须略为一翻《论语》，便可以看出他用字何等谨慎，文体如何简练。

中国的数学，在他之时比算术略深一些；天文学也只是略具雏型而已。孔子学会了别人在这方面所能学到的全部知识。他在当政府仓库管理员（委吏）的时候，办到了把账目记载清楚。其后若干年，他能够指出政府的天文官员在历法上推算错误的地方^⑥。例如算错了日食的日子，或某个月的初一，朔日。）

在音乐方面，他开始是一位业余者，而终于成为一位专家。他差不多每一天都唱歌^⑦。（只有遇到因丧事或其他原因而哭过的日子不唱。）他会击石制的磬^⑧，弹七根弦子的琴^⑨，与二十五根弦子的瑟^⑩。他在一生最后的几年，把所有与《诗经》有关的乐谱都整理了一遍，使得“雅颂各得其所”。

“礼”在政府学校的科目表上,占第一个位置。它也是最难的一种功课,内容牵涉很广。孔子花了很多时间学这个礼。他走到庙宇和公共场所去参观典礼,也在日常生活中注意长辈的行为举止;他并且研究周朝的“礼制”(政治上与宗教上的制度),将这些礼制与夏商两朝的相比。

在孔子加深学习了礼以后,发觉礼不仅是一种规范,而且是一种保障。礼由于使得人们互相尊重,所以在事实上使得每一个人免于受辱与伤害,因此也提供了每一个人以稳妥的立足点^⑩,以立足于自己的家,自己的社会,自己的国家。礼本身不是伦理学,它引人进入伦理学。

很显然,公立学校的一般学生无须像孔子那样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在礼上。孔子所研究而学习的不仅仅是礼的实行,而且也包括了礼的理论。这个理论对于一个好人在家庭、社会、国家中所占的地位之各方面都有关系。

二、一座私立学校

孔子一面在教自己礼与其他五艺,一面继续做杂项工作以帮助母亲维持人口颇多的家。

他曾经先后在政府的一处农场与一所仓库当管理员(乘田;委吏)^⑪。他本可以在这两处的任何一处多留一些时候,以等待升至较高的职位。然而,他至多也只能升作当时鲁国层层叠叠的官制之中的一个

低级官员而已。

他的另一出路是参加鲁国的军队，像大多数其他的士一样。孔子属于士的一级，其地位在贵族与平民之间。（士原为武士；春秋以来逐渐兼任文职，到了宋朝以后才变成纯粹文人。）孔子倘若参加军队，凭他的射御两项技术，不难升到相当于父亲（孔纥）的官阶，到一个大小如鄆的邑去当邑宰。

年轻的孔子踌躇很久，发觉了自己的学习欲很大，永难满足。这种学习欲，难以与长期的文职或军职相调和。倘若能到几个男孩子的家里作家庭教师，或是叫这些男孩到他自己的家里来读书，他就可以有更多的闲暇从事研究，以解答他常常问自己的极多问题。

孔家后院子里面，有一棵大杏树，枝叶很多。孔子在杏树之下，用夯土筑了一座讲坛。遇到天晴之时，孔子就叫学生聚在坛前，听他讲书。天阴的时候，他叫学生进入他住宅，坐在他的周围的席子上。

就这样，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也是最伟大的一座私立学校，为孔子与他的学生所创始。而他自己与他的学生们当时都不曾觉得是在作如此的创举。

这座私立学校在好几方面与政府所办的学校不同。孔子收平民的子弟当学生，看得如同贵族与士的子弟一样。（政府的学校只收贵族与士的子弟。）孔子而且不限定学费的数额^②。每个学生依照他父母的经济状况，而酌量带来或多或少的谷类、麻布或丝绸（当时还不曾有大量货币流通，经济上的来往以实物为

主。)孔子对一切学生,没有任何(血统上或财力上)的歧视。

他而且对所有学生施以“个别教育”。在这一点上,孔子很超过了他的时代(个别教育的观念,在西洋的教育史上是到了20世纪才有)。他对每一个学生,给以单独的教导;答复学生的问題,因人而异,而且是经过了小心的思考才答复的。

孔子所教的课程,起先是与政府学校的课程颇为相似:六艺。可能在最初孔子只教了两三艺:书、数加上射。射是当时民间很流行的消遣,所以也自然而然便被列入孔圣人这座有名的学校之课程表。

稍后,御也被列入了课程表。当时,凡是当军人的都必须学会射和御。主要是军官需要站在战车里而战斗。这三个军官,一人驾战车,一人挽弓射箭,一人持矛刺敌。徒步的兵士所作战斗,是次要的。骑兵在当时中国人的世界还没有出现。

再其后,礼与乐这两艺也被列为课程。

孔子一人独办他的学校,六艺都由他自己教。他六艺都精通,所以教起来游刃有余。他尤其喜欢指导学生习礼作乐。他认为这两项科目最重要。

礼是行为的规范者;乐是情绪的调节者。孔子希望他的学生们行为端正而态度安详。

一个端正而安详的男孩子,倘若加以适当的教育,将要在长大以后成为好人。家庭中、社会中、国家中,好人越多,便有越多的孝子,越多的可信之友,越多的忠贞国民。

孔子相信,在他所教出来的若干好人之中,将要有若干位于施以更多的教训与指导以后,成为更高级的人,亦即所谓君子。君子的本义,是国君之子,引申而为贵族;到了孔子之时,这个名词的意义已堪与英文之中的 gentleman 相比。孔子赋予这个名词以若干新的字义:包括武士与道德家所应有的特点。

依照孔子的说法,一个君子^③应该彬彬有礼,而且品格正直。君子应该兼有知(智)、仁、勇。君子能辨别是与非;关心别人甚于他自己;公正而不偏袒任何一方,除非牵涉到正义问题。(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说话慢,办事快;对自己严,对别人宽;知道自己的缺点,不怨恨别人对他的批评,或对他的长处不了解。君子为道而工作,不是为个人的收入而工作(谋道不谋食);因此,他淡泊自甘,活得很快乐,他之所以快乐,是因为对世界的前途乐观,深信世界能够因人的努力而变得更好。

在孔子的道德学系统之中,另有更高于君子的一个境界:仁人的境界。仁这个字的本义,是“人的本质”(仁者人也)。一个仁人,力求依照人的本质而生活,力求异于禽兽,因此而慈祥、忘我,随时可以为正义而死。

在孔子的最初学生之中,有若干位被他的人格与他的渊博所感动而留在学校之中,于修完了各种课程以后仍旧不走。孔子于是教给他们以更高深的学识。再其后,又有若干真正毕了业的学生常常回到学校来看他,向他请教很多有关政治学、道德学、哲学的各种

问题。孔子也必须给他们以答复。这便是他所创办的学校如何演进为一座学院,而且超过了一座学院。

前前后后来到他的学校的学生们,总数不在三千名以下。其中有七十七位“受业身通”,被孔子承认为他的弟子^④。

随着学校的演进,孔子自己也在成长。他从来不曾停止学习。他随时向有学问的人请教,包括鲁国的乐官师襄,与其他前辈,以及像郯子^⑤那样的来到鲁国的宾客。郯子是郯国的国君,也是一位学者。孔子也向平辈的朋友与路上的人^⑥学习;学习他们的长处,避免他们所犯的错误。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其善者从之,其不善者改之。 ”)

然而他一生所遇到的最好的老师,却是他自己。他向自己学习是兼用勤学与深思两种工夫^⑦。他后来曾经向学生们说:“仅仅模仿别人与独自练习,而不用脑筋去想,会走错方向;仅仅用脑筋去想,而不肯模仿别人与独自练习,会错到危险的地步。”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

孔子在答复弟子们的问题之时,引用历史文件(《书经》)、宗教性的赞美诗与抒情性的民谣(《诗经》),以及有关典礼、礼俗与礼制的条规(《礼经》)越来越多。孔子在事实上把六艺扩大了,扩大到包括了历史学、文学与我们今日所称的政治学。

他不仅以言语教,也以身教,以他日常举止作为学生们的榜样^⑧。他对邻居们不噜苏交谈;在乘车的时候,不直接指挥驾驶的人。他在散步的时候,遇到

白头发的长者或服丧的人一定停下来致敬。

他在家吃得很简单，但是每餐必须有生姜或生姜的制成品。他不吃那割切得不像样的肉类，也不吃外面市场上小贩子所制成的干肉。他穿的衣服，色彩素雅，绝对不穿紫色或红色的内衣。皮袍子的两个袖子不一样长，右边的袖子略短，以便子写字。

他养了一条狗^⑨。这条狗死了的时候，他叫人用席子裹了，葬在后院子里。

在他办学校的三十个年头之中，他的生活常是如上所述。到了公元前 502 年，他就被卷入鲁国的政治之中。

三、鲁国的政治

鲁是周王国内部的重要封建国家之一。它在名义上只是一个侯爵国，领土却南北有 200 英里长，东西有 300 英里宽；有十八个或更多的有城墙的城市^⑩，以及若干或大或小的城镇。

鲁在周王国的各诸侯之中，力量上仅次于晋齐^⑪，与郑宋卫不相上下；而强于其他各国，除了秦国以外。秦国正在西边崛起，不久便足以对强有力的晋国挑战。

在周王国之旁，另有两个王国：长江中游的楚及长江下游的吴。这两个王国一时还不足以威胁鲁的生存。

鲁尊重那个位于洛邑（洛阳附近）的周天子的名

义上的宗主权,鲁也积极拥护作为“中央诸国”(中国)的霸主的晋。凡是晋国所召集的会议或是所主持的战争,鲁都尽量参加。

鲁有战车一千乘,步兵七万二千人,甲士三千人^③。遇必要时,它可以增加兵力至某种限度。在它的长达八百年的历史之中,鲁从来没有吃过严重的败仗。到了公元前 238 年,它才被楚吞并。

正如当时其他的封建国家,鲁在开始时候也是微小的。它的领土不大于一个城及其近郊。

伯禽是从周成王的手中,领得了他的采邑。他的父亲周公旦,曾经是成王幼年之时的摄政。

周公旦本人是一个公爵,采邑在河南洛阳附近,称为周公爵国,与周王国同称为周。周王国的都城是镐邑,在今日西安附近。

《论语》上称周公旦为周公,省略了这个旦字。

周公旦有两支后裔:一支在洛阳的周公爵国,有若干代的“周公”^④;一支在曲阜的鲁侯爵国,有伯禽以次的若干代“鲁侯”^⑤。

鲁在伯禽及其后若干代继承者之下,版图逐渐扩大。

公元前 771 年,周幽王被犬戎击败,失掉镐邑与渭河流域,其后的周天子局处洛邑一带。不再有力量制止各藩属国家互相兼并,于是鲁也加速了它的扩大,把邻近较弱与较落后的各国与各部落的领地占为己有。

到了孔子诞生之时,亦即公元前 552 年(鲁襄公

二十一年)^⑥,鲁国已经除了原有的都城以外,又有了十八个以上的有城墙的城市。这些增加了的大城,每一个都曾经是另一个国或另一个部落。

鲁国的如此的“光荣”,正如历史上类似的光荣,必须付出代价才能获得。这代价是:鲁国的人民必须做苦工、打仗、送命。一代一代的鲁侯享受了版图扩大与臣民增加等等短暂的满足。讽刺性的事实是:最后真正赢得了胜利的不是一代一代的鲁侯,而是他们下面的将军们。

这些将军,依照周公所制定的礼,同时也是鲁国的三位主要大臣(三卿):司徒、司马、司空。这三位大臣分别主管民政、军政与公共工程^⑦。

在公元前第七世纪的下一半以后,鲁国的三卿职位被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苗裔所把持。这三家苗裔,在《论语》之中被称为“三桓”。鲁桓公的另一个儿子(大儿子),继承了侯位,被谥为庄公。

三桓的氏名,是仲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季孙氏(力量最大),由非法世袭而把持了司徒之职,叔孙氏与仲孙氏也分别世袭了司马与司空之职。

三桓而且设法使自身成为子爵,以鲁国领土三大块作为他们的采邑。

有一位鲁侯,鲁昭公,在公元前517年试图恢复他的权力。帮助他的是一些对季孙氏的首领季孙意如(季平子)也有怨恨的人。鲁昭公是侯爵,不是公爵。生时被称为公,死后被谥为“昭公”。这种僭越称呼,在当时各国是很普遍的现象。郑国与秦国的国君

是伯爵，也是生时被称为公，死后被谥为某公。（于是这个“公”字成了诸侯的通称，相当于英文的 Lord，与公爵的“公”字不同。公爵的“公”字，相当于英文的 duke。）

鲁昭公与他的支持者袭击季孙意如^⑧，把此人围困于其自己的堡垒之中，准备将他处死，却突然有叔孙氏与仲孙氏的兵来救援季孙意如。他们击败了鲁昭公的兵。鲁昭公不得不离开鲁国。

他去到齐国。齐景公想给他一千个社，每个社有二十五家人民，条件是要他成为齐国的藩臣。他不肯接受。

不久以后，齐景公伐鲁，取得鲁的一个边城郛（东郛）；派兵戍守，请鲁昭公居住在内。鲁昭公于是留在这郛城，继续使用他的鲁侯头衔。

在公元前 516 年的夏天，鲁昭公试图攻取鲁国国都之北的一个战略性的城市郕。他没有打赢，因为齐景公左右有一人受了季孙意如的贿赂，影响了齐景公，使得齐景公虽答应过全力帮忙，而临时失信。

鲁昭公在公元前 514 年 2 月去了晋国。晋国的顷公，对他表示欢迎，让他在一座叫做乾侯的小城住下，晋顷公而且设法使鲁昭公与季孙意如言归于好。季孙意如在公元前 511 年 3 月来到乾侯。鲁昭公仍在生他的气，对他不理。

次年的 11 月，鲁昭公去世。季孙意如准许人们把鲁昭公的尸体运回鲁国安葬；但只许葬在离开别的历代鲁侯坟墓有相当距离的地方。

季孙意如于取得仲孙叔孙两家的首领之同意以后,不立鲁昭公的儿子兼继承人(世子)公衍,另立鲁昭公的一位名字叫做午的弟弟。午将要在鲁国的编年之中被称为定公。“定公”二字是午死后追谥的。

我们大家对定公记得较为清楚,因为是在这位定公充当鲁国国君之时孔子被卷入鲁国的政治。稍前,有一位问题人物阳虎(阳货),曾经取得了政权,而又丢掉了政权^⑨。

阳虎是一个政治上的暴发户。他当了季孙氏的宰,替季孙氏管理他们所控制的土地。这土地在名义上仍是鲁国国君(鲁侯)所有。阳虎也以季孙氏的名义管理那土地上的人民。

当季孙氏的首领季孙意如在公元前 505 年去世之时,阳虎把季孙意如的年轻儿子兼继承人季孙斯变成傀儡:拘禁季孙斯于其房屋之中,直至他宣誓承诺一切听阳虎作主。

从公元前 505 年 5 月到 502 年 9 月,阳虎用季孙斯的名义当鲁国事实上的执政。三桓之中的其他两个世袭的卿,仲孙何忌与叔孙州仇,以及鲁国国君(鲁定公),都对阳虎宣了誓。

阳虎虽则是一位暴发户,却也有能力在国内维持法律与秩序,对郑国作战取得一个城,对强邻齐国收回(东)鄆与阳关。

这些成就使得他更加胆大。他进一步想把自己升为世袭的卿,以代替仲孙何忌;也想把季孙斯与叔孙州仇除去,代以自己的亲信季寤与叔孙辄。

阳虎在公元前 502 年 9 月事先预定的某一天,正要实行这个图谋,季孙斯却逃走了,逃到仲孙何忌的设了防的官邸里去。他的兵与仲孙氏官邸的兵进行作战。突然,有一支军队来自仲孙氏的郕。郕是仲孙氏采邑中的一个有城墙的大城市。郕军于郕宰公敛处父的统率之下,击败阳虎的兵,使得阳虎不得不离开鲁国国都(曲阜),奔向阳关。他在阳关住到次年的 5 月,又被击败。

他于是去到齐国,齐景公对他很冷淡。其后他去到晋国。晋国的一位世卿,赵鞅,却觉得他值得重视,就让他留在晋国,作为宾客兼顾问。其后不久,阳虎将要有机会在诸侯之间的国际政治舞台上一出风头:他将在卫国一位侯爵(卫孝公)与这位侯爵被免去继承权的父亲(蒯聩)之间的不幸的活剧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就鲁国的政治而论,阳虎不再有份。

阳虎倘若曾经获得了像孔子这样的人的支持,也许不致于在鲁国失败。孔子在当时已经教了三十年书,被大家公认为鲁国最有智慧的人。

阳虎确曾试图劝说过孔子参加他的政府,但被孔子拒绝^⑩。阳虎之想除去三桓首领,在表面上似乎与孔子之主张有点相同,然而孔子对阳虎那样的政客十分鄙视。孔子的主张是:严格遵守周公所定下的礼制,不许卿位世袭,让每一代的国君有权指定任何人为卿。

然而孔子也并不主张恢复过去的全部。孔子所要的,是在合法的架构之中求进步。孔子而且反对像

阳虎那样为了扩充领土而进行的战争,像阳虎对郑国所行的一次,以及孔子晚年有人想对一个小部落颛臾所行的一次。在孔子看来,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东西不是领土之大,而是人民财富的合理的分配。

可惜,在他的崇高理想与鲁国的实际政治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

四、痛心的经验

在阳虎垮台不久,也许不过是几个月的工夫,孔子作了“中都”之宰。中都是鲁国国都城内的中部。中都宰,是这个小区的地方官。没有史料能告诉我们以孔子如何,何以,经何人之力,而获得这项工作。

孔子担任中都宰之时所作的事,唯一被记载下来的只有:他制定了棺槨应该有几寸厚^①。

他在中都宰任内的政绩一定很好,因为他不久便被升为仅次于三个世卿的官:司寇。司寇在那时候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警务处处长,兼有几个其他部门官吏的若干职权^②。

他当司寇当到了公元前498年11月。《左传》说他当了司寇以后首先举办的事之一,是在鲁国历代国君坟场的周围掘了一条沟,把这条沟掘得很长,以便把鲁昭公的墓地也包括在坟场以内^③。

《左传》也记载了公元前500年(鲁定公十年)2月齐鲁之间的一次高峰会议。孔子在该次会议之中当了鲁定公的荣誉侍从官(相,亦即侯相)。这个职

位，通常是由三个世卿之一担任的，其任务不仅是陪伴国君，而是在实际上办理交涉，像全权使臣一样。

这一次会议，从齐鲁双方的立场看，都是一次成功的会议。它也是孔子个人的一大成就，齐国要求鲁国与齐国结为盟邦，用三百乘以上的兵力参加齐国对他国作战。鲁国表示可以答应齐国如此的要求，但交换的条件是齐国必须归还阳虎带去献给齐国作为对齐景公的贿赂的鲁国的“汶阳之田”。（汶水以北的一片土地，包括若干个城镇。）如此的条件，是由孔子设计出来而交给一位助手高声宣布的。齐景公很有风度地加以接受。

然而会议的整个经过，并非一帆风顺。齐国在会议所在地（夹谷）的附近，埋伏有几十名土著部落的莱人，这些莱人在会议典礼开始之时出现，服饰怪异，全副武装。他们请求以“战争舞”来娱贵宾。他们不等待允许，便走向鲁定公与孔子。

孔子立刻令他们停止。孔子事实上也带来了鲁国部队，以防万一。孔子这时候向鲁国部队说：“使用你们的兵器！把他们（莱人）赶出去！他们没有权利到这两国国君会议的场所来。我们不许他们夷人来搅乱华人的事。”

于是鲁国部队朝着莱人的方向前进。莱人于齐景公用手指示之下，像绵羊一般退了出去。

齐景公的本意也并非要杀鲁定公与孔子。齐景公只是想慑服他们二人，叫他们在会议之时答应齐国的要求。他以为孔子只是一个胆小的书生型学者。

孔子有时候确是书生型的,但从来不曾胆小。在夹谷的高峰会议以后不久,孔子就从事于一项大胆的工作:他想把三桓的子爵采邑之上的三个大城市的“设防城墙”加以堕毁^①。

似乎奇怪的是:三桓这三位子爵却支持了孔子的此项企图。原来他们各有自己的动机。他们的三个大城市之中,有两个此时是在不听话的仆人(家臣)之手,而叔孙州仇与季孙斯正想除掉这两位家臣。另一个大城市,郈,属于仲孙氏;担任郈宰的人,是相当忠心于仲孙何忌的人;不过,仲孙何忌是孔子的学生之一,他为了与孔子合作,也就姑且和叔孙州仇与季孙斯一致了。

孔子所要做的,是恢复西周盛时鲁国的制度,以符合周公之礼:要鲁侯在事实上,不仅是在名义上,作一个侯(作鲁国之君)。他认为鲁侯不仅应该是君主,而且应该也是统治者。鲁国境内除了国都以外,没有一个其他城市应该设防。

三个设防的城市之中,最先被“除防”的是郈城。郈的主人(子爵兼世卿)叔孙州仇,与当地的一位“马正”(掌管马匹的官)侯犯,打了一年仗;倘若不是仲孙何忌来协助,叔孙州仇不可能终于胜了侯犯。

第二个被“除防”的城市是费城。它属于季孙氏,城宰是以前曾为阳虎帮凶的公山不狃(公山弗扰)^②。

孔子吩咐两位勇士申句须和乐颀,在庭院中与敌人作战。这两位勇士奔向公山不狃本人和仅次于他的指挥官叔孙辄,把他们两人吓得失了魂魄,迫他们

与他们的军队，一直追到了国都以外很远地方的一个小城姑蔑。

鲁国军队的大部分，于三位世卿及司寇孔子的指挥之下，藉着两位勇士的精彩表演，就在公元前 498 年中把叛军完全消灭于姑蔑。

公山不狃与叔孙辄经齐国逃往吴国^⑥。跟着，费城便被季孙斯与仲孙何忌“除防”。

第三个该“除防”的城市，是仲孙氏的郕。郕的宰公敛处父，与仲孙氏的首领仲孙何忌处得相当好。他曾经在公元前 503 年救过仲孙何忌，使后者免于被公山不狃所俘。公敛处父虽则也是一个（政治上的）暴发户，比起侯犯与公山不狃却很不相同，因为他多少有点关心整个国家的利益。现在，三个大城市有了两个被“除防”了，公敛处父认为他有责任不让最后一个大城市郕也被除防。

他向仲孙何忌说，“倘若郕被除防，齐国的兵便可以在任何时候来到鲁国国都的北门。”

他继续说：“而且，郕也是你们仲孙氏的保障，你个人的权力的依据。没有了郕，也就没有了仲孙氏。我决心抗拒‘除防’的命令，抵抗那些来执行除防的任何军队。你，我的子爵，可以装作不知道我的决心。”

仲孙何忌（孟懿子）在听了这一番话以后，变了一个人。一个本来很支持除防政策的他，竟然对此除防行动，亦即除郕之防的行动，置身事外。

其他两位子爵，季孙斯（季桓子）与叔孙州仇（叔

孙武叔),也退出了除防行动。这件事只剩下孔子一人去做。孔子试图以鲁定公的名义,来继续行动。军队由他自己担任指挥,而表面上仍是秉承鲁定公的命令进行。

孔子在公元前 498 年 11 月开始对郈围攻。围攻得很久,而郈仍在公敛处父之手。鲁定公渐渐丧失了他的热心。他而且(与季桓子)被齐景公送来的美丽的跳舞女所分心^⑦。

鲁定公于某一次祭礼以后故意不分一块胙肉^⑧给孔子。这是一种暗示。孔子于是只得提出辞呈。

孔子辞职以后不久,对郈的围攻被鲁定公宣布作罢。公敛处父不曾受到鲁定公处罚。孔子痛心于自己学生仲孙何忌的背叛,与鲁定公之缺乏毅力,就离开了他的出生地鲁国,放逐了自己。

五、有目的之漫游

孔子滞留国外,直至公元前 484 年的最后三个月。在那十四个年头之中,他访问了若干国,其中有几国的封建诸侯对他待以宾客之礼。不幸这些国君没有人真正听从他的意见,或接受他的关于道德学与政治学的理论。

他所遇到第一个国君是齐国的景公。齐景公问他:“如何治国?”^⑨他给齐景公以简单的回答:“国君要做得像一个国君,大臣要做得像一个大臣;做父亲要做得像一个父亲,做儿子要做得像一个儿子。”(“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

齐景公说：“何等正确！倘若国君不像国君，大臣不像大臣，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那么，虽则我的仓库堆满了谷子，我能够吃得到么？”

这一次相当平庸的对话，被保存在《论语》之中。我们必须在“字里行间”寻找孔子的真意。事实上，在孔子用这似乎是学术性的语气说出这个哲学大道理的时候，齐景公的行为，不像一个好国君或好父亲。他自己也知道他不是一个好国君或好父亲。

齐景公喜欢大兴土木造豪华的宫殿，向老百姓抽取重税，对老百姓施予重刑，例如砍脚。他有两个坏大臣与两个坏儿子。他死了以后，这两个坏大臣把他的两个坏儿子依次扶立为齐国国君，也依次把他们杀害。

倘若孔子留在齐国稍许久一些，可能不免于卷入这些废立与弑君的血案。齐景公确也一度想留孔子，给他以高过鲁国世卿之一仲孙何忌的收入（“以季孟之间待之”）。不过，齐景公重新考虑了一下以后，便把这个念头打消^②。于是孔子离开齐国。

另一个国的国君是卫灵公，请孔子当他的顾问，给孔子以相同于在鲁国作司寇时的俸禄：六万个单位的谷类^③。孔子接受了卫灵公的聘请。十个月以后，卫国发生了一件事。

比起齐景公来，卫灵公虽然是较好的国君，却是较坏的父亲。他娶了一位私德不好的女人，名叫南子，作为后妻；因此而使得太子蒯聩对他疏离。

蒯聩企图在公元前 496 年的第三个月的某一天，在朝廷会议上杀掉南子。这件事做得完全失败。于是，蒯聩逃往晋国。

孔子与这件事毫无关系，然而他忍受不了（如此的父不父，子不子）。他辞职，恢复漫游生活。

我们没有可靠的史料，来确定孔子的每月或每年的行程。我们仅仅知道他在宋公爵国，杞陈蔡三个侯爵国，郑伯爵国，以闲逸的步调，游来游去。另一个他所到的地方，是楚王国内部的叶公爵国^④。他也到了周王国的国都洛邑。

依照《礼记》的某一章（“曾子问”），孔子在洛邑见到老聃^⑤。老聃是周王朝廷中的档案官（守藏史）。此人也许正是《老子》（《道德经》）的作者。也可能不是，倘若已故梁启超先生的判断是正确的。无论老聃是不是与老子为一人，他总之是一位值得孔子重视的一位突出人物。

在洛邑另有一人，孔子也认为必须一访，以表示敬意。这个人是朝中的另一个官吏，名叫苋弘^⑥。苋弘极忠心于他的王，同时也是一位大音乐家。孔子从苋弘那里学得不少学问。

孔子在洛邑一方面结交些朋友，一方面并未忽略洛邑各档案处与图书馆的丰富收藏。他可能尽量抄录了不少的诗歌、赞美诗、圣诗、编年史、历法、卜辞、法律、条例、世系表、条约、宗教性与民俗性的乐谱、铜器上的铭文、以及各式各样的历史文件。

他在杞国与宋国^⑦旅行之时，也下了同样的功夫。

这两国分别是夏商两个王朝之后。他说：“关于夏与商之间及商与周之间制度的变迁，我在杞宋两国找到了少数的材料，然而不够多，因而无法对这些变迁作充分的说明。”

他在别国也作了类似的研究。他习惯于走到一个地方，便考查他所已经读到的或听到的有关这些地方的记载与传闻。他寻求证据。他说过：“没有证据的话，我们不能相信。”（“无征不信”）

然而，在他漫游的岁月之中，以及一生之中其他的岁月之中，他的主要目的都不是学术性好奇心的满足，而是一件更崇高的事：把他所生存于其中的世界，改造为更好的一个世界。

很少有封建诸侯听他的话，或是给他以招待。陈国的滑公^⑧却是这些极少数诸侯之一。孔子每次到了陈国，都受到陈滑公的热烈欢迎，不幸这个微小的陈国，没有多大力量来使得我们孔圣人的梦成为事实。

陈滑公尽管心意极好，却穷得不能按时候付给孔子生活费。有一个时候，孔子与随从他的几位弟子，在陈国真正绝了粮。他们饿得体弱不堪，无力从他们所睡的席子上站起来。

仲由是这几位弟子之一。他作为社交用的字是“子路”。子路这个字，知道的人较多。仲由生性率直，此时向他的老师孔子提出抗议：“君子也会穷么？”^⑨孔子答复说：“是啊！君子也会穷；但是尽管穷，却仍旧坚守原则。小人到了穷的时候，便无所不为了。”

孔子与子路及其他几个弟子,结果不曾饿死,而活了下去。他们向南移动,到了今日的河南新蔡。新蔡原为蔡国的昔年国都,这个城被楚国吞并了去,成为楚的一部分领土。蔡国在今日安徽凤台附近另设了一个国都。

在新蔡或其附近的另一个城叶县,孔子见到楚国的一位大官,这便是叶公。叶公向孔子问政治的道理,孔子回答:“倘若你能使得邻近的人快乐^⑩;远处的人也会来到你的所在,向你恳求使得他们也快乐。”

在另一次会见之中,叶公向孔子夸称:“在我的家乡有性情真诚的人,见到自己的父亲偷羊,就向政府告发他的父亲。”^⑪孔子说:“在我的家乡,也有真诚的人,却不如此。他们之中,做儿子的替父亲隐瞒;做父亲的替儿子隐瞒。这样,(在孝慈之中)也包括有真诚。”

再其后,叶公颇想多搜集一些关于这位来自鲁国的奇怪学者的情报。他问仲由:“你的老师是怎样的一个人?”^⑫仲由认为这是对老师与他自己的一种侮辱,便不予以答复。回到寓所以后,他把经过向孔子报告。

孔子笑了一笑,向仲由说:“你怎么不答复叶公,说你的老师在研究学问的时候,会兴奋得忘记吃饭,而且经常快乐得很,忘记了忧愁,甚至不知道他自己快要老了。”

孔子与叶公彼此均知道,在他们两人之间,任何

合作或同伙均不可能。于是,孔子及与他同去的几个弟子,不得不走。

他们先回到陈国,其后又去了别的地方。陈国是他们住了最久^⑩,与去了最多次的一国。他们至少有四个年头到过了陈国,每次在陈国居住了一些时候。

孔子与他的几位弟子也到过宋国,住了很短时期。当地的一位大臣桓魋^⑪,对他们极端敌视。

他们不像是曾经在郑国住过。他们仅仅经过了郑国而已。在郑国的一个小城匡邑,他们费了很大的劲才向当地的居民解释清楚:孔子虽然相貌像阳虎,而实际不是阳虎。阳虎以前在公元前 504 年伐郑之时,曾经凌虐了匡邑的人。

传说,他们在另一处地方,即卫国的蒲邑,被逼得不能不用武力自救^⑫。没有史料能够告诉我们,什么人是在蒲邑与孔子及其弟子为敌,以及为什么他们与孔子及其弟子为敌。

他们也碰到了若干隐士。这些隐士由于本身是悲观主义者,不能明白为什么孔子及其弟子不停地为了一个达不到的目标而奋斗。有一个隐士态度却是例外。此人是卫国一个小城仪邑的“封人”^⑬(管理土地登记的小官)。他要求见孔子,在谈了一阵以后,被孔子的改造世界的热心所感动。他从孔子的寓所房间出来,向弟子们说:“你们不必为遭遇不好而难过。这个世界乱得太久了。老天将要以你们的老师为‘木铎’。”木铎是以木头作舌的铜制的铃,更夫用它来唤醒酣睡的人群。

当孔子及其弟子于公元前 485 年尚在陈国之时，卫国的国君卫孝公派了一位使者来，请孔子再去卫国一次。孔子接受邀请，就和颜回、仲由、冉求、端木赐及其他几位弟子一同去。

卫孝公在公元前 493 年年初，祖父卫灵公死后，继承了卫国的国君之位。他的出亡了的父亲蒯聩，在阳虎及一支晋国军队的援助之下，回到卫国争位，取得了一个边域戚邑，一直留在戚邑，但未能更进一步。

就这样，蒯聩与卫孝公这对父子已经相持了八年之久，在孔子于公元前 485 年重新来到卫国之时，仲由问孔子：“卫君等待你教他办政事，您将要从何处先行着手？”孔子以严肃的语气答道：“必须先行正名。”^⑩

孔子此时所谓“正名”，意思可能是：做父亲的应该像个父亲，做儿子的应该像儿子。卫孝公既然是个儿子，就应该做一点事，让他的父亲蒯聩快乐，例如把“相持不下的对抗局面”作一结束。

仲由提出他的意见：“老师，您迂到这个样子！在今日的情况之下，正名从何说起？”

孔子被激怒了，立刻对仲由严厉申斥：“由啊，你是一个野人。一个君子对于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就得保持缄默。名倘若不正，言语就不顺，……事就不成，……礼乐就不能振兴，……刑罚就不能恰当，……人民就不能知道把手与脚放在那里。”

孔子坚持他的原则是对的。仲由对于现实问题的估计也是对的。要结束蒯聩与卫孝公父子二人相

持不下的局面,实在找不出可行的办法,除非卫孝公肯把国君之位让给父亲蒯聩。这样的办法,不是卫孝公或他的朝臣如孔圉之流所能接受的。

孔圉在死后被谥为孔文子。他是卫孝公的朝臣之中最重要的一位。他钦佩孔子,但不能支持孔子的看法。^⑧

卫孝公像孔圉一样,对孔子也很尊敬。然而关于“正名”,却什么也不愿做。孔子这一次滞留在卫国大约有一年左右,直到鲁国有递信的人来到卫国,请孔子回鲁国去。

六、晚 年

孔子回到鲁国,发现鲁国与十四个年头以前离开它之时很不相同。鲁国已经变得较前更贫、更弱。三家世卿已经进行了更多次的战争,收取了更重的税,掌握了更大的权力。

在光明的一面,季孙氏的新首领季孙肥(季康子),比起他的父亲季孙斯(季桓子)来,堪称为较好的大官。季孙肥对孔子的弟子也较为友好,给了他们以重要的职务。例如冉求,便是被季孙肥从卫国召了回来,充任季孙氏的宰的。

经过季孙肥的推荐,鲁国此时的国君给了孔子以悠闲的职位。这一位国君,后代称为鲁哀公。鲁哀公也准许孔子享有参加朝廷会议的特权。

我们的圣人执行他的元老国民的任务很尽力,因

此而获得鲁哀公、季孙肥与鲁国多数人民的爱戴。例如，齐国在公元前 481 年 5 月有一名朝臣弑了他的君主齐简公，孔子便建议派兵去齐国对这名朝臣加以讨伐^①。孔子明知道鲁哀公与三位世卿皆不重视他的这次建议，然而他有原则，他不能不作如此的建议。

这一件事以前，孔子在公元前 484 年 11 月进过另一项忠告^②。季孙肥想增抽农民一项新的税，派他的宰冉求作为正式的传话人，去见孔子，征询孔子的意见。冉求传告了季孙肥的请求三次；三次孔子皆不肯出声答复。于是，正式的会见作一结束。跟着，孔子与冉求二人便以私人的身分作师徒之间的恳谈。孔子向弟子冉求说，“你的子爵（季孙肥）不必来问我关于这件事的意见。周公的礼制现今仍然有效。在周公的礼制里面，你的子爵可以找到应该向人民抽多少税。他只须减少开支，停止贪心；倘不如此，他不久便需要又增抽一种新的税了，你晓得，一个君子是应该给得多，取得少啊！”

尽管孔子对冉求说了这么多，那季孙肥增抽农民的税的想法不久依然被冉求付诸实行。这增税消息传到孔家之时，孔子大为生气，他的生气极有理由。他大声向当时在身边的学生们说：“季（孙）氏比当年的周公还要富有，然而冉求却想为了季氏的利益，加强剥削人民。他已经不是我的弟子。你们年轻人，敲起你们的鼓。去，攻打他们！”

听孔子作如此吩咐的弟子们，与孔子一样的愤慨，却不曾真照孔子的吩咐去行动。他们没有走向公

家的建筑物去攻打冉求。

孔子的晚年充满了若干令他失望的事，正如以前。同时，他的健康日坏；他的独子孔鲤与最好的弟子颜回，最勇敢的弟子仲由，相继死亡，使得他的健康更加受损。

孔鲤生于公元前 532 年，死于公元前 483 年，享年五十岁。他跟随父亲孔子学了若干科目，包括礼与诗。可惜，关于孔鲤的公生活与私生活，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我们只知道他的母亲，亦即孔子的夫人（开官氏）是在鲁国去世的；他自己的太太，却是死于卫国。他们夫妇二人曾经在孔子居住卫国的时候，与孔子在一起。

颜回也以他的社交用的字“颜渊”为人所知。他生于公元前 521 年，死于公元前 490 年，享年三十二岁。他与其他的学生不同；他实行孔子的每一句话。例如，他从不再犯任何一次过失；也从不因某人冒犯他，而对另一位不曾冒犯他的人发怒^③。关于这一位大弟子，我在本书下面一章，将要多说一些。孔子对颜回抱有很高的期望。颜回死时，孔子哭着说：“天舍弃了我！”^④

仲由（子路）比孔子小九岁。仲由是弟子之中年纪最大的之一，却不是最早的之一。他曾经是一个蛮横的强人^⑤，常常对孔子不礼貌，却终于被孔子感人的人格所悦服。仲由当了季孙氏的宰，支援了孔子对三桓的三大城市的“除防”政策，追随孔子于漫游的岁月之中，也陪同孔子回到鲁国。不久之后，他又去卫国，

为卫孝公而工作。他在公元前 480 年对蒯聩的部下战斗而死^⑥。

所爱之人接连去世,对于一个老年人(孔子)是警告,警告他该早些着手所尚未完成的事。因此,我们的圣人自从回到鲁国之后,忙于做两件事:一是就《易经》的主要论点来发展成一套新的哲学;二是整理他曾经用来教他的学生的几部主要教材,例如若干古代的诗歌与若干(对他而言,是)近代的诗歌^⑦,以及这些诗歌的乐谱,还有一些从各地档案馆抄来的历史文件、鲁国的编年史、礼的细则,等等。

孔子的这些最后努力的结果,是有名的“六经”,亦即《诗经》、《乐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不幸,六经之一的《乐经》^⑧,已经由于秦始皇帝的焚烧而永久丧失了。

六经之另一部是《书经》^⑨。他原是孔子在各地从几千件文件之中选出的一百篇。我们现在的《书经》只有二十八篇^⑩。其余的七十二篇,在尚未遗失以前,曾经被零星引用在若干古书之中。幸亏有像孙星衍那样具有渊博学识的人,从这些古书中抄集了这些零星的雪泥鸿爪。

其余的四部经,已被保存:《诗经》、《礼经》(《仪礼》)、《易经》、《春秋》。

《诗经》是一部选集,包含三百零五篇圣诗、赞美诗、抒情诗与短篇的史诗。孔子编了这部选集,作为课堂之用。每一首都可以唱。这些诗歌附有乐谱,于朝廷或宗庙举行典礼之时可以由成队的乐器演出者

伴奏。

《礼经》^⑩包括有关典礼及社会礼俗的若干重要规则。我们的圣人没有把法律与条例收进去,也许因为法律与条例太多,不适合抄在一部用竹简写成的教科书之中。纸,此时尚未有人发明。

鲁国编年史的正式名称,在当时叫做《春秋》^⑪。现今,仍叫做《春秋》。孔子所作的,是更换其中若干条的字眼,以奖善惩恶,也警告那些可能在将来做坏事的人,知道他们会留下恶名在历史书之中。除此之外,孔子在他的《春秋》之中,又把楚吴两国的君主不称为王,而称为“子”,这表示:在他看来,全中国只能有一个王国,即周王国。

《易经》本来是国王朝廷与诸侯朝廷的卜筮之官所用的蓝本。它开始之时只是八个卦,每卦三画。其后,一步一步地演进为今日的形式,也就是六十四卦,每卦六画;而且每卦有一个卦名,有一句卦辞,一句彖辞与就全卦形态而加以解说的《大象辞》。某卦的形态可能是水居火上,或雷在风上,等等。每一卦的六画,即六爻,各有一数目字次序与爻辞及《小象辞》。爻辞与小象辞,大都是看某爻为实线(阳爻)抑为虚线(阴爻),以及该爻在该卦之中所占的地位为初爻抑为次爻、三爻等等而立论。

除了以上的各项外,又有五种后人所作的《传辞》,其中两种引用了孔子的话(《文言传》与《系辞传》);其余三种,《序卦传》、《杂卦传》和《说卦传》,是更晚的人所作。《文言传》与《系辞传》所引用的孔子

的话,主要意思是说:一个君子只须坚守正确的原则,在适当的时候作适当的事,不作得太过,也不作得不够,他便可以应付任何坏的情况。

换句话说,孔子把朝廷中卜筮之官的手册,变成了一部处世的哲学^③。

孔子在公元前 479 年 3 月去世^④。去世之时,遗下孙儿一人,名孔伋(字子思)。很多人相信孔伋是《礼记》书中《中庸》一章的著者。《中庸》发挥了孔子有关天与人的思想。

当孔子叹出最后一口气之时,有若干好弟子在他的身旁。他们把他葬在鲁国国都的北郊,栽了很多树在坟墓的周围,也筑了若干临时住宅。他们留住在这些临时住宅之中三年^⑤,像当时儿子们为父亲服丧守制一样。三年期满,他们流着眼泪举行一次典礼,向所爱的老师之灵魂告别,也彼此互相告别。其中有几位又继续留了一些时候。端木赐(子贡)留得最久。他继续留了三年,前后一共留了六年。

此后,孔子一直被人们追怀,不仅被他直接弟子与若干代间接弟子追怀,也被一般的中国人追怀。

七、直接弟子

若干直接弟子向孔子所问的问题与孔子对他们的答复,已经被记载在《论语》之中。《论语》是一部宝藏,告诉了我们当时孔子的学校是怎样一种情况,也告诉了我们孔子与弟子师生之间的共同兴趣,与他们

每一人的抱负和宜于研究何种学问。

颜回是最好的一位弟子，也是最懂得“听”的一位。他话说得很少，像是一个笨人或“发育迟缓”的人。孔子有一次埋怨他，说：“颜回不是帮助我的人，对我所说的话每一个字都喜欢。”

事实上，颜回不仅喜欢孔子所说的每一个字，而且加以实行，加以发挥。他而且知道“闻一以知十”，就所听到的一件事，引用其原理到十件别的事上去^①。

他显然是一位天才或十分聪明的人。说他是天才，倒不如说他之所以能够如此聪明，由于生活简单，不为外物所迷。他住在一条陋巷，每餐饭只吃一碗，喝汤也只喝一瓢。朋友们替他担心，而他却一直很快乐。

颜回所关心的项目有两个：一是“为邦”，二是“行仁”。

关于“为邦”，他从孔子那里得到如下的答复：“行夏之时^②，乘殷之辂^③，服周之冕^④。”因为夏朝的历法，亦即今日的农历，对节令的安排比商周两代的好。殷朝（殷是商朝后半期的国都，所以《论语》把商朝也称做殷）的辂车最朴素，周朝的冕最讲究。这些都是关于礼的方面。（历代礼制各有所长，不妨分别撷取其长。）关于乐的方面，孔子告诉颜回，要禁止淫邪的郑国之声。关于用人方面，要提防那些满口恭维的人。这种满口恭维的人是危险的（容易使得被恭维的人上当，或遭殃）。

关于“行仁”，孔子对颜回的答复是：“克己复礼为仁”^⑤，也就是克服自己的不良倾向，回到礼的轨道。“你只要有一天做到克己复礼，全天下的人都会直接间接受你的影响，而归于仁的大道。行仁，是你自己的事。你要自己去行，别人是不能替你行的。”

颜回有点不太明了行仁的细目，便向孔子进一步请示。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颜回以外，任何一位别的弟子不曾受到过孔子如此严格的教导，也没有任何一位别的弟子，被孔子期望如此之深。孔子期望颜回帮助自己实现一个以道德来引导人民，以礼制来规范人民的国家。而且，倘若孔子如此的为政治所作的努力终于没有结果，孔子也期望颜回能够在自己死后，继续以教育来作“中国世界”的道德更新。

颜回在他的一方面，也觉察得到圣人给他的任务。圣人已经一步一步地领他走向“道”，把古代中国的文化遗产的各部门都传授了给他，而且也教了他以“礼”来综合这些部门的精华。颜回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颜回的的确确钦服孔子的动人品格，也深切体会到孔子的仰之弥高的理想，钻之弥坚的学识。他尽力而为，企图做到孔子对他的期望^⑥。

颜回不断地改造自己，做到了一连三个月不曾有一点违反仁的言行。其余的弟子们，最好的也只是做到一个月或一两天不违反仁而已。颜回每逢听到了

孔子的一句嘉言，便把他牢记在心头，惟恐忘记。（“得一善则拳拳服膺，希不失之矣。”）孔子有一次问颜回，“想做什么？”颜回回答：“我想戒免夸张自己的长处，不以对别人的服务视作一种施舍。”

颜回生性谦虚，又好学不厌，正如他的老师一样。他常向学问不如他的人请教而不以为耻，（“不耻下问。”）他终于成为孔子直接弟子之中最能干、最有学问的一位，也是品行最好的一位^⑦。

颜回之在公元前490年、才有三十二岁而死，是令孔子失望的一大打击。

其他弟子之中，有三位也是以“德行”著称：冉耕、闵损、冉雍。

冉耕（伯牛）死在孔子以前，像颜回一样^⑧。

闵损（子骞）对家庭极好，对政治没有多大兴趣，然而他也曾很关心鲁国政府对人民所抽的重税^⑨。

冉雍（仲弓）为人沉默寡言而宅心仁厚，赢得了孔子对他的一句令人羡慕的称赞：“可使南面”。（可以叫他作人民的君主，身坐北边，面朝南边）。孔圣人给冉雍以如何行仁的指示，其严厉不亚于给颜回的指示：“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⑩

冉雍也作了季孙氏的宰，作了相当长的时候。他向孔子请教如何把宰作好。孔子教他：“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做事要比部属更先，要以你的勤劳给他们一个榜样；部属犯了小错，你要原谅他们；见到社会上或部属之中的优秀分子，你应该把他们推荐给你的

上司,予以重用。)

冉雍一丝不苟地照着孔子的吩咐去实行。他的雇主季孙氏的首领,与一般人民都很喜欢他。不过,尽管他人缘声望不错,但是并不能把鲁国变得更好些。

另一位弟子仲由(子路),也当过季孙氏的宰。仲由是军事专家。孔子认为他有能力掌管一个像鲁国那样的千乘之国(兵力在一千个战车左右的诸侯之国)。

仲由反应快,行动迅速,对自己个人的危险毫不顾虑。他有丰富的正义感;他的公正,受到鲁国同胞及他国人民的承认与尊敬。他片言可以解纷,说一句话便可以使得两个互相争吵的人言归于好。至少有一次,他的一句话也被认为价值高过两国之间的条约。

他只比孔子小九岁,所以不仅是一位弟子,也是一位亲密的朋友。他以勇猛的面貌与货真价实的体力,保护了孔子。孔子说:“自从我有了仲由,没有人再敢对我发出不礼貌的声音。”(“自吾有由,恶声不入于耳。”)

仲由在校期间以及出校以后,从孔子学得了不少知识。孔子教他:单凭勇气不够,要加上谨慎才好。在开始任何行动以前,必须对事实真相了解明白。孔子对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真知道一件事或一样东西,才能算是知道。不知道一件事或一样东西,就承认自己不知道。这才叫做知识。)仲

由每逢听到如此直率的忠告,就十分快乐。他而且立刻照着这样的忠告去改善自己。

仲由信服孔圣人的道德学与政治哲学。他参加了孔圣人对公山不狃的军事行动而且扮演了其中的重要角色。公山不狃是不服从其雇主季孙斯的费城的宰,可惜,在孔子企图将公敛处父所据守的郈予以除防的这一军事行动中,仲由没有能够帮上多大的忙。因为仲由的雇主季孙斯,以及(其他两个世卿)仲孙何忌与叔孙州仇,都冷了下来。

仲由跟随孔子出亡,与孔子分担周游十四年的困苦。回到鲁国,倘若公伯寮不向季孙肥说他的坏话,使得季孙肥丧失了对他的信任,他本可留在孔子身边直至最后。(这时候季孙斯已死,季孙肥继承了季孙斯的位置。)

仲由不得不又去卫国,在卫国就了一个官职:蒲邑的宰。其后,在公元前480年,他与蒯聩的拥护者搏斗而死^①。

当过季孙氏的宰的,除了冉雍与仲由以外,还有一个弟子:冉求(冉有)。冉求是很有技巧的人,曾经被孔子称许为“艺”。事实上,冉求不仅有行政才能,而且颇有军人气魄。公元前484年,在鲁国国都近郊的一次战役之中,他力战成名。当时他指挥了鲁国两个军之中的一个军(对来自齐国的入侵者作战),获胜。有人问他,他这一套作战本事是从谁学来的。他答复说:“是从孔子学来的。”

冉求与其他几位弟子跟随孔子第一次到卫国,留

了一年左右,又跟随孔子去了陈、蔡、洛邑等等地方,最后再回到卫。这一次,冉求不曾在卫国住多久,就回了鲁国。季孙斯的儿子季孙肥要他回去,担任季孙氏的宰。

他在赢得公元前 484 年的胜利以后,用他的影响力使得季孙肥与鲁哀公欢迎孔子回鲁国。(在孔子回来了以后)冉求不幸为了不得不增加对人民所抽的税而冒犯了孔子:孔子是冉求一生所最佩服而崇拜的人。

冉求自己知道在弟子之中不能与颜回或仲由相比。他以为自己缺乏足够的道德勇气来克服种种困难,以达到老师(孔子)的道。孔子对他说:“你并非道德勇气不够;道德勇气不够的人,做到一半便没有劲了。你呢,你是把自己限制住了。”^⑩

有一天,冉求问孔子:“倘若我听到了有一件事需要去做,我是否应该立刻去做呢?”孔子回答:“是的。你应该立刻去做。”

不久以后,仲由来向孔子提出同样的问题,孔子却给了一个相反的答复:“不,你不应该立刻去做。你有父母在堂,怎么可以立刻去做任何一件事呢?”

这两位弟子先后来问之时,另一位弟子公西赤(公西华)都在场。公西赤感觉被迷惑住了,便向孔子请教:为什么对同样的问题会有如此相反的答复?孔子说:“仲由做起事来,勇气比人多一倍,所以我略为限制他一点。冉求行动慢而性情懒,所以我略为推动他一点。”^⑪

又有一位弟子端木赐(子贡),既无须限制,又无须推动。端木赐如同公西赤一样,是一位外交家。他擅长辞令,又如同宰予(宰我)。然而他的成就超过了公西赤与宰予;他的智慧,仅次于颜回。

公西赤当过鲁国驻齐国的使臣。回来以后,专司接待外宾。

宰予似乎不曾在外交界担任过职务,虽则他以辞令擅长。不过,他也在鲁哀公左右作了类似顾问的官。《论语》保存了他与哀公的一次问答。主题是:在祭祀地神的“社”之旁所种的树。宰予告诉哀公:“夏朝政府所种的是松;商朝政府所种的是柏;周朝政府所种的是栗。周朝人之所以种栗,为的是使得人民战慄。”(栗与慄是同音字。)

宰予的如此理论,和孔子所提倡的仁爱主张太不相同。老师听到他这位学生的理论以后,表示了百分之百的不同意:“过去的事(周朝下令种栗的事),没有再说的必要!”

宰予被孔子申斥不只是这一次。至少还有两次:一次是宰予建议改父母死后三年之丧为一年之丧;另一次是宰予把自己的寝堂涂了壁画。依照古礼,寝堂是不可以涂壁画的。^⑭

弟子们很少没有受到过老师的申斥的。仲由所受到的申斥最多。他常常易于冲动,为人不够谦虚,有时失之粗野。甚至那深蒙孔子宠爱,仅次于颜回的端木赐^⑮,也遭遇到过孔子的讥嘲。有一天端木赐在议论别人长短,被孔子听见了,孔子说:

“(端木)赐真是了不起，我却抽不出时间作这种有趣的消遣。”

正由于孔子对他紧紧监视，端木赐终于把自己改造成一个会说话而又讨人喜欢的人。不仅鲁国的三位卿喜欢他，而且吴国的太宰(宰相)嚭，与齐国的事实上的统治者陈恒(田常)也喜欢他。太宰嚭在公元前484年听了端木赐的话，把卫孝公释放。卫孝公是因为在某一次吴王夫差所召集的会议上迟到而被拘禁的。次年，公元前483年，端木赐也脱服了吴王夫差，使得吴王夫差不再强迫鲁国再订一次盟约以答应吴国更多的要求。最后，在公元前480年，端木赐说服了陈恒，使得陈恒把郕邑归还鲁国。郕邑是同一年不久以前，被鲁国的一位卖国者公孙宿献给齐国的。

端木赐在从事外交活动之余，也做一点生意。他继续向孔子求教，常常到孔子家里提出问题。

他所提出的问题之一，是怎么样可以做一个好的“士”。士这个字的原意与英文中的武士(knight)及日文中的武士(samurai)相同。不过，到了孔子之时，士已经变成一种类似西欧中古的“流浪士”(knight errant)，在本国或他国寻找一个文官职务，或充任教师。

孔子(对端木赐)说：“一个好的士必须在私生活上爱惜名誉，有所不为；在奉了差遣到四方去，能够达成君主所给的使命，不替君主丢面子。”(“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

孔子这几句话,显然是试图鼓励端木赐坚守他的外交事业。

然而端木赐的志向很高,不仅是想当一个外交家,也想当一个政治家。他问(孔子):“一个政治家应该做什么?”圣人回答说:“一个政治家应该使得他的国家有足够的粮食与足够的兵力。而且,他应该使得人民对他有信心。”

端木赐又问:“倘若在某种时候,这三者之中必须去掉一样,应该去掉哪一样?”“去掉兵力。”“倘若又须去掉一样呢?”“去掉粮食。保持人民对你的信心。去掉粮食的后果不过是死而已;自古以来,凡是人都迟早要死的。倘若人民缺乏了对政府的信心,国家就站不起来了(垮下去了)。”

端木赐除了想当一个好的士兼一个政治家以外,还想当一个“十足的简特曼”(a perfect gentleman),也就是想当一个“君子”。他问,“有没有一个字,是我终身可以奉行的?”圣人的回答是:“这样的一个字,也许是‘恕’字。”

中文之中的恕字,是“如”与“心”两个字所合成的。英文之中可以用来对译的,是 empathy^⑥; empathy 的定义是“在了解上与另外一个人认同,或分享这另外一个人在感觉、思想与态度上的经验。”(Random House 英文大字典所下的定义。)

孔子自己对这个恕字的说明,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把这八个字译成: Do not do to the others whatever you do not want them to do to you.

孔子在另一个场合告诉端木赐：一个仁人（不仅在消极方面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因为自己想站起来，于是也帮助别人站起来；自己想政治上成功，于是也帮助别人在政治上成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在所有别的弟子之中，只有冉雍从孔子得到过如此简单扼要的道德学教训。孔子在教冉雍以恕字的时候，是把恕作为仁的一部分。孔子对各位弟子所说的关于仁的涵义，因人而异：教颜回的时候，仁就十分严格；教樊须^①的时候，就极其简单而易行。他对樊须所下的仁的定义只有两个字：“爱人”。孔子对各位弟子所说的关于恕的涵义，却并不因人而异，其定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毫不含糊，没有伸缩的余地。这与他谈到仁的时候的口气成为强烈的对比。事实上，恕字是孔子道德系统的核心。

颜回与冉雍二人倘若有过端木赐的机会，可能政治上的成就比端木赐大。然而在实际上，端木赐的政治成就确非圣人的任何一位别的弟子所能及。

端木赐维护孔子的令名，也比任何一位别的弟子热烈^②。叔孙州仇（叔孙武叔）毁谤孔子，端木赐向叔孙州仇说：“孔子高得像太阳与月亮，没有人能超过他。”陈子禽以为孔子不见得比端木赐更好，端木赐教训陈子禽：“一个君子说话应该谨慎。某一句话，可以显出你有智慧；另一句话便显出你的愚蠢。孔子之不可及，像天一样。孔子倘若有机会，就能够使得一个国家安全，走上正路，使得人民安定，和平相处。孔子

在世的时候活得光荣,死的时候,令人悲伤。(我怎么能比得上孔子?)”

有若干位弟子偕同端木赐于孔子死后造了临时房子,住在孔子坟墓的周围。其中,言偃(子游)与卜商(子夏)二人是以“文学”著名。所谓文学,包括当时的各种古代文件。这两人其后也像孔子那样,办了自己的私立学校。另有两位,颛孙师(子张)与曾参(子舆),起先没有言偃与卜商的名气大,但其后也在“文学”上颇有造诣,也办了自己的私立学校。

端木赐于“庐墓”三年以后,又独自庐墓了三年,前后共有六年^⑨。

六年以后,他离开鲁国,去了齐国。他在齐国又作了些什么事,没有留下记录。也许齐国其后之所以成为文明仅次于鲁,端木赐颇有关系。齐鲁两国在此后的三个世纪之中成为文化中心,吸引了“中国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学者。

言偃^⑩留下了《礼记》之中的若干篇。这若干篇,是他在今江苏省的某处办他的私立学校之时所写或所编。他也在鲁国武城担任过邑宰。孔子到过武城,看见当地人民于言偃指导之下对音乐很肯学,大为高兴。

《礼记》之中的一篇《礼运》,含有一段孔子关于大同的理想,这理想远超过孔子当年(作司寇之时)将三个大城“除防”的主张,或(在卫国担任顾问之时)想对卫孝公提出的“正名”的建议: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不出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样的一个人全人类大同社会，倘若实现，将要超过一个近代改革家的梦想。世界上将不再有战争、暴君、官僚、自私的富人、无助的穷人；代之而起的是永久和平，有德行的被选出来作官吏，百分之百的就业与兄弟一般的互相友爱。

言偃比孔子小四十五岁；比卜商小一岁。卜商为鲁国政府服务，充任过莒父的邑宰，与言偃之为武城宰同时。

据《论语》说，卜商的专长是《诗经》。他对于《诗经》中某些诗有新的看法。这些新的看法使得孔子开心。他也许又是一位大历史家。有些学者认为《左传》是他所写；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国语》是他所写^①。

卜商在圣人坟墓之旁住了三年以后，去到魏国，在西河城创办了一所学校，教了很多学生，其中之一人是封建诸侯魏文侯。另一人是有名的法家李悝。

在年轻一代的孔子弟子之中，还有两位：颛孙师（子张）与曾参（子舆）。他们分别比孔子小四十八岁与四十六岁。

颛孙师是陈国人。他成为孔子的学生，是在孔子留住在陈国的时候。他为人有志气，又有劲儿，想成为一个大政客。他向孔子所问的问题，很多是有关政

治的。圣人告诉他：“你想投身政治，必须‘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听到别人所说的话，如果自己不太能够相信，你就不要跟着说；自己真能够相信的，也要很谨慎地加以选择，才能够说。”孔子又告诉颛孙师：“你必须‘多见阙殆，慎行其余’：你看见别人所做的事，不可一一模仿，其中危险的事不要做；不危险的事，在施行的时候也要十分小心。说话谨慎，所得罪的人就少；做事谨慎，所后悔的事就少。（这样，你的政治前程便在其中。）

颛孙师似乎并未彻底依照孔子的指示去做。他的同学很少喜欢他的为人态度与其后他办学的方法。然而，他并非做事回回皆错，或说话句句皆错^②。

卜商有一次告诉颛孙师的学生：“交朋友要选择你可以接受的人，拒绝你所不能接受的人。”这些学生回来告诉他们的老师（颛孙师）。颛孙师说：“倘若我自己好，应该可以与任何人做朋友；倘若我自己不好，那么别人先要拒绝我，我如何还能拒绝别人？”

曾参^③本人是孔子的弟子，他的父亲（曾点）也是孔子的弟子。他智慧不如颜回，但在传递孔子教训给后世这一项工作上，他的贡献比颜回大。很多人以为他是《礼记》之中《大学》一篇的著者，也是《孝经》那一本书的著者。他也办了一个自己的学校，如同颛孙师、卜商、言偃，以及其他若干弟子。他与这些人不同的地方是：他有孔子的孙儿孔伋（子思）作为学生之一。是经过他与孔伋，以及受了孔伋的间接影响的一位姓孟名轲被后世称为孟子的学者，孔子教训与孔子

行谊的精华才被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成为中国人道德思想与政治思想的主流。

另有几位孔子的(直接)弟子，也值得一述：有若^④，貌似孔子，行为也像孔子；宓不齐(子贱)，曾经被孔子称许为君子^⑤；南宫适，也曾经被孔子称许为君子；原宪，宁可贫穷，而不贪物质上的舒服，却很快乐地活在道的天地之中^⑥；商瞿^⑦，被孔子传授《易经》的本文与各篇《传》，他也把这《易经》本文与各篇《传》，传给了后代。

我个人以为仲孙何忌(孟懿子)也是圣人的弟子之一^⑧。当然，他不该被列在七十七位(受业身通的)弟子之内。他可能是那些有时来访问孔子的三千人之一。

八、间接弟子

在孔子的间接弟子之中，有三位最突出：孔伋、孟子与荀卿。孔伋在《礼记·中庸》中，扩充了孔子关于天人关系的若干观念^①。孔伋认为天与人被统治于同一原则：诚。诚便是真实。不真实的东西，不能存在。孔伋说：“诚是天的原则，行诚是人的原则。”^②于是，教育成为必要。少数的人，保存了天生的诚；多数的人，未能保存。这些多数的人必须用教育来启发；来告诉他们行诚是如何的必要，一个不诚的人，毫无内容；也就是一个并不真正存在的人。一个人越是诚，他的影响力越大。以后，只有天，才是他的极限。他将要“赞

天地之化育”，使得植物、动物、人类能够生存，能够蕃殖，能够进步。

这样的一个人值得称许的(行诚的)人，依照孔子的标准，是一个君子。这样的一个人肯读书、探讨、思考、辨别真假、勤于实行，以改善自己，造成和谐于家里的人之间，国里的人之间，全世界的人之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对父母孝、对兄弟友爱、对妻和气、对朋友守信、对君主忠心^③。他兼有智、仁、勇。他知道在过与不及之间采取适当的“中道”，他守“中”。他也能够于变动不居的宇宙之中，辨别出来什么是不变的“庸”。

孟子(大约生于公元前 371 年，卒于公元前 289 年)，所过的生活很像孔子的生活。他办了一个私立学校，在某一个或几个国之内当了类似卿的大官，或顾问，周游了很多地方，试图劝说几个君主实行他的改革思想，没有成功，终于失望而死。他留下一部书，像《论语》，虽然比《论语》篇幅多，内容也比较详细。这部书^④在中国被称为《孟子》；曾经被李雅各(James Legge)、卫礼贤(Richard Wilhelm)、袁擢英(Chaucer Yuan)等人译成西方文字。

孟子于公元前 320 至 300 年之间活跃于齐魏两国。在年代上他不可能是孔伋的直接学生之一。孔伋是在公元前 483 年诞生的。这一年，也是孔伋的父亲孔鲤去世的一年。孔伋不可能活到一百岁以上而成为孟子的老师。孟子很可能是孔伋一个学生的学

生。

《孟子》一方面保持孔子教训的主要部份，一面更进一步强调人类性善。孔子是否曾经主张人类性善，我们没有足够的史料作为论据。《论语》之中，仅仅有一段说：人类生下来大体相同，是习惯把他们弄得越来越互不相同。（“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然而孔子这位圣人确也说过：“仁者人也。”这样，仁的定义可说是“人的本质”；引伸为慈爱，宽惠。（既然人的本质是仁，可见人人天生皆仁，天生性善。）

从孔子去世到孟子行道，时代已经变得不少，有好几派不同的思想，互相争取听众于鲁、齐及其他国家。孟子强调人类性善，为的是叫听他们说话的人确信人类由于本性是善，虽然某些人后来行为不好，却是有改造的可能的，也就是可教的。孟子自己一定是有如此的确信，否则他不会竭力劝那几个坏君主如梁惠王^⑤与齐宣王接受他的改革主张。

孟子所提出的改革计划，是给每一名农夫与他的家庭以周制一百亩的田地。周制一百亩，近于十个英亩。税是采取劳动的形式，每一家农夫助耕公田的一部分（八家共耕公田一百亩），公田的收入归于政府。

孟子在哲学方面，不仅是改革家，而且是革命家^⑥。他提倡革命，说一个君主倘若成为暴君，便丧失了天命；人民有推翻这暴君的权利。天是为了人民而设君主；不是为了君主而设人民。

孟子之崇敬孔子，不亚于端木赐之崇敬孔子。孟子认为孔子是自有生民以来最伟大的一个人；孔子这

个圣人向人类指点了一条道路。

孟子自称是孔子的信徒。他为孔子的仁与孝两条教训而辩护,反对为我主义的杨子与兼爱主义的墨翟(“为我”是只爱自己,不爱别人,是不仁;“兼爱”是把自己父母看得与别人的父母没有分别,是不孝。)

在孔子信徒的圈子里,孟子有一位竞争者:荀卿。荀卿大约生于公元前298年,卒于公元前238年。他的生年,晚于孟子约七十年。后世的人们记得荀卿,因为荀子说过人类性恶。但是现有的一部题为《荀子》的书,其内容并非完全出于荀卿之手。

荀卿在逻辑上所设的大前提,是人类根本与其他动物没有不同,皆有求生存的本能。一个婴儿不知道什么是善,婴儿必须有人教他什么是善。一个成年人,也必须有人教他。这样的一种教育,其主要部分应该是孔子所加以界说的礼。在人民之中,被教了礼而仍然不肯为善的分子,必须用法律来施以制裁。

从荀卿开始,法律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有了像样的地位。荀卿的学生之一韩非,将要完全放弃孔子的“德治”教训,而变成一名百分之百的法家。

荀卿的另一名学生李斯,会走得离开儒教那么远,至于怂恿秦始皇帝烧掉秦帝国之内所有的儒家经典(与法家以外其他学派的书籍),将每一个持有这些经典与书籍的人治罪。

代替秦朝皇帝而作为统一的中国之君主的汉朝皇帝,放弃秦朝的反孔政策,不再禁止儒家经典,而且在国立大学之中特设讲座,传授这些经典。

汉朝不曾产生多少高级的儒学专家,只产生若干训诂家与校勘家。根本,儒学于孔子铺陈了以后经过有独创能力的人如孔伋、孟子、荀卿加以不断扩充,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增加了。在整个汉朝四百年之中,唯一值得注意的一位儒家是董仲舒^⑦。董仲舒是一位正直的人,也是一位大作家,可惜他在所著的《春秋繁露》一书之中,将儒学传统与阴阳家的理论掺合在一起。

在汉朝崩溃以后,佛教兴盛了八百年,儒学消沉了下去,像长期的日食一样;虽则先后有若干皇帝及其官吏,以他们自己的别有用心的动机,将孔子这个圣人神化^⑧。甚至在儒家经典被指定为文官考试的主要科目以后,配得上称为“大儒”的人依然极少。一般的人民却被圣人的道德教训所融化了。

我们必须等候到宋朝,才能够在地平线上发现几位突出的思想家以其新学说赋予孔子的天人哲学以光荣。这些新学说为(今日)西方世界所熟悉,被西方世界称为“新儒学”。代表他的是程颢与程颐兄弟二人^⑨与朱熹、陆九渊、王阳明。他们相当成功地把儒学所原来不曾充分发挥的本体论与宗教性加以补充。他们给了儒学经典以若干新的解释,大量运用《礼记》中的《大学》与《中庸》两篇,以及《孟子》这一部书。他们也撷取了佛家与道家书籍中对他们有用的部分,于是把儒家的理论提高到从来未有的境界。当然,《论语》中所保存的孔子的话,与他们(新儒家)的说法之间,颇有若干歧异。这些歧异是无可避免的;而且在

某种意义上颇为必要。

程颢生于公元 1032 年,卒于 1085 年,他把孔子关于天的概念,发展为所谓“天理”,常常简称为一个字:“理”。孔子之所谓天,是一种相当抽象的力。这个力可以被认作一个人格化的神;也可以不被认作一个人格化的神。程颢之所谓天,却成了无所不在,统治一切,产生一切,自足而不变的东西(物事)。这个东西的本质,是仁,也就是爱。他也可以被称为自然,人的内心,等等;因为(在程颢看来),这个理与人的心,是一个东西。程颢相信,人是这个“理”的一部分,正如宇宙之中的万物。

他的弟弟程颐生于公元 1033 年,卒于 1107 年,思想与他的几乎相同,但在有些重要的细节上颇不一样。程颐在性格上较为严肃,不肯纯粹依赖“心”来改造一个人的道德。他认为经由推理所得的知识,重于“直觉”或“善的天性”。他喜欢谈论“生”的程序,认为“理”在其所生的东西以前已有,而“理”亦仍在继续不断地生新的东西。理(所生的东西,亦即)所作的物质表现,叫做“气”。虽然如此,程颐之作为“一元论者”,不异于他的哥哥程颢;因为,程颐之所谓理与气,实际上是一个概念的两面。不过,我们也无法否认,程颢倾向于我们今天所称的观念主义,程颐倾向于我们所称的理性主义。

朱熹生于公元 1130 年,卒于 1200 年,是一位大综合家^⑨。他研究了所有的古代文书及其传与注疏,加上程氏兄弟的文学遗产。陈荣捷教授说得好:朱熹

把每一个儒学概念,提到更高的高峰;“也使得新儒学成为真正的儒学。”他写了不少的信与不少的书,包括《四书集注》。

朱熹的竞争者陆九渊生于公元 1139 年,卒于 1193 年,不曾写过任何书。陆九渊^⑩只是说话,对着成千的人说话,包括朱熹本人。陆九渊所相信的是思与行。当他说话的时候,他前后一致,无可驳倒,令人信服。他劝勉他的学生们依赖内在的智慧,把自己的好的意愿转化为行动。

元朝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无生产的时代,倘若明朝没有产生一颗巨星王守仁(阳明先生,生于 1472 年,卒于 1529 年),那么明朝几乎也是如此。王守仁^⑪的学问,一方面渊源于孟子、程颢、陆九渊,另一方面得力于他自己在公务生活上所遭逢的挑战。他在种种困难与危险之中,作深度的思考。最后他发觉了在他自己的内部,潜藏有无尽的智力与巨大的威力。这些也就是孟子所称的良知与良能。王守仁也发明了如何把良知与良能施展出来的技术。这些便是“行”。在他看来,知识从来就不是抽象或静态的东西;知识与行动是一件东西。没有行动,就没有知识;有了行动,知识会自动地形成起来。

在明朝末年与清朝初年,有几位第一流的学者如黄宗羲(1610 至 1695)、顾炎武(1613 至 1682)与王夫之(1619 至 1692)。他们在思想上属于儒家,却不是能以新概念加在儒学宝藏之上的理论家。

清朝在考证方面有丰富的产品,但在哲学的努力

上很贫乏。要等到 19 世纪的最后十年才有两位 1898 年改革运动的领袖康有为(1858 至 1927)与梁启超(1873 至 1929)提出关于儒学的新见解^①。

其后,孙逸仙(1866 至 1925)在对他的追随者、朋友与访问者谈话之时,说:他的若干革命观念是从孔子的教训发展而来。在他的革命学说之中,革命的基础是爱,不是恨。

除了上述的若干位以外,中国的历史上还有无数其他的孔子间接弟子。成百的儒家,于公元 2 世纪,挺身而出,反抗当权宦官。在 13 世纪、17 世纪、20 世纪,若干抵抗外侮的英雄,每每也是在儒学上颇有造诣的知识分子。

张其昀教授在他的“孔学今义”一书之中说:“了解了孔子,便了解中国。”

孔子对中国人提供了“道德学上的共识”。这个共识把中国人融合为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具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生命力。孔子不仅做了这一件事;他也对全人类指出了一条路。

注 解

一、早年

① 孔子在宋国的祖先。周朝的习俗之一,是贵族实行长子继承制,次子以下另立门户,以祖父的“字”为氏。宋国第一位以孔为氏的是孔皋夷,他的祖

父名嘉，字孔，称为“孔父”、“父”是男子的美称。有时候他的氏与名被连称为“孔父嘉”。《左传》说，嘉做了宋国的大司马，其后被一位政敌所谋杀。嘉的父亲是正，字“考”，称为“考父”，有时候名氏连称，被称为“正考父”。“正”考父曾经是宋国三个公爵的太宰。

依照“史记索隐”所引的一段古本“孔子家语”，正考父的曾祖是“何”，字“弗”，称为“弗父”，亦称为“弗父何”。弗父何是宋湣公的世子，把继承君位的权利让给了弟弟“鲋祀”。鲋祀在《史记》之中，被称为宋厉公，因为他死后被谥为“厉”。

皋夷的儿子孔防叔，从宋国迁到鲁国。防叔的孙儿，是孔纥。（孔纥字“叔梁”，常被称为“叔梁纥”；由于做了鄆邑的宰，所以有时也被称为鄆叔纥，鄆人纥。）

② 孔纥的勇敢事迹。他在公元前 563 年，空手把一个敌国都城的悬门举起（《左传·襄公十年》）。七年以后他带了三百名兵士冲破齐国军队的阵线（《左传·襄公十七年》）。

③ 手中拿了小型的想像中的祭器。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

④ 成了有名的射手。见《礼记·射义篇》。

⑤ “可能选定了驾驶，作为我的专长。”见《论语·子罕》第二节。节次依照李雅各的英文译本。

⑥ 他指出天文官员算错的地方。例如《左传·哀公十二年》所记载的一件：“仲尼曰，……今火（心星）犹西流，司历过也（漏列了一个闰月）。”

⑦ 他差不多每一天都唱歌。见《论语·述而》第九节。

⑧ 他会击磬。见《论语·宪问》第四十二节。

⑨ 他会弹琴。见《史记·孔子世家》。

⑩ 他会弹瑟。见《论语·阳货》第二十节。

⑪ 礼提供了每一个人以稳妥的立足点。见《论语·季氏》第十三节。

二、一座私立学校

① 曾经在政府中担任职务。见《孟子·万章下》第五章。

② 孔子不限定学费的数额。（《论语·述而》第七节：“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意思是：凡是已经会扎好腰带的孩子，或更大一些的人，我没有不肯教的。这一段话，有人解释为：“只要带了一捆子的干肉来的，我没有不肯教的。”请参看程石泉著《论语读训解故》，110～111页。

③ 君子。见《论语·雍也》第十六节；《宪问》第三十节；《里仁》第十节；《公冶长》第二十四节；《卫灵公》第十八节；《学而》第一节；《卫灵公》第三十一节；《学而》第十五节；《述而》第十五节。

④ 孔子弟子的数目。见《史记·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在七十二人之中，至少有十八位来自鲁国以外的国。

⑤ 郈子。见《左传·昭公十七年》。

⑥ 路上的人。见《论语·述而》第二十一节。

⑦ 兼用勤学与深思两种工夫。见《论语·为政》第十五节。

⑧ 孔子日常举止。见《论语·乡党》第一节至第十七节。

⑨ 他养了一条狗。见《礼记·檀弓下》。

三、鲁国的政治

① 有十八个或更多的有城墙的城市。参看本节地图。

② 晋,齐,等等国家。参看第五节地图。

③ 鲁国的兵力。鲁国的兵力随时略有变动,但强盛时不太超过一千乘,衰弱时也不太少于一千乘。每一乘有三位高级军官,七十二位步兵。有人说,此外尚有二十五位掌管给养与兵器及其其他事务的附属兵。

④ 周公国的列代公爵,包括一位颇有名的“周公黑肩”。

⑤ 鲁的列代侯爵。伯禽与他的后代,是侯爵,不是公爵,有诗经中的《閟宫》为证:“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为周室辅。”很多人不解古语中的“公”字有两个涵义,一个是指公爵,另一个是指一般的国君。鲁昭公,只是被谥为昭的国君,而不是一位公爵。(正如郑庄公也不是一位公爵,而只不过是一位伯爵。)

⑥ 孔子的出生日期。《春秋谷梁传》说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周历)十月庚子日。这一天,相当于

公历公元前 552 年 9 月 22 日。《公羊传》把孔子生日写作鲁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日；但是这一年十一月并无庚子日。因此，我们不妨依从《谷梁传》的说法。有人把这个十一月庚子日，放到襄公二十二年。他们的理由是：《史记·孔子世家》曾经把孔子生年写作襄公二十二年。他们用了《孔子世家》的年，加上《公羊传》的月日，推算出孔子诞生之日为公元前 551 年 9 月 28 日。

⑦ 鲁国的卿。鲁国有三卿五大夫。三卿是司徒、司马、司空。司寇为五大夫之一。

⑧ 昭公袭击季孙意如。见《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至昭公三十二年》。季孙氏的设防官邸在鲁国国都，不在费邑。

⑨ 阳虎实行政变。见《左传·定公五年至定公八年》。

⑩ 阳虎劝孔子参加他的政府。见《论语·阳货》第一节。

四、痛心的经验

① 孔子在中都所作的事。《礼记·檀弓上》：“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是知不欲速朽也。”

今本《荀子·宥坐》篇有一段，说孔子在担任中都宰的时候，杀了大夫少正卯。少正卯的所谓罪名，是“言伪而辩”，“行僻而坚”。他实在没有应该被杀的理由。孔子一向反对用杀人的方法治国。崔述在他的

《洙泗考信录》里面,指出当时鲁国没有一位大夫叫做少正卯。(崔述生于公元1740年,卒于1816年。)

② 司寇。“寇”这个字,在古时候意义是“贼”。司寇的主要职务是捉贼。在近代,这个字有了“入侵者”的意义。

③ 沟而合诸墓。见《左传·定公元年》。

④ 堕三都。《左传·定公十二年》说仲由(子路)是发动此事的人。倘若说仲由是依照孔子的吩咐行事,则更近于事实。参看《公羊传·定公十二年》。

⑤ 公山不狃。《论语》这一段是后人的渗入之作,《阳货》第五节:“公山弗扰(不狃)以费畔,召;子欲往。”事实上,这公山弗扰正是孔子以仅次于三卿的司寇身份所讨伐的对象。另一段渗入之作《述而》第七节说:孔子颇想投奔一位在中牟造反的佛肸。事实上,到了孔子死后四年,才有人在中牟造反。

⑥ 两人逃往吴国。他们两人在吴国参加军队,于公元前487年吴国伐鲁之时扮演了重要角色。见《左传·哀公八年》。

⑦ 跳舞女。见《论语·微子》第四节。

⑧ 胙肉。见《孟子·告子下》第六章。

五、有目的之漫游

① 如何治国。见《论语·颜渊》第十一节。

② 齐景公。砍脚:见《左传·昭公三年》。打消重用孔子的念头:见《论语·微子》第三节。

③ 六万个单位的谷类。见《史记·孔子世家》。

这六万个单位,可能是指周朝的斗。每一个周斗相当于 1.937 公升。六万个周斗,约合美国三千三百个蒲式耳。

④ 叶国。叶国的国都在今日河南省叶县县城之南十英里左右。孔子可能是在该地见到叶公;或是在蔡国旧都,亦即河南省新蔡县见到叶公。

⑤ 孔子在洛邑见了老聃。这是近代中国学者争论得很激烈的一个问题。在我看来,《老子》这一部书不像是写在《论语》与《孟子》以前的书。然而孔子之曾经在洛邑见到一位叫做“老聃”的人,似乎没有什么可疑。请参看《礼记·曾子问》。

⑥ 苋弘。见《礼记·乐记》篇。

⑦ 孔子游了杞国与宋国。见《论语·八佾》第九节。《礼记·中庸》篇,第二十八节。

⑧ 陈湣公。陈国列代的侯爵,是帝舜之后。陈湣公的父亲怀公,曾经到了吴国被扣留,死在吴国。陈湣公即位以后,在公元前 496 与 489 年两次被吴国打败;在公元前 486 与 478 年两次被楚国打败。到了孔子去世后的第二年(公元前 478 年),陈湣公失掉了他的国,也失掉了他自己的生命。陈变成为楚国的一部分。见《史记·陈胡公世家》。

⑨ 君子亦有穷乎? 见《论语·卫灵公》第一节,第二段。

⑩ 使得邻近的人快乐。见《论语·子路》第十六节。

⑪ 告发他的父亲。见《论语·子路》第十八节。

⑫ 你的老师是怎样的一个人？见《论语·述而》第十八节。

⑬ 他们在陈国住了最久。据《史记·陈胡公世家》，孔子于公元前 496、489、485 年，都曾经住在陈国一些时候；据《左传·哀公三年》，孔子于公元前 492 年也曾经住过陈国。

⑭ 桓魋。见《论语·述而》第二十二节；《子罕》第五节；《先进》第二十二节；《史记·宋微子世家》。

⑮ 在蒲邑用武力自救。见《史记·孔子世家》。

⑯ 仪封人。见《论语·八佾》第二十四节。木铎是铜制的铃；用木头作舌，是为了叫这铃子发出较为和平而不近于杀伐的声音。

⑰ 正名。孔子之所谓“正名”，我以为不是迁就现实而更改主名，而是改变不良现状以求名实相符。换句话说，这正名两个字，倘若解释为“循名责实”，便不致引人误解了。

⑱ 孔文子。孔文子与孔子有过一次“问阵”的对话，记载在《左传·哀公十一年》之中。《论语》的编者把这对话，记载为卫灵公与孔子的对话（《论语·卫灵公》第一节）。事实是，孔文子对自己的女婿“太叔疾”用兵，向孔子请教打仗的战术。孔子很生气，（气的是孔文子这样的人要和女婿兵戎相见）便藉口自己不曾学过军旅之事而不肯作答。孔子而且立刻准备离开卫国。孔文子向孔子道歉；这件事也就告一结束。其后不久，鲁国有递信人来邀请孔子回国。于是孔子便向卫孝公与孔文子二人辞行。

六、晚 年

① 讨伐齐国的朝臣。见《论语·宪问》第二十二节。

② 另一项忠告。见《左传·哀公十一年》。

③ 颜回不迁怒，不贰过。见《论语·雍也·先进》第六节。

④ 天丧予。见《论语·先进》第八节。

⑤ 仲由曾经是蛮横的强人。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⑥ 对蒯聩的部下战斗而死。见《左传·哀公十五年》。

⑦ 孔子对《诗经》的贡献。《诗经》中的三百零五首诗，可能是从他在周游之时辛苦搜集来的无数的宗教诗歌与民谣之中选出来的。没有被选进《诗经》的诗歌很多，有些在《论语》和《左传》里面被保存了。

⑧ 孔子对《乐经》的贡献。他自己说过，“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见《论语·子罕》第十四节。

⑨ 孔子对书经的贡献。关于孔子之曾否选出一百篇古代文件作为《书经》，争论多过关于他之选录三百零五首诗歌作为《诗经》。最好的一部近代人关于这个问题的书，是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这部书里面，不仅有今文《尚书》，而且也有散见于他书之中的古文《尚书》的断简残篇。

⑩ 二十八篇。司马迁说过，今文尚书有二十九

篇。他的意思是说,《泰誓》一篇也在今文尚书之内。(《泰誓》出现在汉朝之时,比其他二十八篇晚。)不幸今日我们所能见到的所谓《书经》,例如《十三经注疏》之中的《尚书》,其中的《泰誓》一篇的内容颇成问题。因此之故,一般近代学者都说今文尚书只有二十八篇。

⑪《礼经》。现在大家相信所谓《礼经》,便是现存的《仪礼》。

⑫孔子曾否改写《春秋》?我个人以为他曾改写。不仅《公羊传》里面有“何以书?”《左传》之中也有类似的话。

⑬变成了一部道德哲学。孔子把古代占卜者的命运论,变成了关于人生的正面指示,强调人可以改变环境与改变自己,只要有决心。参看《易经·文言传》,与《系辞传》之中所征引的孔子的话。

⑭孔子之死。关于孔子之死,《礼记》卷三,即《檀弓上》篇有精彩的叙述。

⑮弟子庐墓三年。见《孟子·滕文公上》第四章,第十三节;《史记·孔子世家》。顾理尔教授(Prof. H. G. Creel)认为这句话很可相信。他说,“弟子之中,有几位一向在国际舞台上很活跃的,突然销声匿迹,有几年不曾露面。”见所著《孔子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第四章附注。

七、直接弟子

①颜回。见《论语·先进》第十三节;《为政》第九

节；《公冶长》第八节；《雍也》第九节。

② 用夏之时。见《论语·卫灵公》第十节。夏历在公元 17 世纪时有过若干修正，到今天仍被中国人民沿用，改称为农历。夏历的岁首相当于公历的 1 月末了一个星期或 2 月的第一个星期，比商历周历的岁首更接近春天的开始。商历的岁首比夏历的岁首早一个月；周历的岁首比夏历的岁首早两个月。

③ 乘殷之辂。李雅各(James Legge)从他所认识的中国朋友那里听到说：殷(商)朝的大车子(辂)，比周朝的大车子朴素。

④ 服周之冕。殷朝的冕，可能也比周朝的冕朴素。但是，冕是戴在头上的，应该讲究而正式一点。所以孔子认为周朝的冕比殷朝的冕好。

⑤ 克己复礼为仁。见《论语·颜渊》第一节。孔子显然是世界史上首先劝人“自制”的一位哲学家。

⑥ 颜回仰慕孔子的一段话。见《论语·子罕》第十节。

⑦ 其他关于颜回的记载。见《论语·雍也》第五节；《泰伯》第五节；《公冶长》第二十五节。《礼记·中庸》第八节。

⑧ 冉耕。见《论语·雍也》第八节。

⑨ 闵损。见《论语·雍也》第七节；《先进》第四节、第十三节。

⑩ 冉雍。见《论语·雍也》第一节；《颜渊》第二

节；《子路》第二节。

⑪ 仲由。见《论语·述而》第十节；《公冶长》第七节；《雍也》第六节；《颜渊》第十二节；《为政》第十七节；《公冶长》第十三节；《宪问》第三十八节。

⑫ 冉求。见《论语·公冶长》第七节；《子路》第九节；《雍也》第十节；《先进》第二十一节。

⑬ 公西赤。见《论语·雍也》第六节；《先进》第二十五节。

⑭ 宰予。见《论语·公冶长》第九节；《雍也》第二十四节；《阳货》第二十一节。在今天流行的《论语》版本中，《公冶长》第九节把“画寝”印成了“昼寝”。参看刘宝楠《论语正义》1978年台北中华书局版，第六节，第八页下。

⑮ 端木赐。见《论语·宪问》第三十一节；《先进》第十八节；《子路》第二十节；《颜渊》第二节；《卫灵公》第二十三节；《雍也》第二十八节。

⑯ 恕。美国 Random House 英文大字典(1966年版)所下的定义：“the intellectual identification with or vicarious experiencing of the feelings, thoughts, or attitudes of another person.”

⑰ 樊须。见《论语·颜渊》第二十二节；《子路》第十九节。

⑱ 端木赐维护孔子的令名。见《论语·子张》第二十四节、第二十五节。

⑲ 端木赐庐墓六年。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⑳ 言偃。见《论语·先进》第二节；《阳货》第四

节。

② 卜商。见《论语·子路》第十七节；《泰伯》第八节；以及其他几节。

③ 颛孙师。见《论语·为政》第十八节；《子张》第三节、第十五节、第十六节；及其他各节。

④ 曾参。见《论语·学而》第四节、第九节；《里仁》第十五节；《泰伯》第五节、第六节；《颜渊》第二十四节；《宪问》第二十八节；《子张》第十七节、第十八节、第十九节。

⑤ 有若。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⑥ 宓不齐。见《论语·公冶长》第二节。

⑦ 原宪。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⑧ 商瞿。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⑨ 仲孙何忌。此人的父亲(孟僖子)曾经在去世以前,遗命仲孙何忌与他的弟弟去拜孔子为师,学礼。见《左传·昭公七年》。

八、间接弟子

① 中庸的作者。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之中,说《中庸》的作者是孔伋。参看高明《大学辩》。

② 诚。“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见《礼记·中庸》第八十节、第十八小节。

③ 五伦。除了发挥诚的教训以外,《中庸》作者也列举了五伦,这是他的另一伟大贡献。

④ 孟子。《孟子》这一部书,可说是现存中国书

籍之中一部完全真的书；书的编者是孟子及其弟子，也没有可疑之处。

⑤ 梁惠王。他的正式头衔是魏国之王。因为他把都城从魏邑迁到大梁，因此也就被与他同时的人称为“梁王”了。“惠”字是他死后的谥。大梁是今日的开封。魏本是晋国国内的六卿之一的封邑；六卿窃权世袭，又互相争战，剩下韩赵魏三家。到了战国时代，这三家变成三个侯爵国，又进而成为王国。

⑥ 孟子提倡革命。孟子夸奖那推翻夏朝的商汤，说他“解民倒悬”；也夸奖那杀了商朝最后一王的周武王，说他杀了一个人人讨厌的“独夫”。孟子在和齐宣王与梁惠王谈话之时，态度很明显，希望这两人之中的任一个，起来统一中国于仁政之下。

⑦ 董仲舒。洛杉矶加州州立大学的谭载岳教授，作了关于这位儒家的详尽的研究。谭教授的结论是：董仲舒为古代儒家与郑玄之间一个不可缺少的桥梁，而郑玄的著作使得宋代的新儒家重新发现若干古代儒家的教训，因此而把这些教训在他们自己的体系中加以发挥。

⑧ 神化。看希喇埃奥克所写的《孔子成为国教的起源与发展》，一九六六年，帕喇宫书局出版。

⑨ 二程。陈荣捷教授在他的《中国哲学史料》一书之中的 518 页至 519 页说：“事实上程颐比程颢是如此的更偏于理性主义，程颢比程颐是如此的更偏于

观念主义,我们可以说程颢创始了新儒学的观念派,而他的弟弟程颐创始了新儒学的理性派。他们两人之间的不同,被最近几位学者说得过分了一点。……他们两人之间的相同之处,是‘理’的概念。这个理的概念是他们两人的哲学的主题,也是一般新儒学的主题。”

⑩ 朱熹。关于朱熹的言论,钱穆教授编有一部《朱子新学案》。

⑪ 陆九渊。截至今日为止,有关陆九渊的书,最好的一部是黄秀玑的《一位十二世纪的中国理想主义的哲学家:陆象山》,1944年,纽海芬城美国东方学会出版。

⑫ 王守仁。关于王守仁的道德哲学,王昌炽于1936年在巴黎大学提出的博士论文是一部持平的研究。

⑬ 康梁。康有为除了别的书以外,也写了《新学伪经考》。梁启超在这一方面的著作是《先秦政治思想史》。

中文参考书选目

崔述,《洙泗考信录》。台北世界书局重印。

梁启超,《孔子》。台北中华书局重印。

陈立夫,《四书道贯》。1969年台北世界书局出版。

陈大齐,《孔子学说》。1958年台北正中书局出版。

陈大齐,《论语臆解》。1968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

张其昀,《孔子的生平》(中华五千年史第四册)。1978年台北阳明山华冈出版有限公司印行。

张其昀,《孔学今义》(中华五千年史第五册)。1979年台北阳明山华冈出版有限公司印行。

程石泉,《论语读训解故》。1975年台北先知出版社印行。

钱穆,《孔子传》。1975年台北综合月刊社出版。

陈香,《孔子的风采》。1981年台北国家出版社印行。

贝冢茂树,《孔子》(李君奭译)。1977年彰化民族路二四八号专心企业有限公司出版。

黎东方,《孔子》。1944年重庆胜利出版社印行。

Selected Bibliography

Chan, Win-tsit: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Princeton, 1963.

Chang, Carsun: 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 Thought. N. Y., Bookman, 1957.

Chang Ch'i-yün: Cònfucianism, a Modern Interpretation. Taipei, Hua Kang Press, 1980.

Ch'en, Li-fu: The Confucian Way. Taipei, Commercial Press, 1972.

Ch'en, Li-fu: Why Confucius has been revered as the model teacher of all ages.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Creel, Herrlee G.: Confucius the Man and the Myth.

- New York, John Day, 1949.
- Crow, Carl: *Master Kung*. Harper, 1938.
- Hughes, E. R.: *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Mean in Action*. London, Dent, 1942.
- Lau, D. C. tr.: *Confucius, The Analects*. Penguin, 1979.
- Legge, James: *The Confucian Classics*. Oxford, 1893—1953.
- Lin, Yutang: *The Wisdom of Confucius*. The Modern Library, 1938.
- Liu, Wu-chi: *Confucius, His Life and Time*. N. Y.,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5.
- Pound, Ezra: *Confucius*. N. Y., New Direction, 1951.
- Smith, David Howard: *Confucius*. Scribner's Sons., 1973.
- Soothill, W. E.: *The Analects or the Conversations of Confucius*. Oxford, 1937.
- Soulié de Morant, C. G.: *La Vie de Confucius*. Paris H. Piazza, 1929.
- Shryock, J. K.: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Cult of Confucius*. The Century, 1973.
- Waley, Arthur: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Random House, 1938.
- Wilhelm, Richard: *Kung-tse, Leben und Werk*. Stuttgart, Frommann, 1925.

Wright, Arthur, ed. : Confucianism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Atheneum, 1963.

战国秦的发展

秦在春秋时代的四个头等国家晋、楚、齐、秦之中，居于最末；在战国初年的四个头等国家魏、楚、齐、秦之中，也是居于最末。何以它能够终于取得领袖的地位，并且把所有的国家一一吞并呢？

纯粹地理的原因不足以解释。僻处一隅而无后顾之忧的，晋齐楚都是如此，魏虽有齐赵可予牵制，但另有其雄踞黄河两岸的优点。说秦是占有关中的建瓴之势，是对的。然而纯就形势来说，握有上党的晋与其后跨有黄河两岸的魏，只有比秦更占便宜。

地理的原因也不是完全没有。关中平原的粮食，与其后巴蜀川谷的沙金，皆甚有助于秦国的发展。不过富足是一件事，能否善用其富足为另一事。韩赵各有其素为商业中心的新郑与邯郸；二等国家之宋于灭曹以后也占有四方通衢的定陶，均未见其曾有若何作

为。

主要的原因还是人：人才，人定下的制度，人保持着思想，与当局者的气魄。

秦国本是一个人才最缺乏的国家，却能明了自身的弱点而注重于客卿的延用。秦穆公之用由余、百里奚、蹇父，是延用客卿的滥觞。战国时代的秦国，从孝公之用商鞅数起，每一代都是信任客卿，重用客卿，得到很大的收获。客卿的长处是不仅智慧超越，而且熟悉东边各国的情形，并且不易在秦国与本地豪猾营私结党。于是惠文王用张仪，昭襄王用魏冉，范雎，始皇帝用李斯。这几位都是当时最能干的人物，可以为魏国楚国或齐国所用而终于被秦用的。

就制度来说，秦国不曾逃过了列国政权下移、大夫专政的潮流。也曾有过武臣于秦怀公至秦献公之间擅行废立，但大权最后又归于秦孝公之手。孝公又把国内的小卿小邑集合起来，成为若干便于管理的大县。这是很合于近代行政学上的要求的。秦国于初并义渠戎之时，原已开始实行郡县制度，到了孝公以商鞅为辅佐之时，便把全国整个儿地郡县化，划为四十一县。

秦国的君臣们时时抱着与人作战的决心。他们似乎以为倘不侵人，便要为人所侵，倘不灭人，便要为人所灭。所以其他的国家也许有时还诚心主张和平，希望彼此之间，能够暂时或长期相安无事；秦国是从来不肯作如此希望的。它僻处一隅，占有形胜之地，国内的秩序比起关东的六国来，又较为进步，不免养

成了一种轻视六国的心理。当时的天下也确是太乱，在乱极思治的潮流之中，秦国就渐渐成为德意志诸邦的普鲁士，意大利诸邦的皮埃蒙。儒家的大一统思想，经过二百余年的传播，也风靡于各国。加上秦国政府之重用客卿，化除国界，也摇动了各国人士的视听。在这些条件之下，所以秦国就终能以远交近攻的政策，达到了统一天下的目的。

远的是齐、楚、燕，近的是韩、赵、魏。秦国对于韩、赵、魏的不断侵削，其实是继续春秋时代的秦晋长期冲突。韩、赵、魏三国之中以魏国为最强，于是秦国便不惜联络齐楚，以打击魏国。做到这一点的，是秦孝公的辅佐商鞅。

在魏国既衰以后，秦国的目标是楚国。于是始则攻破那追随楚怀王的韩魏，继则隔绝了楚齐二国之交，终则联络了齐、韩、魏三国，大破楚于重丘。楚国从此就不再能够成为秦国的对手。做到这一点的是秦惠文王的辅佐张仪。

剩下了齐国，是一向被秦国笼络的远敌。齐国忽然于楚国既衰以后，热心于它向不参加的反合纵运动。孟尝君做了楚怀王以后的“纵长”。秦国于是再攻破韩魏一次（伊阙之役）。于短期内敷衍了韩魏，然后秦国就在表面上与齐互尊为东西帝，暗中扶植了燕国，胁迫了韩、赵、魏，以组成公元前 284 年的“反合纵”：五国共同伐齐。

等到齐国也被击溃以后，燕国更不足为患。太子丹的办法，止于派遣一个刺客，这是何等地可悯呢！

即使秦始皇能被荆轲刺死,国际间的局势也不会有多大的变更。

因为秦国不仅在军事上已经占了绝对的优势,在政治上已经有了较之六国远为进步的集权组织,而且在经济上也久已“富厚轻诸侯”了。秦国自从并有巴蜀以后,黄金甚多。它的当局,又能不惜黄金。于是各国就充满了秦的间谍;而秦的朝廷之中也充满了各国的人才。在如此的情势之下,天下怎能不被秦国统一呢?

楚汉战史

楚汉的战争，虽只经过五年，但在中国的军事史上，却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在春秋的时代，所谓战争，差不多只是一两天的交锋；其后规模扩大，有“围城”之类的举动，也至多是几个月或十几个月的战事。到了秦始皇消灭六国，时间是延长了，但交战的双方，在力量上并不是对等的。只有楚汉，才是两雄相对，而且战场扩充到当时中国幅员的全部。

一、背景

由秦始皇的统一，分裂而为六国贵族子孙的割据；这可以说是封建势力的反动。中间经过楚汉战争，由割据而又转到西汉的统一，这又表明了封建的残余力量究竟脆弱，而统一的要求才是当时的主潮。

刘邦也许把握住了这个要点,所以他终于战胜项羽。项羽在作风上,始终不曾离开封建的做法:他广封诸侯,自为霸王,努力恢复秦始皇统一以前的局面,所做的只能称为反动,不能称为革命。

刘邦呢,是起自平民:对于平民的要求,了解得较为深切。所以,后来对于诸侯王的子孙,也不像项羽对他们那样的尊重;他占领了一块新的地方,也不急于封赠给一个旧贵族,或创造一个新贵族。说他自私,当然是可以的;但他这种自私,恰好代表了反封建的平民要求,倒是天下之至公了。

参加那二世元年七月的革命运动的,可说有两种人:第一种是所谓戍卒、流氓及一般的平民;第二种是六国宗室与六国的将相遗臣。属于第一种有陈涉、吴广、刘邦、张耳、陈馥;属于第二种的,有田儋、田荣、田横、魏咎、魏豹、韩王信、张良、项梁、项羽。在号召的能力上,贵族应占优势;但时代所宠遇的,却是平民。平民不但在数量上较为众多,在方法上较为彻底,他们而且是眼光向着未来,要创造新的天下,不像贵族们仅仅留恋于割据封建的过去。在平民的领袖之中,无疑的,刘邦是意识最清楚的一个。

我们为了知道楚汉战争的背景,必先充分明了秦始皇统一的实际。我们必须清楚:秦始皇所铲除的封建,在本身上实已到了必须铲除的时候。是封建制度已经于事先崩溃了吗?“崩溃”,这字眼并不适当。我们应该说,春秋时代的典型封建,到了战国末期,已经充分“发展”而“转换”了。远在春秋的时候,采邑便已

开始集中,产生了著名的“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的现象,小诸侯的采邑逐渐沦为诸侯的郡县,这种趋势我们可以称之为前期统一趋势。其结果,是造成了七个大国于当时中国的领土之上。所有的中国人,也开始有了民族的自觉,觉得无论燕齐秦楚任何一国的人,总之都是中国人,属于一个血统,一个文化。超于七国之上的是天下;这天下,应该统一。为了实现这个统一,这七个大的公子王孙与知识分子,不再觉得必须忠于他们的小区域、小国君;只应忠于他们的民族统一的理想,可以随意选择一个诸侯如秦孝公,或一个公子如孟尝君,作为实现理想的凭藉;于是产生客卿,产生食客、辩士、游侠、亡命等等。经过相当的时期,秦国由于地理的优越及历代君主的英明,很显明的成为新中国的希望,犹如意大利民族的皮埃蒙,德意志民族的普鲁士。各诸侯国的志士都纷纷入秦,秦国也一贯地采取延揽客卿的政策,以吸收天下的人才,招引天下的属望。贵族们,也许要努力反抗那发动于秦的统一运动;平民们,至少在起初,是拥护这个运动的。

为什么终于在二世元年,平民要揭竿而起呢?原因是,秦始皇不该将专制与统一同时并行。既然铲除了诸侯贵族的政权,拿郡县代替封建,不该同时又用暴虐的手段来对付那刚从诸侯政权解放出来的平民。平民武装的普遍没收,大量的移民戍边,使得刚有喘息希望的天下人民,感觉到这新的局面较之旧的更难忍受,于是怀疑统一,追念封建,即使对于拥护旧贵族

不感兴趣的人,也想自为新的贵族,于是大家便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一夫发难,百夫响应,陈涉自称楚王,刘邦自称沛公……

等到平民既经发难以后,贵族的残余分子才跟着起来,各就本人的势力所及,从事复国的运动。但这些贵族分子,很少是六国诸侯的嫡系,简直可以说是没有。比较接近于宗室的是魏咎,在亡国以前为宁陵君,配得上称为公子。其次是田儋,为齐国宗室的远族。

在二世元年(公元前 209 年)推翻秦室的大革命之中,首先发难的是陈涉。他本是一个河南太康县农村中的长工,这时候夹在九百个戍卒之中,要远戍渔阳(河北密云),中途藉着大雨阻滞行程的机会,便煽动了同行的戍卒,说限期已经耽误;迟到,按秦的法律是当斩的;逃亡,也是不免一死;不如索性造反。于是杀了带领这九百戍卒的军官,自称将军,以吴广为都尉,定国号为大楚,不设国王,诈称秦始皇的长子扶苏与楚将项燕尚在人间,奉为领袖。后来,从安徽宿县发展到河南的淮阳,即陈国的故都,陈涉才索性自称楚王。但是天下各方崛起的群雄,都喜欢称他为“陈王”。他自己姓陈,所据的地方又是陈国的故都,所以称他为陈王,比较称他为楚王要更合逻辑,更为顺口。

陈涉在宿县起义的时候,只有九百人,到了据陈称王,便已有了战车六七百乘,骑兵千余,步兵数万。他早已分遣徒党,到各方面去扩充势力,葛婴向南,武臣向北,周市向东,吴广向西。葛婴到九江郡,立了楚

的“宗室”襄强为王，后来听到陈涉自己立为楚王，就杀了襄强，归陈请罪。武臣呢，到了邯郸，便决定自封赵王，割据为雄。

被派往东方去的是周市。当周市兵到山东的时候，齐国宗室的远族田儋，已经杀了秦朝的狄县县令，自为齐王；周市只好回兵河南，占领魏国的故地，请陈涉册封魏国的宗室魏咎。（狄县在今天的高苑县西北。）同时，赵王武臣也派了韩广，向今河北省北部去发展。韩广完成任务，却也效法武臣的故智，自号燕王。于是楚、赵、齐、魏、燕，都已有王，差不多恢复了秦始皇统一以前的局面。剩下的只是韩国的土地尚在秦手，陈涉也未曾册封何人为新的韩王。

被派往西方去的是吴广，陈涉封他为假王。吴广进展到荥阳（郑州西北）便与李斯的儿子、三川郡守李由相持不下。陈涉又另外派了曾经充当过项燕的军师的周文，率领数十万大军，绕道西进。周文顺利进入函谷潼关，进迫咸阳，驻兵于戏亭（临潼东北），不幸遇着秦将章邯极有能力，率领郿山的苦工与“奴产子”（奴隶们的儿子）大败楚军。周文退出关外，一退再退，终于自杀。

这时候已是二世元年十一月。章邯乘胜东进，解了荥阳之围，又屡败楚军于今日郑城、许昌及淮阳的西境。陈涉逃奔安徽阜阳，在蒙城西北的地方为部下所害。陈涉既死以后，部将秦嘉立景驹为楚王。陈涉的另一部将召平，矫陈涉之诏，立项梁为楚的上柱国。项梁进攻秦嘉、景驹杀了他们，成为反秦运动的领袖。

项梁拥立楚怀王的名字叫做心的孙子。(二世二年六月)。章邯已与齐魏二国的军队,会战于临济的城下,齐魏之军大败,魏王咎自杀。齐王儋的从弟田荣,逃奔东阿,为章邯所追逼。项梁与刘邦、项羽,率兵来解东阿之围,大破章邯,乘胜南屠城阳,再破秦军别将于濮阳之东。项梁留攻定陶,施以围攻。刘邦、项羽二人则向西扩展,取得雍丘,在雍丘斩杀李斯的儿子三川郡守李由;又继续攻打外黄、陈留二县。这时候,留攻定陶的项梁,被章邯统率了增援的秦军前来袭击,不幸战死。

反秦运动的前途,领导革命的责任,从此落在刘邦与项羽二人的肩上。

二、项 羽

刘邦、项羽二人在陈留听到项梁的凶耗,立即会同项梁的另一部将吕臣,回师东向,在徐州与碭山的一条线上,排成抵御定陶、保卫盱眙的阵势:“吕臣军彭城西,项羽军彭城东,沛公军碭”。

极度恐怖中的楚怀王,这时也来到彭城,与吕臣、刘邦、项羽相会。虽然是一个极平庸的人,但在危急的时候,也常能发挥很大的勇气与魄力。他突然发号施令,夺去项羽与吕臣的兵权,由自己直接统率。对于刘邦,他独垂青眼,封为武安侯,任命为碭郡的郡守:碭郡长。吕臣被他调署为司徒。吕臣的父亲吕青,被他拜为令尹。项羽被他命为副指挥:次将,让他

跟随上将军宋义，去救被围的赵国。

赵国的国王赵武臣，于章邯大兵压境的威胁之下，已为叛将李良所杀。陈馥和张耳逃出邯郸，找到了赵国的一个宗室赵歇，奉为赵王。章邯令王离追围张耳、赵歇于巨鹿城（今河北平乡县），自己留驻（平乡县南的）棘原，一面防备楚国的救兵，一面凭临大河，接应陕西与敖仓输来的粮食；在大营与王离的营垒之间，筑了一条甚长的甬道，以求便于输运。陈馥逃到正定一带，集合了几万救兵，驻军于巨鹿城的北方，但自顾兵少，未敢就与章邯交锋。燕王韩广，齐相田荣，虽则均派有援军前来，也是深沟高垒，袖手旁观。

宋义统率楚军，行抵安阳，滞留四十六日，采取了相同于陈馥及燕齐诸将的政策。是个人的胆怯？还是等待两虎相斗，一死一伤，再从而“我乘其敝”，如他自己所说？或是居心观望，暗中与齐国勾结，共谋袭楚，背叛怀王，如项羽所指摘？我们无庸加以判断。总之，奉命救赵，而不执行救赵的命令，则是事实。宋义有该杀的罪，而敢于杀他的只有项羽。

项羽是一个二十五岁的英勇少年，在山东河南都已屡次立了功勋。这时候，叔父既已死于敌人之手，自身又被夺了兵权，同时看见革命的赵国为秦军破灭，宋义却拥了大军，观望不前。国仇，家恨，义愤，与个人的郁郁不得志，都堆积在项羽的心中。他对宋义贡献立即渡河的意见，不仅遭受了讥嘲，什么“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而运策，公不如义”，又蒙受公开的侮辱与威吓，宋义下令，“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强不

可使者皆斩之！”项羽忍无可忍，拿出刺杀殷通的身手，毅然决然，第一步“即其帐中斩宋义头”；第二步，立刻派当阳君英布，率兵二万，渡河救赵。

在巨鹿的城下，英布获得小胜。陈馥继续向项羽请兵，项羽便索性率领全军渡河，沉舟，破釜，烧营，只带三天的食粮，使得全体军士，皆有必死的决心。在战略上，他采取外线包围的方法，把那位围攻巨鹿的王离，用楚军来反包围。同时，断绝王离与章邯之间的甬道。前后与秦军交战九次，九次都是楚军与秦军单独作战，诸侯军只敢作壁上观。王离终于被虏，项羽完成任务，获得诸侯将军的一致崇拜拥护，不仅为楚怀王的上将军，而且是“诸侯的上将军”。从此，他成为反秦运动的实际的领导者。

章邯于此次挫折以后，丧失了对自己的自信力，增加了对项羽的畏惧。这时候，赵高对他表示不再信任；同时也有人向他劝告，脱离秦廷，与诸侯的军队缔结合纵的条约，瓜分秦的领土，南面称王。经过六个月的考虑，与一两次的继续战败，章邯决定投降。项羽立刻封他为雍王，留在楚军的部队里，作为参议；另外派自己的亲信司马欣为上将军，统率章邯的旧部，为攻秦的先锋。

诸侯的将军，跟随项羽去西向攻秦的，有赵国的司马卬、张耳，齐国的田都，燕国的臧荼。兵员的总数，有六十万人以上。

大军行抵洛阳，张耳的部下申阳已经先期平定三川郡（洛阳一带），迎接项羽。走到洛阳以西的新安，

章邯旧部的秦军，表露出动摇的倾向，项羽便于一夜之间，将他们加以包围，全数活埋，传说埋了约有二十万人之多。

再西，走到函谷关，关上的小卒不是秦军，而是武安侯刘邦的军队。项羽这才明白，当自己与章邯相持数月，耗费光阴的时候，这留守殽山的刘邦，久已兼程西向，由南阳进入武关，占领咸阳，受秦王子婴之降，比自己先了一着。

秦朝既已覆亡，现今的问题不是反秦运动的领导权，而是今后中国政治的支配权。刘邦先项羽而入关，取得了天下人民认为最大的功勋，取得了最高的声望，取得了最佳的地势。

单纯的为了反秦，项羽就没有入关的必要，关内的秦廷现已消灭，占据关内的是同隶于楚怀王旗帜下的刘邦。但是为了争夺领袖的地位，支配今后的全中国，项羽便不能不立刻入关与刘邦一决雌雄。

刘邦派了军队，守住函谷关。项羽毫不犹豫，立刻命令英布向这一部分的“友军”攻击。这“友军”在英布的面前，真是不堪一击，一击便垮。于是项羽就率领四十万的大军，长驱直入，驻军于戏亭之西的鸿门（临潼县东），威胁咸阳。刘邦已从咸阳（今长安县东），进驻于今日霸桥所在的灞上。

项羽准备以一天的时间，击破刘邦的十万人。就在那一天的早晨，刘邦却亲来鸿门谢罪，只带了一百名卫兵。

刘邦向项羽说：“我与将军共同反秦，我担任黄河

南岸,将军担任黄河北岸,我自己不曾估计到,能够先入关,在这里见到将军,这完全是侥幸。现今是有小人,在挑拨离间我们的感情,所以我必须来解释。”年少的项羽,于是为感情所克服,不再有解决刘邦的念头;立刻以盛大的宴会,招待这一位成功的战友。

项羽对刘邦宽大,是因为刘邦先向项羽屈膝,表示拥护。中国第一人的地位,仍旧属于项羽。虽则刘邦是占了入关的首功,但真正击破秦的主力的,究竟还是救赵的项羽。真正为诸侯之领袖的,自从救赵胜利以后,也是项羽。

所以项羽就不杀刘邦而杀秦王子婴,烧了秦的宫室。又通知楚怀王,说要大封诸侯,将秦始皇所统一的天下,分成一块一块,赏给有功的将军与各国的宗室。项羽说:我要恢复封建的局面。楚怀王当然只有答应。

秦国旧有领土之中,秦岭以北的渭水流域,不宜封给刘邦,虽则刘邦颇想占有这一块肥沃的区域。项羽把他分成三块。一块,咸阳以东,封给项梁的老友,自己的部下,曾经代替章邯来统率秦军降卒的上将军司马欣,国都设在栎阳(临潼东北七十里),称为塞王。“塞”是指的“桃林塞”,就是今日的潼关。陕北,封给那最先劝章邯投降的董翳,称为翟王(翟与狄本是一字),都城设在高奴,就是延安。咸阳以西,封章邯为雍王,都于废丘,在长安县东南十里。这三个王国,合起来称为三秦,是用来监视刘邦的。

刘邦所封的地方,是秦岭以南的汉中,加上四川。

这四川也是秦的领域,但是人烟稀少,离开中原也是最远。刘邦的都城,指定为汉水上游的南郑。刘邦的封号是汉王。

赵王赵歇,改封为代王;赵国的地方另封给跟随入关的张耳,称为常山王。

齐王田市,改封为胶东王;齐国大部分地方,另封给跟随入关的田都,以田都为齐王。齐国旧有领域的北部,封给齐国的宗室田安,称为济北王,因为田安在项羽救赵的时候,曾经以济北的地域归顺项羽。这胶东王田市、齐王田都,与济北王田安,便是所谓三齐。

燕王韩广,改封为辽东王;把燕国的地方,改封跟随入关的臧荼。魏王魏豹,削封为西魏王,都于平阳(临汾)。韩王韩成,本为项梁所立,未曾更动,但暂时不许就国。最勇敢而得力的英布,封为九江王,统治当时的九江郡,都于六,今日的六安。百越的首长吴芮,封为衡山王,都于邾,今日湘潭县的株州。楚怀王的柱国共敖,攻克南郡,封为临江王,都于江陵。赵国的将军司马卬,平定河内,封为殷王,都于安阳。张耳的嬖臣申阳,首先替项羽攻下三川郡,封为河南王,都于洛阳。

以上,共有十八个国王。

项羽认为楚怀王不应继续称王,应该升格,于是尊称他为义帝。

项羽自身,是事实上的皇帝,但又表示谦逊,自封为西楚霸王;都城,他选定了徐州(彭城)。

他大封诸侯,取得霸王的名义以后,对于已焚烧

的咸阳,不再留恋,带了秦宫的珍宝美女,很迅速地回到彭城。这是当他叔父遇难的时候,他曾经一度驻兵的地方。也许这离开宿迁不远的所在,也是他儿时的故里。他认为做了霸王而不回彭城,便是“富贵不回故乡,如衣锦夜行。”

这是他一生最得意的顷刻。天下的局面,在他以为是安排妥当,事实上,到处都埋下了乱苗,到处都是危机。各国的将军,凡是跟随他入关的,都封为本国的国王,使得原有的国王都要迁徙到较苦的地域。这,便是乱苗。陈馥,一个失意于张耳的人,虽然受了三县之封,丝毫不曾感到满足;张耳一日为常山王,陈馥便一日不能停止他的愤怒与妒嫉,便要设法推倒张耳,不惜与项羽为敌。陈馥自己的力量也许很小,加上田荣,这位事实上的齐国领袖,而不曾受有尺寸之封的人,便足以扰乱项羽所统治的半个天下。

况且刘邦尚在那另一半的天下里,正在准备,正在行动,已经开始做他的统一陕西,进一步推翻项羽、统一中国的工作!

三、刘 邦

我们若是知道刘邦入关的详细经过,便不至于惊异,为什么刘邦敢于和项羽对抗,为什么他后来能够终于战胜项羽,把中国的政治重新拉到统一的道路之上。

他在入关战争的过程中,表现了他的能力,养成

了他的干部,奠定了以后成功的基础。

他有什么能力?他并不是一个军事家,更不是一个政治家,既不能斩将搴旗,或运筹帷幄,也丝毫没有具体的政治概念,或实际的政治计划。然而他表现了什么呢?他表现了肯干、舍得干、干到底的精神。还有什么?他能够用人,他知道自己能力有限,必须借重别人的能力;他又随时都觉得他自己所用的人还嫌不够多,不够好,于是不断地吸收新的人才。因此,他集合了、养成了他自己的优良干部。干部,正是事业的基础。

当他初起丰沛的时候,跟随他的只是若干最下层的平民,与最低级的官吏。樊哙,“以屠狗为事”;夏侯婴,是赶车的“司御”;周勃,“以织薄曲为生,常为人吹箫,给丧事”;萧何,是沛县的刀笔吏;曹参,是沛县监狱的看守员。

因此,在二世元年九月,他以“亡命”即土匪的资格,起事于沛县的时候,所能做的只是小股流寇式的勾当。当然,他之所以成为亡命,也有一段侠义的、类似于陈涉的经过。他本是沛县的泗上亭长,位置相当于联保主任(里长),奉了秦廷的命令,押送本县的壮丁,至陕西的骊山参加徭役。在遥远的、充满了悲惨远景的长途跋涉之中,逃亡的人数占了很高的比例。他自己并非热心于徭役、拥护秦廷苛政的人。他想,壮丁们以如此的速度逐渐逃亡,大概等到到了目的地,所剩也无几了,不如将这些可怜的兄弟们一起释放,自己也免得在交差时受累,乐得放荡江湖,不做什

么亭长，不做良民。

他以相同于陈涉的决心，干下这一件犯法的事。那时候，比陈涉起义还早，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他也就率领了十几位不愿离开他的壮丁，在离家不远的山中落草为寇。

沛县的县令，无法将他剿办。这一位县令，颇像会稽郡的郡守殷通。正如殷通企图响应陈涉，令项羽去招引大盗桓楚，结果是反被项羽所杀，沛县的县令也命令萧何去招引流落江湖的刘邦，共举大事，而结果是，刘邦来时，同时也来了几百名土匪群众。县令中途后悔，想闭门不纳，并且想斩萧何；但他很快便死于城中的“父老们”之手。于是刘邦进城，领导革命。

由于沛县的地方太小，刘邦不便称王，也不曾有别的革命集团给他以任何名义，萧何等人就共推刘邦为“沛公”。从此，刘邦就以沛公的名义，毫无所属的参加反秦的斗争，为革命势力的一小单位。

他的活动，也只是小规模流寇活动。西入函谷，直捣咸阳，他不仅没有这个勇气，根本还没有这个抱负。他所求的，只是于沛县之外，略为向外扩充，造成一块相当大的地盘。然而，由于他这时候缺乏方法，缺乏优良的干部，始终是攻下一处，便丢去另一处，能攻而不能守。并且活动的范围，只限于邻近的数县：沛县、丰县、滕县、金乡、鱼台、砀山、萧县。他只是个三四等的流寇。

刘邦从沛县出发，一口气打下了三个县：胡陵、方与、丰县，并且进展到薛县与下邑，击杀了秦的泗川郡

郡守。但是，替他守丰县的一个部下雍齿，却背叛了他，不再听他的指挥，而改听魏王咎的丞相周市的指挥。（这位魏王咎，是魏国的宗室，也已经对秦造反，自称魏王。）

刘邦回军到丰县，来打雍齿；打不过雍齿。他转往留县，向驻扎在留县的秦嘉求救。（秦嘉是陈涉集团的一份子，被陈涉派到了这个地区来活动，当时陈涉还不曾自称“楚王”。秦嘉自作主张，找到了楚国的一个宗室景驹，立为楚王，自己作了景驹的丞相。）

秦嘉给刘邦以相当的支援，让刘邦又打了三次小仗。第一次小仗，在萧县之西对抗秦将章邯的部下司马尼，被司马尼杀得大败。第二次小仗，偷袭了秦的两个县，砀县与下邑，成功了。第三次小仗，再和雍齿较量，又输在雍齿之手。

刘邦转往薛县，投奔驻扎在薛县的项梁。项梁这时候兵精粮足，已经拥立了一个名字叫做心的牧羊童子为楚王，而且称这位楚王为“楚怀王”（以纪念困死在秦国的那一位楚怀王）。项梁拨给刘邦以五千名受过训练的兵士，十位优良军官。刘邦于是一战而收复了他的丰县，把雍齿打得狼狈而逃。

以上，便是刘邦的最初活动。其后他随着项梁北救东阿，又偕同项羽南屠城阳，西取雍丘，我们都已经在前面第一节叙过。

项梁之死，是革命阵容的一大转变，其重要性不亚于陈涉之死。当刘邦、项羽、吕臣共同回师徐州、保卫盱眙的时候，“楚怀王”竟然乘机夺去吕臣与项羽的

兵权。项羽被派充宋义的次将,跟随宋义去北救赵王歇于巨鹿。刘邦被任命为砀郡长(等于是砀郡的郡守)。

其后,刘邦向西“略地”,入关破秦的壮举从此开始。怀王是否在这个时候,便已命令他西向入关,而且面约以“先入关者王之”,我们很应该怀疑。《高祖本纪》上,说项羽颇想分担入关的任务,愿意与刘邦偕同入关。但是怀王的“诸老将”顾虑项羽为入,“慊悍猾贼”,“诸所过无不残灭”,他们劝怀王不要派项羽担任这个偕同入关的任务,而改派刘邦一人去率兵入关。那末,既然所遣的只是刘邦一人,便无所谓“先入关者王之”的“约定”了。况且当时项羽已经随了宋义北上,做救赵的工作,根本不在怀王的左右,那里有什么“诸将莫利先入关,独项羽怨秦破项梁军,奋愿与沛公西入关”。事实是,刘邦自动向西发展。刘邦当时有一万余人的兵力。

也许怀王所给他的任务,根本上不是向西略地,只是北救赵国,援应宋义与项羽而已。所以,刘邦从砀县出发,向北来到昌邑,会同本地的水寇彭越,共击秦军,不利,还师栗县,夺得刚武侯的部队四千余人,会同魏国的援军,再行北向。第二次,攻秦军于昌邑,仍是不利,这才转向西南,抵达雍丘附近的高阳。

在高阳,他遇到一个当地的文人,酈食其。酈食其劝他注意粮食,袭取秦廷仓储所在的陈留。刘邦获得了陈留的积粟,声势果然大振。酈食其的弟弟酈商,也率领了他所纠合的数千入,来参加刘邦的队伍。

刘邦从陈留的西南,转而向北,到滑县之北的白马津。这是当时的一个渡口。他是否冀图由此经过山西,袭取渭北,或又继续北向,应援项羽?事实是:章邯刚于前月为项羽所败,项羽已不再需要他这一支援军,即使确曾一度需要。总之,在白马津,刘邦击溃秦将杨熊,而不急于渡河;反而向南追击,再破杨熊于中牟之东的曲遇;作战的计划,显然有了变更。

其后,他并不西叩虎牢;却向南,攻破许昌附近的颍阳,这已进入了韩国的旧壤。韩国的志士张良,曾经在留县途遇沛公,这时随了韩王成,只剩下一千余人,正在为流寇式的游击战争,“得数城,秦辄复取之”。这一支军队,自己成事不足,辅助别人,为大规模的正规军的向导或尖兵,力量却是很大。刘邦藉了韩兵的向导与张良的策划,很容易地从颍阳进入了轘辕关(偃师东南),不经虎牢,而直迫洛阳。

赵国的将军司马卬,已经奉了项羽的命令,取得黄河北岸,也在图谋洛阳。也许“先入关者王之”的悬赏,正是公布于此时吧。无论如何,刘邦对于司马卬是采取了敌视的态度,立刻断绝了偃师巩县之间的平阴津渡口。

洛阳,依然尚在秦军的手中。刘邦与秦军会战“不利”,一败,退至登封东南的阳城。在登封,他选定了惊人的新的战略。他留下步兵,集合本军的骑兵,不向西再攻洛阳,而向南直袭宛县。他在鲁山县东南的犍邑,与南阳郡守吕雉作遭遇战,大胜。

吕雉退守南阳郡郡治所在的宛。刘邦以为此人

的兵力已很单薄，顿想越塞而攻，再施一次突袭，直捣武关。是张良觉得必须采取较为稳当的办法。若是到了武关而一时不能攻下，吕雉出而截断后路，坚城在前，强敌在后，这是最危险的事。于是刘邦一夜之间再来到南阳城下，围城三匝，绝望的吕雉终于投降。

刘邦从南阳经过今日的镇平、内乡、淅川，到了丹水东岸。溯丹水而西北，可以直达商县之东的武关。刘邦在中途遇到了戚繆与老友王陵，请他们助攻西陵、胡阳；又有番君吴芮的别将梅锬，帮助取得了酈县（内乡东北）与析县（内乡西北）。

刘邦兵到武关，赵高便派了人来讲和。赵高已经杀了二世，欲与刘邦分王关中。刘邦依照张良的计策，不理赵高而直接对武关的守将交涉。这些守将都是屠户商人之子，“易动以利”，刘邦一一加以收买。同时，令先锋设五万人的炉灶，多张旗帜。在如此的威胁利诱之下，守将们果然允降，不作如何准备。突然，刘邦又向他们进攻。秦军大败，武关入于刘邦之手。

在蓝田，秦军再破，溃不成军。到咸阳，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降于轵道之旁（长安县东）。

刘邦达到了先入关的目的。按照所谓“先入关者王之”的约定，他应该被“楚怀王”封为秦王。他也认为，这是已经不成问题的事。因此，他便派兵守函谷关，守他自己的领域。又招募当地的壮丁，凑足十万以上的兵力。

他不曾料到，他虽派了人守住函谷关，项羽依然

要来。项羽以四十万的兵力,压迫他,威胁他,令他退出咸阳,由子午谷前赴汉中,就任什么“汉王”,以巴蜀汉中作为他的领域。

秦王,项羽不许他做;秦国的本部,被分封给三个用来监视他的人:章邯、董翳、司马欣。他的十万人的军队,项羽只许他选择二万人,其余的不许带去。

项羽不曾料到,这入关以后的刘邦,已经迥非昔日的刘邦可比。项羽只晓得刘邦是出身为区区亭长,潦倒了半生,倚仗项梁支援才有了今天割地封王的幸运的五十二岁的“老年人”。项羽自己是一个世世为楚国大将的贵族子弟,年纪才有二十七岁,力能拔山、气能盖世的少年英雄。在项羽的眼中,刘邦是很应当满足的了。这刘邦,即使不肯满足,还能有什么作为!

项羽不曾看见刘邦已经吸收了许多人才:例如酈食其、张良与尚未知名的韩信。刘邦已经建立了军事与政治的声望:在军事上,他能经由武关,袭取咸阳;在政治上,他能除秦苛法,约法三章。这些,都是令人佩服的事。不愿意佩服他的,只有项羽。刘邦自己,当然也不曾预料到能有如此的成功,然而这种成功正足以提高他的自信:当年只是奉命“西略地”或北援项羽:结果,居然能西灭强秦。在白马津,没有胆量渡河西进;在洛阳,又因战败而没有力量西进;后来,居然经由武关而终于达到目的。亭长,成了汉王——完全是因为有了肯干与彻底干的精神。这种精神,既然能够令他由泗上亭长而成为汉王,便能保证他由汉王而成为全国的领袖。

历史,已经用了刘邦的例子,向我们证明这个原则:只须主张正确而又肯干,就能成功;只要彻底干,就能有意外的成就。刘邦在过去,仅是肯“向西略地”,结果,居然灭秦;刘邦在未来,仅是肯“报复项羽,打倒项羽”,结果,却完成了中国的重新统一。

四、争 雄

让我们先来研究,他怎么“报复项羽”。

以力量论,他不及项羽。项羽有四十万人的兵力;他现在只剩两万。(原来的十万人,已经被项羽留下了八万。)在这二万人之中,又有一些已经被项羽吓得逃走。

韩信便是被吓走的一人,萧何也继续失踪。这对于极端失意的刘邦,真是严重的打击。因为萧何是他多年的朋友,共同起义于沛县的患难之交。萧何的才干,他素来承认是在他之上:萧何是县府的书吏,他只是乡下的亭长。萧何对于他的忠诚,也是他从来不曾怀疑的。然而萧何竟然也宣告失踪,也似乎对于刘邦丧失了信心,这使得刘邦立刻怀疑自己,刚刚增强的自信力于是完全消失,终日惶惶,“如失左右手”。

幸亏过了两天,萧何又走回来。萧何说:他并未逃亡,他是去追回那逃亡的韩信。有韩信便有报复项羽的可能。这对于刘邦又是一件意料不到的事。韩信是谁?

韩信,曾为项梁与项羽的部下,位置甚低,没有什

么表现；在刘邦被迫离开咸阳、南赴汉中的时候，韩信抱了相当的希望，自愿跟随汉王，依然位置很低，只是一名连敖（副官），依然没有什么表现。他只跟萧何谈过话，不曾与刘邦有接触的机会。

这一次萧何对于若干逃亡的军官，一概不追，而单去追回这位连敖。萧何说，这位连敖的确能够贡献别人所没有的计谋，以解决当前的问题。不过一个如此具有能力的人，应该占有相合于他的位置，他不应该再屈身为连敖，他也不肯再屈身为连敖，他必须为将军、为大将，列于所有的将军之上。然后，他才肯贡献他的方法。

萧何的保荐，刘邦绝对依从，立刻筑坛，拜韩信为大将。大将韩信，也立刻拿出消灭项羽的办法。

韩信的办法是战略。战略要建筑在政略上面，政略要建筑在政治现状的分析、各种力量的比较上。韩信说，刘邦应该承认，他个人的能力不如项羽。同时，刘邦应该乐观，因为环境不利于项羽。

项羽分封天下，有欠公平，铸成大错。在西方，令章邯、董翳、司马欣分王三秦；令刘邦僻处汉中，这种做法不仅为刘邦本人所恨，亦为三秦父老所恨。三秦的子弟，未死于讨平陈涉之时，亦死于项羽尽坑降卒于新安之时，这笔账，全算在章邯的身上。董翳、司马欣无名之辈，毫无声望，只是项羽的私人，自然也连同章邯为三秦父老所恨。三秦的父老，的确很思念那灭秦而不杀子婴，取咸阳而不烧宫屠城，除秦苛法而仅仅约法三章的刘邦。

在东方,项羽不该迁逐齐王、赵王、燕王。这三位崛起的诸侯,都不曾有罪,都曾经派兵遣将来助项羽入关。现在项羽却分封这些遣来的将官(田都、张耳、臧荼),各自回国为齐王、常山王、燕王,驱逐原有的国王,使之屈身为胶东王、代王、辽东王。这不仅令人不平,而且助长叛乱,提倡叛乱。项羽在山东、河北、辽东,都一一种下了乱苗。

在中部,魏王变成了西魏王。魏国的东部变成了西楚霸王的领域。对韩王,项羽不使之国,不令他回任,于是韩国的旧壤无形中也成了西楚霸王的采邑。义帝原都彭城,项羽要他将彭城让出,作为西楚霸王的都城。义帝被流放到郴县;走至中途,又遭项羽暗杀。

韩信继续向刘邦说:“项羽已经丧失了天下人的信仰,他只是名义上的霸王;虽则一时很强,我们很容易使得他变成很弱。”况且他对于部下不肯信任,只是匹夫之勇;他对于有功的,舍不得赏赐与封赠,只是妇人之仁。打倒他,不是难事。

办法呢,我们赶快准备,等待东方有事、项羽无暇西顾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第一步击破章邯、董翳、司马欣,第二步出函谷关,直捣彭城。

以上,便是韩信与刘邦所定下的计策。中国的舞台之上,刘、项二人的争雄开始了。

那忠义兼顾的、可敬可爱的张良,这时已不在刘邦的左右。他送了汉王就国,便辞别汉王,回去辅佐韩王韩成,企图恢复故国。无奈项羽始终不令韩成就

任,他于是只得以全部心力帮助刘邦。以前他对于刘邦只是义,今后他于义字之外,又加上昔日对于韩王的忠。在追随刘邦、由咸阳前往汉中的途上,他曾经劝告刘邦,烧绝子午谷的栈道,对项羽假意示弱,以汉中巴蜀为满足。这一个计策,收到预期的效果。项羽果然离开陕西,对刘邦不再顾虑。项羽一心讨伐逐走了田都、杀了田市、自立为齐王的田荣。不料田荣未平,刘邦已经另由故道出兵,吞并三秦。故道为今日宝鸡汉中间的公路线的所在。

赵王歇也同时对项羽造反。鼓动赵王歇的是陈馥。陈馥极力反对张耳以常山王的名义来享有赵国的地盘,把赵王歇挤到(河北的)代国去。陈馥与张耳本是极好的朋友,为什么又反对张耳呢?因为在章邯围赵的时候,两人之间发生了误会。陈馥在城外拥兵不救,困在巨鹿城内的张耳,在巨鹿解围之后,曾经责备陈馥,逼他辞去大将军之职。因此,两人才种下冤仇。项羽待陈馥并不太薄,封他为侯。给了他三县的采邑,但是,陈馥为了反对张耳,却不得不连同反对项羽所造成的局面。于是鼓动了赵王歇,叫他不要去代国,应该联络田荣,来共同违抗项羽的命令。

响应田荣的,陈馥之外,另有彭越。彭越本是梁山泊所在地巨野泽的水寇。刘邦攻打昌邑的时候,彭越曾经参加,刘邦未能将昌邑打下,而去打别的城池,彭越仍旧回到他的老巢。在项羽大封诸侯的时候,不曾轮得到他,但是他已经有了一万余人,毫无所属。陈馥造反以后,他就拥护陈馥,做了陈馥的将军,占据

了定陶一带的济阴郡。

英布，项羽所最亲信而又封为九江王的，也开始了消极的背叛行为。项羽令英布来帮忙讨伐田荣，他称病不去，命他出兵，他又只肯派出几千个人而已。

项羽不得不以自己一个人的全力来对付田荣,从楚汉元年的五月起,直至楚汉二年的正月,无暇西顾。刘邦便利用这个期间,围章邯于废丘,降董翳、司马欣于高奴及栎阳,分兵收取陇西、北地、上郡,统一了今日的陕西、甘肃两省;一面派薛欧、王吸出兵武关,与南阳的王陵部队会合,牵制楚的兵力,一面出兵函谷,受河南王申阳之降,击破项羽所新封的韩王郑昌,占领成皋、荥阳的险要地点,到达郑州附近。等到项羽在楚汉二年正月,灭了田荣,刘邦又由临晋渡河,受西魏王魏豹之降,攻下安阳,俘虏了殷王司马卬。于是刘邦聚集了五位诸侯的兵(塞王、翟王、河南王、西魏王、殷王),共有五十六万余人,曾师洛阳,为义帝发丧,申讨项羽。

项羽不该在楚汉二年十月，杀掉了义帝。给了刘邦以申讨他的口实。

项羽这时仍在齐国，因为田荣虽死，他的兄弟田横又拥立了田荣的儿子田广，继续反抗。因此刘邦更得长驱直入，由洛阳沿着今日的陇海路线，一举而占领彭城。

这对于项羽是极大的侮辱。在这个时候,胜利似乎已经属于刘邦。刘邦不仅成为诸侯的领袖,而且占

领了项羽的国都彭城。

在彭城一朝快意的刘邦，开始尽量的享受。当年在咸阳，他最先获得秦宫的美女与珍宝，但是樊哙与张良阻止了他，不让他享受，教他爱惜名誉，后来这些美女珍宝都被项羽掳去。现在，难得又属于他，那么，当然要天天宴会。他，已经胜利；他刘邦已经是天下第一名的英雄！

项羽在齐国，不能忍受彭城所传来的消息。

刘邦在彭城的兵力有五十六万。项羽为了攻打刘邦的五十六万，认为只需要三万。项羽带了三万名的骑兵，以绝对值得称赞的战略，南出胡陵、萧县，绕道彭城的西南二方，为迂回包围歼灭战。从早晨到中午，杀了汉兵十几万人，汉兵又有一些死于泗水，或被追击而死于灵璧之东的睢水之上。“睢水为之不流。”

刘邦本人，也陷在三重的包围之中。若不是侥幸遇着大风，飞起满天遍野的沙土，汉王也许不能走脱。他虽则是走脱了，却已经没有了往时袭取彭城的气概。刘邦逃到沛县，被追到沛县，丢了父亲，丢了妻子。他又逃向砀县的下邑，中途遇着自己的儿女，惟恐有了儿女便逃不快，屡次推他们下车，慌慌张张的惟恐被敌兵追及。他最后到了下邑，得到吕泽的接应；再向西逃，到了荥阳（今天的河南荥泽），集合了诸路的败军，又有萧何从关中送来的老弱，他这才稍得喘息，与楚军相持于索县（今天的河南荥阳）及索县西南的京县之间。

五、相 持

楚汉两军,前后相持三年,主要的阵地始终在京、索、荥阳、成皋之间。

拿近代的话来说,这差不多是阵地战。相当于今日壕沟的是城墙与壁,壁是土墙。在野外的阵地中,楚汉双方均筑有这样的壁,作为掩护。汉军的前锋在荥阳,后方输送全靠渭河、黄河,以敖仓为终点,在敖仓与荥阳之间,有类似交通壕的设置,叫做甬道,也就是狭长的双重的壁。今日突破阵地,是用坦克车来冲锋,在古代,非得敌人也出壁来应战,便没有交锋的可能。因此,需要挑战、骂阵等等。但到了交锋的时候,也有一种陷阵的利器,那便是用马拖的兵车。汉军之中最擅长使用兵车的是夏侯婴。他每次作战,均能“以兵车趣攻战疾”,所谓趣攻,所谓战疾,都含有“冲”的意思。两军相持都能维持甚久,原因是交锋的机会很少,平常都是用弓弩保持自己的阵脚,以补助土壁之不足。

在京县与索县之间的楚汉两军的阵地,很显明,汉军的一方占有地形上的优势。索县之正西有广武山,西北有虎牢关,西南有嵩山。在索县与虎牢之间,又有汜水。更西,是巩县,已经到了很高的黄土层。凡是走过陇海铁路的人,未有不惊奇于这汜水车站以西的一层比一层高的黄土层。在这里,楚军来攻汉军,便是仰攻。就交通的情形来说,汉军所占的地势,

也较为优良。从栎阳到敖仓有黄河接着渭河,两岸均为自己或友军的领域,不受任何威胁。并且以水道来运输粮食与补充兵员,顺流而下,也远胜当时陆地上的车运。因此,一败涂地的汉军,退到索县一带便能稳住,长胜的楚军竟然费了几年的力量,而不曾能越过巩县。

除了地理的因素之外,汉军之所以能够与楚军相持于此,还有政治上、战略上更重要的原因。当刘邦彭城突围,狼狈西奔的时候,荥阳(荥泽)的守军虽多,未必能抵抗得了项羽的主力。是倚靠辩士萧何疏通了九江王英布,突然在安徽西南,宣布背楚附汉,才牵制了大量的楚军。虽则英布终于为项羽所击破,丢掉了九江郡的地盘,但刘邦已能从从容容,布置妥当新的阵地。

在后方,他又除去了心腹之患,那死守废丘的章邯。废丘城,他引水来灌,城中的军民投降,章邯自杀。为了安定后方的人心,巩固后方的防务,于是立刘盈为太子(即后来的汉惠帝)。太子与萧何留守栎阳,令诸侯的世子,凡是在关中的都来栎阳,为太子的侍卫(实际上是藉以确保诸侯忠顺的人质)。一切的庶政与军国大事,均责成萧何:制法令,立宗庙,筑城邑,计户口,以及转粮给军,补充兵员。能于事先奏明刘邦的,先奏后行;时间上不允许先奏的,准许萧何先行后奏。因此,前方后方保有了密切的合作。后方组织的坚固,足以保证前方的胜利。在敌人的后方,刘邦又发展游击的工作。虽则英布已经失败,只身来到

汉王的军营,但是他仍有一部分的兵力留在九江郡的地域。刘邦帮助他派人去召集这些散兵,果然又集合了数千之众。刘邦同时分了一些汉兵,去增大九江兵的声势。

英布以外,奉刘邦之命担任游击的又有一个彭越。彭越,巨野泽的水寇,对于山东省西南部、河南省东北部与江苏省西北部的边区最为熟悉。在汉王东袭彭城的时候,他已经聚集了三万余人,占有了十余城邑,在外黄加入刘邦的大军。刘邦既败,他收兵退处于黄河北岸,滑县附近。此后他就以定陶、巨野一带为根据地,“往来为汉游兵,击楚,绝其后粮于梁地”,竭力破坏彭城与荥阳之间的交通与输运。

反之,在项羽的一方也未尝没有对付刘邦的对策。项羽在彭城之战的明日,就设法使得附和刘邦的诸侯,一一背汉归楚。塞王司马欣与翟王董翳逃到项羽的军中,帮助项羽来围攻荥阳。西魏王魏豹,则假托回国省亲,立刻断绝了黄河的渡口,与刘邦脱离关系。这对于全恃水道运输的刘邦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因为黄河的北岸有一段是在西魏国的境界;而且倘若西魏的兵,一旦由临晋津渡河西向,栢阳与全部的关中,便遭遇极大危险。

刘邦认为这西魏叛变必须迅速解决。他派遣辩士,辩士失败。他只得派遣军队,交由韩信率领。韩信设疑兵于临晋,突从夏阳渡河而一举占领安邑,俘虏魏豹。魏豹再度降汉,又成了汉军守荥阳的将领之一。但是西魏国的土地不能再交给于魏豹,刘邦也不

想另封其他的人。他设立河东、太原、上党三郡,把这三郡都一概划入自己的汉国。这是刘邦的一贯政策,他在甘肃与陕西,已经设置了陇西、北地、上郡、渭南、河内、中地诸郡。以郡县代替封建,是刘邦增厚实力的秘诀;因此,他能够脚踏实地,打下一处,便据有一处(其后灭了项羽,大封功臣同姓,也只是实行郡国制度,于郡县的基础之上,加一层封建而已,以十五个郡直属中央,余下的才分封各国。

韩信平了西魏之后,在上党郡的阨与(和顺县西北),遭遇了赵代二国的援军。代王陈馥,本是最先反楚的一人,他逐走项羽所封的常山王张耳,迎归赵王歇,而自封代王;他与刘邦理应站在同一的战线。无奈刘邦收容了张耳,因此陈馥又不得不与刘邦为敌。结果,在阨与,陈馥的大将夏说为韩信所斩杀。

韩信随即由娘子关东出井陉。陈馥自恃兵多,不肯听从李左车的计策,以奇兵截断韩信的粮道,以正兵堵住井陉的关口。他专要等待韩信的部队走出娘子关,正式交战,一决雌雄。到了正式交战的时候,韩信先是诈败,败退到预先布置于绵蔓水河边的一万人的营中,就突然作坚强的抵抗;韩信在当天的黎明之前,又已经派出两千埋伏于赵军营垒附近的山上,这两千人此时都走下山来,袭取赵军的空营,拔去陈馥的军旗,插上汉军的军旗。陈馥及其部下,向前不能击破韩信的水上军,退后又回不了自己的营垒,军心立刻动摇。陈馥被追斩于泚水之上,赵王歇成为俘虏。

汉军的声势,恢复了东袭彭城时的浩大。远在河北的燕王臧荼,也向汉军输诚。这是汉王三年十月至十二月的事(这时候仍用秦的历法,以十月为岁首,三年十月紧接二年的闰九月,东袭彭城是在二年四月,战败是在五月)。

但是项羽仍不为黄河北岸方面的局势所摇动,仍旧坚持着在荥阳城下的阵地战。他的战略,是断绝汉军与敖仓之间的甬道,使得汉军因乏食而屈服。这战略相当收效。刘邦数次请和,愿意割荥阳以西为汉,荥阳以东为楚,项羽不许。刘邦又改用陈平的计策,以金钱收买项羽的左右,离间他的君臣。范增因见疑而辞职,死在回居巢县家乡的中途彭城附近。项羽继续围攻荥阳,刘邦继续死守。

这时候敖仓刘邦的甬道常遭断绝,荥阳是否尚有死守的价值,或有无守的可能,开始值得考虑。刘邦决定,他自己先离开荥阳。在某一天的夜里,他命令纪信伪装自己,夹在二千名女子之中,出东门诈降,引起了楚军大众,一齐聚集东门来观看女子,他就带了几十个骑兵,由西门遁出,回到函谷关内,征调新兵。

新兵征调齐集,他不出函谷,而忽然改出武关。项羽只得引兵南向,他却坚守宛县,不肯交战,暗中命令彭越,利用这个时期,在北方骚扰徐州附近的下邳,大破楚军。项羽回师去击彭越,刘邦就跟踪追击,驻军成皋。项羽只得又丢开彭越,赶来对付刘邦,第一步以全力攻下荥阳,第二步进围成皋。刘邦自知不敌,逃出成皋,北渡黄河,到了修武。

在修武,他诈称汉王的使者,在夜里骑马走进韩信与张耳的军中,趁着韩张二人尚在酣睡,夺去他们的兵符,更换各单位的军官。他于是又直接掌握了若干军队,声势复振,布置兵力在黄河北岸,为南岸的声援。同时命令张耳回国,多调赵兵助战;又命令韩信袭齐,攻取山东。此外,派了刘贾以两万人渡白马津,到定陶帮助彭越。彭越随即攻占陈留、外黄、睢阳等十余县城。

在汉王四年的开始,项羽觉得阵地战不妨拖延,而敌人的游击队伍,不可不早日肃清。他决定以十五日的光阴,彻底解决彭越,令大司马曹咎谨守成皋,勿与汉军交锋。无奈曹咎忍受不了汉军的辱骂,终于在五六日后出城应战,渡兵汜水。楚军半渡,汉军反攻,楚军大败,曹咎自杀。汉军收复了成皋与荥阳,在荥阳的东边围住楚军的大将钟离昧。这消息传到了项羽那里,项羽刚刚击败彭越,取回陈留、睢阳等城,不得不中途放弃那消灭彭越的计划,回到荥阳的阵地来。

齐国的情形也发生变化。齐国的田氏,诚然是项羽的敌人,但已经入于休战的状态之下。刘邦一面派了韩信,去图谋齐国的土地,一面又派了辩士酈食其游说齐王田广,令他附汉反楚。田广听从了酈食其的游说,不料韩信又突然攻破齐国驻扎在济南(历下)的军队。田广仓皇东奔,放弃临淄,在高密遇到项羽所派来的由大将龙且所率领的援军。

龙且与韩信夹潍水而阵,龙且在水东,韩信在水

西。交战的前夜,韩信叫兵士用一万包的沙袋,塞住潍水的上游。交战开始,韩信引兵渡河,佯作不胜,退至水西,龙且引兵追击,半渡,韩信叫兵士提去上游的沙袋,于是楚军的大部分不能渡河。结果是:楚齐联军全军覆没,龙且被杀,田广被俘。韩信被刘邦封为齐王,齐国与彭越的游击区连成一片,从临沂与定陶两路威胁彭城。

项羽这才开始感觉恐慌。他派人去游说韩信,劝韩信中立于刘、项二人之间,三分天下;韩信不听。他又派人去疏通刘邦,说与其这样相持下去,徒苦百姓,何妨你我二人单枪独马,一决雌雄。在项羽的本意,无非表示厌倦战争,希望和解。因此,二人相与临广武之间而语,这誓不并立的相持数年的两位英雄,又有了一次直接谈和机会。不料刘邦十分骄傲,根本拒绝了项羽的要求,利用谈和的机会,当面宣布项羽的十大罪状。项羽大怒,立刻以伏弩惩戒刘邦,刘邦胸上带箭,退入成皋。

不久,和约依然成立。楚汉两军,划定鸿沟为界,鸿沟所占的土地,在大体上是今日的贾鲁河。项羽也许认为双方已经可以暂时和平相处。张良认为这正是最后大决战的开始。

六、决 战

两军所争的只是气的盛衰,而现今正是项羽气衰的一刹那。他竟然满意于鸿沟协定,立刻引兵东归,

似乎抛弃了消灭刘邦的思想,希望回彭城享受他的仅余半个的天下。

不,项羽诚然气衰,他也决不是一个如此无志气的人物。他是困于环境,困于兵疲粮尽,前方没有进展,后方遭受威胁,而不得不暂时如此。他若是回到彭城,获得相当时期的喘息,谁能料定他不重整旗鼓,再来一决雌雄?到了那个时候,未必汉军仍能占有如今日的优势:兵多,粮足,稳固的荥阳成皋间的阵地;彭越与英布所统率的大量的游击队伍;还有韩信的拥护。韩信智勇兼备,一举而下魏赵燕齐,战无不胜,威震山西、河北、山东,据有齐国,实为整个北方的局部霸王。——韩信未必能够永久不听从那些辩士如武涉、蒯通等人,永久不愿意与楚汉鼎足而三,三分天下。——等到那个时候,韩信若是突然肯鼎足而三,肯中立于刘项之间,谁能料定项羽那时候不能吞灭孤立的汉?谁能料定项羽不联韩灭刘?

张良很冷静地看到了这一步。他认为楚汉若是迟早必须一决雌雄,那末,不如现在就决。

因此,在鸿沟协定的次日,他就建议刘邦决战,不顾条约的约束,而追击项羽的东归大军。同时,通知韩信,通知彭越与英布,一齐会师固陵(淮阳县西北),夹击项羽,消灭项羽。刘邦完全接受张良的这一个建议。

项羽统率他的军队,一步一步地向东移动,不曾梦想到刘邦竟然越过鸿沟的界限,扯毁鸿沟协定,一步一步地跟踪而来,追逼不已,一直追到今日淮阳县

西北的固陵。愤怒燃烧了项羽的心。他立刻传令全军,停止撤退,回转头来,打击刘邦。这时候,韩信、彭越、英布,都不曾到达固陵,而且根本就不曾有出兵的消息。乘人之危的刘邦,于是反为项羽所乘,大败。刘邦于是又只得深沟高垒,在固陵筑壁自守。

若是没有张良,刘邦的前途真是黯淡得很。刘邦已经离开了优良的阵地,竟与项羽作遭遇战。当年不离开成皋的阵地,又加上彭越的游击力量,也仅能与项羽相持不下。刘邦从来不曾有资格与项羽作遭遇战。刘邦自己没有精兵,自己不知兵法,实实在在远不是项羽的敌手。他若是想成功,惟有借重于彭越、英布、韩信。有什么方法,能使他们遵守会师固陵的命令?他们究竟为了什么,不肯会师固陵,而采取观望,一变从来助汉击楚的态度?

只有张良能够看透他们。他们之所以助汉,不是为了什么理想,更不是为了刘邦能够礼贤下士。刘邦对人是一点礼貌也没有。他们帮助刘邦,是因为刘邦不爱金钱,不爱爵赏,不像项羽那般吝啬。现在他们为什么观望?是恐怕刘邦灭了项羽以后,不再需要他们,不再对他们宽厚,不再有什么封赏。

张良说:赶快通知韩信,告诉他不仅将永为齐王,而且可以扩充地盘,从淮阳以东,直到海边,包括他的故乡。也要告诉彭越,必定封他为王,从商邱北至谷城,都作为他的领域。剩下英布,本已封他为淮南王,现今允许给他全部的淮河以南,再派刘贾领兵增厚他的实力,促进他的行动。

张良的计策，刘邦立刻施行，施行以后，果然见效。韩信、彭越、英布都动员了。战胜于固陵的项羽，再度感到恐慌，商邱被彭越占去，徐州的归路已经截断。英布与刘贾占领了寿县，从寿县进抵亳州，屠城。自己的将领之一周殷为汉方所收买，在舒城叛变，占领六安，屠城。韩信也率领了几十万大军，来与刘邦会合。

商邱与亳州之间，已经不允许项羽通过。在寿县与亳州之间，比较有突破可能。项羽就选择了十万人，由淮阳冲向正东，来到灵璧县东南的垓下。

呵！垓下！这是何等悲壮的千古不朽的地名，所谓十面埋伏，所谓霸王卸甲，所谓四面楚歌，许多优美而丰富的文艺题材，将永久以垓下为背景。霸王在此地卸甲，在此地遇到最后的失败，辞别了他一生所最爱的虞美人！

他怎样卸甲？凡是写历史的人，写到这里，都要感到无限的凄怆，几乎不再愿意，不忍心，加以详细描写，——是韩信以相同于希腊人在马拉松的两翼包抄的战术战胜了他。韩信以三十万人居中，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刘邦居后。韩信诈败，楚军深入，孔将军与费将军同时两翼展开。楚军陷入重围，全部覆没。

项羽只剩下八百余人，连夜溃围，“南出驰走”。到了天明，汉军才知道消息，派了五千骑兵去追。项羽走到淮河，只剩下一百余人。渡淮以后，问路于农夫，为农夫所欺骗，陷入一大片沼泽之中，被汉兵追

及；又突围向东，到了东城（定远县东南），所余的仅有二十八骑。这二十八名骑兵到了最后，他仍能分为四队，施演惊人的战术，四队同时突围，指定对面三个山坡，为集合地点。于是一声令下，分向四面驰出，便有汉将一名为项羽所斩杀，片刻之间，项羽的骑兵又集合于三个山坡之上，汉军不能确知项羽的所在。等到汉军分而有三，把三处的楚骑分别围困，项羽又再度冲出，斩汉一都尉，杀了几百汉兵。二十八骑之中，只损失两骑。

项羽带了这二十六骑，又继续向东南奔逃，来到长江的江岸，和县东北的乌江镇渡口。他不幸又为乌江亭长所耽搁，所戏弄。他十分伤怀，为什么像他这样曾经支配天下，分封诸侯的霸王，要受区区一个亭长的侮辱？他感伤，感伤转成惭愧，惭愧转成了恐惧，由恐惧而灰心，由灰心而自杀。

亭长拿“江东千里，亦可以王”八个字来嘲笑项羽的渺小，项羽拿舍得自杀来答复亭长的嘲笑。其结果，渺小的依然是亭长，而项羽仍不失其为伟大！

伟大的是项羽的人格，是项羽的个性，而不是他的做法，与他的思想。他之所以失败，并非由于命定。他的错误，除了只知用自己一个人的智与力，而不能用别人的智与力以外，是在军事方面，忽略了关中地形的优越；在政治方面树敌太多。

他以为秦朝之所以失败，由于消除封建；豪杰之所以反秦，是想恢复封建。他又认为惟有大行封建，才能确立他自己的霸权，贯彻他的号令于全部中国。

结果,被封的对并不忠实,例如殷王司马卬与河南王申阳;或忠实而不肯对他的敌人作坚强的抵抗,如塞王司马欣与翟王董翳;甚至于尾大不掉,向他倒戈,例如英布。至于不曾轮到封赏,封赏而不能满足的人,如田荣、彭越、陈馥、赵歇以及刘邦,一齐成为他的死敌。

人民若是喜欢封建的恢复,应该拥护他打倒刘邦,但是人民所要求的,却是除秦苛法,约法三章,司法与行政的简单化,最短期内的和平与保证和平的反封建的统一政府。刘邦在陕西、甘肃、山西,恢复了郡县的制度,丝毫未曾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感,而且由于萧何的善于为中央集权的治理,反而增加了刘邦的作战能力。郡县制度下的刘邦后方,结成一个巩固的整体,远非项羽所能想像。反之,项羽在后方除了用霸王的名义作封建的号召外,不曾有什么优良的新型的行政机构。

因此,刘邦屡次战败,屡次均能回到自己的关中,项羽垓下一败,竟然徘徊乌江,有江东而不能回。

(1939年)

三国战史

在国三的历史之中^①，最著名的一次战争是赤壁之役，不仅很精彩，而且也最为重要。三国鼎立的局面之所以能够产生，赤壁是一大关键。

在赤壁以前，当群雄纷扰的时候，还有一次比较重要的战役：曹操与袁绍之间的官渡之战。曹操本没有多少军队，更缺乏优良的地盘，他以天下之至弱，当天下之至强，居然战胜了这四世三公，拥有冀、并、青、幽四州之地的袁绍，一跃而成为中原的支配者。

在赤壁以后比较重要的事，是刘备的据蜀，荆州的争夺战，与刘备陆逊之间的猇亭之役。

再其后，刘备既死，诸葛亮东联孙吴，北伐曹魏，尽毕生之力，未能取得长安。然而西蜀总算是保全了。也许这就是现代军事家所谓“攻势的防御”吧？继承他的费祎，不明了“要进攻才能防守”的原理，以

为“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于是屡次限制姜维的企图，使得姜维只能活动于洮水之西（甘肃省西南部）；魏国因休养生息而愈强，终于灭掉了蜀。

邓艾与钟会的两路灭蜀，在战史上很有地位，正如赤壁之战，很值得我们研究。西蜀既亡，东吴势孤，于十七年以后，被晋并吞。

序 幕

东汉，早就该亡。亡东汉的，并非曹操，也不是董卓，更不是黄巾。黄巾之乱，是造成于外戚宦官的轮流把持政权，轮流对于人民为极度的剥削。大将军梁冀一家，前后产生三个皇后，六个贵妃，三个驸马，两位掌握全国政权的大将军，梁商、梁冀，五十七位卿，将，尹，校。在梁冀被迫自杀的时候，他的家产由政府拍卖，卖得三十万万以上汉朝的“钱”，相当于全国租税的一半。梁冀死后，继承他的大宦官是单超、徐璜等五人，他们都是侯爵，号称五侯。五侯以外，还有八位乡侯，七位亭侯，也统统是宦官。外省的封疆大吏，由这些宦官的亲戚故旧充任。“兄弟姻戚，宰州临郡，率较百姓，与盗无异”。这是桓帝一朝的事。到了灵帝之时，宦官们就索性以诏令的形式，公然卖官鬻爵，把卖官鬻爵定为皇家的一种典制。公的位置，卖钱一千万，卿的位置，卖五百万。在贪污的政府之下，“水利”的工作，是没有人照管的，于是水灾、旱灾、蝗灾，都接踵而来：先是一县、两县，其后是一州，两州，终于

“郡国七，大水”；“七州蝗”。先是“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若干偶然的怪事，终于全国各地都有了“人相食啖，白骨委积”普遍的惨象。

先知先觉的智识分子，最先反抗；他们用言论来批评朝政，用文章来弹劾宦官；结果，他们都遭了宦官的毒手，形成历史上著名的党锢之祸。下层知识的农民，没有分析的头脑，只有模糊的直觉，以为汉朝如此，远不及以前，大概是气数已尽，该换朝代；于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等等口号，便风行一时。灵帝中平元年，恰好是甲子年，竟然有三十六万的武装农民，一时俱反。

这三十六万黄巾，毕竟是乌合之众，不仅对于战略茫然无知，连初步的战术也是完全不懂。皇甫嵩略为运用了火攻、夜袭等等方法，就在一年之内，把禹县、汝南、淮阳、太康、西华，以及老巢所在的河北省南部，完全荡平。

但是皇甫嵩所能荡平的，只是一时蜂起的农民暴动；他没有能够根本消灭农民暴动的原因——贪污的宦官统治。因此，虽则张角兄弟所领导的第一批黄巾是失败了，所谓黄巾余党却依然遍布于天下，待时而动，一等到中央机构暴露矛盾，便要再演“燔烧官府，劫略聚邑”的行为。

在中央机构的内部，有宦官与外戚的对立。灵帝何皇后的从兄何进，因黄巾之乱而受拜为大将军，坐镇京师。何进为了充实自己的力量，创设西园八校尉^②，其中担任中军校尉的是袁绍，担任典军校尉的是

曹操，而名义上的领袖是宦官蹇硕，以上军校尉的资格称为元帅。蹇硕不甘于徒居名义，他与何进之争，宦官与外戚之争，日益尖锐。

斗争的焦点，是皇位继承问题。何进属意于他的妹妹何皇后的儿子，皇子辩，即后来的少帝；蹇硕与宦官们属意于王贵人的儿子，皇子协，即后来的献帝。灵帝既死，少帝继立，何进暂时获胜，但不久本人却为宦官所害。袁绍等人为何进复仇，举兵逼宫，大诛宦官。

这时候，在洛阳拥有最大的兵力的，不是袁绍，而是董卓。董卓奉召入都，只有三千名兵士，其后并合了何进所遗留的部队，才成为洛阳政治的主持者。他主张废少帝而立献帝，与袁绍的主张相反；结果，袁绍不得不离开洛阳。袁绍离开洛阳之后，董卓意图笼络，仍命他为渤海太守；他就以渤海太守的名义号召天下的英雄，共同讨伐董卓。应召的，有一位将军，一位州牧，两位刺史，四位太守，一位国相，连他自己，共总是十路兵马^③。

这十路兵马集合于南阳、禹县、延津、临漳、武陟，对于洛阳的董卓取威胁的形势。他们的兵力，据袁绍其后自称，有一百万之众^④。袁绍无勇无谋，徒然浪费了时间。除了曹操个人，以卑微的地位（署任奋武将军），些少的兵力与董卓的部将徐荣略有接触以外，其他都是按兵不动。曹操的小部队完全失利，本人中了流矢。他回到盟主袁绍的大本营，贡献一个新的作战计划。他说：“洛阳周围的险要，我们必须一一占领，

例如虎牢、轘辕、太谷；再派驻扎南阳的袁术，引兵西入武关，袭取长安，割断董卓与西凉老巢的交通，这才能够达到包围董卓、以顺诛逆的目的。”

曹操的计划，非袁绍所能了解；即使了解，也非袁绍的力量所能实现。袁绍，仅是名义上的盟主而已。结果，驻扎各处的十路兵马，一概按兵不动。董卓之被打倒，还要等待那异军突起的孙坚。是孙坚以长沙太守的资格，从长沙冲到南阳，从南阳冲到洛阳，董卓才不得不望风而逃，西迁长安。

董卓既走，十路兵马似乎都认为讨伐的目的已达，各自为割据或兼并的打算，被挟入关的汉献帝，竟然无人过问。这以后的中国局面，较之董卓留在洛阳的时候更糟，以前，无论如何，尚有一个中央政府；现今，潼关以东，只剩下若干互不相下的军阀。

最应该负责的，当然是袁绍，一半由于对献帝的私嫌^⑤，一半由于自身的缺少魄力，甘心让献帝被董卓挟持入关，不加追夺，使得讨伐董卓的义举，成为割据分赃的前奏。

其后，袁绍所做的是勾引幽州的公孙瓒，逼迫冀州牧韩馥下野，自己由渤海太守一跃而领有冀州；又击破公孙瓒与青州的田楷及并州的散寇，把自己的地盘由一州而扩充为冀、青、幽、并四州，相当于今日的河北全省，山东与河南的北部及山西的一大部分。

曹操在这期间（从汉献帝初平元年到兴平二年），靠了朋友的帮助，募得若干的兵士^⑥。他率领了这些兵士，到处肃清土匪，获得袁绍的注意，保举他担任东

郡太守(首县是河北濮阳)。这时候到处都是土匪,有所谓黑山贼及黄巾余党,而黄巾余党的数量尤多。在兖州,即山东的东南部与河南的东部,黄巾尤其猖獗,人数有一百多万。兖州刺史,那曾经参加过讨伐董卓的刘岱,死在他们的手中。兖州的大小官吏,认为只有请曹操来坐镇,才能够替刘岱复仇;于是派代表到濮阳,迎曹操来鄆城,“领兖州牧”。

曹操是一个熟悉兵法的人,来到兖州以后,一举就击破黄巾于寿张之东(山东东平县西南),乘胜追至济河(今日的黄河)以北,进入青州的地界,俘虏了三十几万兵士及一百余万的男女难民。曹操收编了这些黄巾之中的精锐;因为是在青州收编的,便称他们为青州兵。有了若干万的这些青州兵作为基本武力,从此曹操就成为中国军事舞台上的重要分子,足以与袁绍、袁术、陶谦、吕布、刘表等人相颉颃。

不仅颉颃,曹操而且逐渐地消灭他们,从最弱的一个开始。

这最弱的一个对象,是袁术。袁术于离开长安以后,驻在鲁阳县(河南鲁山),其后孙权杀了南阳太守张咨,把整个南阳郡的地盘送给了他。董卓派刘表来当荆州刺史,以襄阳县为根据地,对袁术进逼,把袁术从南阳郡逐走到陈留郡,陈留郡属于兖州。

曹操容不了袁术来侵占这兖州的一部分,就略施小计,先打袁术的部下刘祥所驻扎的匡亭(河南长垣县西南),引诱袁术从封丘县来援救,却事先埋伏了重兵在封丘与匡亭之间,叫袁术吃了一个大亏。然后,

追击袁术的败兵,直至袁术一逃再逃,逃去了扬州九江郡的寿春(安徽寿县)为止。

第二个对象,是陶谦。他据有徐州,与曹操的兖州相邻接。曹操之讨伐陶谦,不仅为了地盘,尤其是为了报仇;因为父亲曹嵩,曾在走向琅邪的中途为陶谦的将士所杀。曹操在逐走袁术以后,兴兵来与陶谦交战(汉献帝初平四年,公元一九三年)。陶谦一战而败,由彭城退守郯城,这时候公孙瓒还未为袁绍所消灭^①,派了刘备来助守郯城。曹操久攻不下,只得暂回兖州,沿途屠杀了“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明年,兴平元年,曹操再征陶谦,陶谦躲在彭城,避免交锋,吕布乘虚夺取曹操的兖州。曹操又只得再度班师。(不久,陶谦病死,徐州的官吏拥立刘备代领州牧。)

第三个对象,便是吕布。吕布在王允失败以后,一依南阳袁术,再依河内张杨,三依冀州袁绍,从袁绍那里又回到张杨的河内。这时候,陈宫与张邈二人,看见曹操两征陶谦无功,又表露了过分的残暴,于是约集了兖州的若干官吏,一齐向曹操倒戈^②,欢迎吕布来代领兖州牧。吕布率兵占领了濮阳,兖州的大多数郡县都表示响应。若非荀彧、程昱二人,替曹操死守了济河北岸的鄄、范、东阿三城,那身在徐州前方的曹操,几乎无家可归。在濮阳,曹操与吕布相持了一百余日。其后,吕布进驻山阳^③,曹操改变战略,不攻山阳,而从收复其他较小的城市着手。果然,他的军事力量与政治力量一天一天地恢复。吕布终于一败在巨野,再败在定陶,终于南奔徐州,依附刘备。

兖州,这才重新入于曹操之手。这一次吕布之袭取兖州未成,给予曹操以不少的启示。这件事告诉了他:若是单靠自己的军队,没有政治的做法,那不仅吞并徐州永难办到,连自己的兖州地盘,与自己的兖州官吏,都掌握不住。什么才是政治的做法呢?荀彧向他献计,最好迎汉献帝东还,置于自己的兵力保护之下。

汉献帝自从为董卓挟持入关,受尽了董卓及其部将的磨折。董卓的部将们,不仅把持政权,而且互相劫夺汉献帝的身体。所谓白波贼的首领韩暹、杨奉,也参加了劫夺圣驾比赛,获胜。他们从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的手中,夺得献帝,把献帝迁到洛阳。韩暹任命自己为中央政府的大将军,驻军京师;杨奉作了车骑将军,驻军临汝。

这两人不是曹操的敌手。曹操进兵洛阳,韩暹闻风先逃;曹操把献帝从洛阳带走,杨奉意图拦截,在阳城的一个山峡之中,为曹操的埋伏所击破。献帝被曹操迁到许昌。许昌成为汉朝的新的都城。骚扰于许昌附近的“汝南黄巾”,亦已于事先为曹操所荡平。靠了若干政治人才的策划,中央政府又重新粗具规模。曹操,不再是一个平常的兖州牧,他任命了自己为“大将军”^⑩。

最不佩服这位新任的大将军的,是袁绍。曹操已经以献帝的命令,发表袁绍为太尉,但是袁绍不能满意。袁绍说,当初曹操“彷徨东裔,蹈据无所”,东郡太守的位置是我保荐的,兖州刺史的位置也是我保荐

的^①。后来他“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也是我救了他^②。我如何能居他之下？袁绍向献帝上表，不接受太尉的名义。

在曹操的统一计划之中，袁绍本是第四个对象。现今袁绍又如此地倨傲，更该立刻讨伐。然而就实际力量来说，曹操还够不上真正称为袁绍的对手。就地理形势来说，徐州未平，出兵冀州，也未免有后顾之忧。那末，只有继续敷衍，把大将军的位置让给袁绍，自己退居于司空，署任车骑将军。

短视的袁绍果然不再争执。曹操藉此专心图谋徐州。徐州自从刘备继承了陶谦而占有以后，此时已不幸为吕布所袭取。吕布这个人不曾偷到兖州，却偷到了徐州。建安三年，曹操进军下邳，联合刘备，共围吕布。沿下邳掘一长堑，决了沂河之水灌城，吕布与他的若干部将，一齐投降，吕布被斩。

曹操叫车胄作徐州刺史。刘备跟随曹操，来到许昌，被发表为左将军^③。

这位左将军，无论曹操对他怎样笼络，称他为天下英雄，与他攀交，他始终是郁郁不乐。他而且与董承等“谋反”，受献帝的密诏，准备实行政变。建安四年，袁术抛弃扬州，要经过下邳，到青州袁谭那里去，把所僭的帝号，连同夺自孙坚之妻的汉家传国玺，亲自托交那一度曾为仇人、本是同祖兄弟的袁绍。刘备请曹操准他带兵，到下邳去邀击袁术；因此在倒曹密谋即将暴露以前，就离开了许昌。一到徐州，他就杀了徐州刺史车胄，宣布独立。这真是放虎归山，曹操

的一大失策。

于是在吕布之后,曹操的第四个对象便暂时不是袁绍,而是刘备。从表面上看来,刘备的战斗力很是有限,一击即溃,不够称为对象,然而刘备的毅力是可怕的。他颇有远祖刘邦之风,他从不灰心。这一次在徐州,很迅速的为曹操所战败,太太廖氏与大将关羽成为俘虏,自己单身脱逃,走奔袁绍。袁绍听到他来,郊迎二百里外。

官渡之战

曹操不曾料到,讨平刘备,反而替袁绍添了一位助手,增加了一份力量。袁绍,正是曹操心目中最大的一个对象。这时候,袁术已死,军政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只有曹操、袁绍、刘表、孙策。曹操据有河南大半部及山东南部,可谓中原;刘表在南,孙策在东,袁绍在北。袁绍拥有冀、青、幽、并四州;河北全省,辽宁热河各一部分,山东北部,河南北部,及山西的一大部分,在实力上可谓最强。曹操似乎绝对不是袁绍的敌手。况且,袁绍与孙策、刘表均有联络。

曹操在政治形势上只有一个优点:他拥有汉献帝。曹操在军事的方略上,只能有一个做法:对于袁绍、刘表、孙策,要分别击破,依次击破。反之,在袁绍的一方面,就应该采取针对的策略,在政治上抢他的汉献帝,夺取发号施令的中央政权;在军事上,不等待他灭了刘表、孙策,要在他尚未来准备与自己决战的

时候,先找他决战,并且约齐刘表、孙策,同时向他进攻。

袁绍及其谋臣,果然看透了这点,立刻就如此做。于是一方面派人游说孙策,请他出兵合肥;派人游说刘表,请他出兵南阳;一方面自己点集了步骑十万,从临漳县的邺县出发,直指许昌,准备在滑县的白马津渡河。先锋是大将颜良。

曹操听到消息,仓卒之间,虽然准备未充,也只得先率领两万人,赶到白马津来应战。那时候,黄河南岸,驻守白马津的刘延,已为颜良所围。曹军一到,立斩颜良^④,解去白马之围。袁绍于是亲统大兵,改由白马津之北的一个渡口黎阳来渡河,进驻于延津之南,差不多绕至曹操之后。曹军抵挡了一阵,斩杀袁绍的另一大将文丑,然而毕竟众寡悬殊,只得一退再退,退到了中牟县的官渡。

在官渡,曹操靠了一些新发明的战术,局面居然稳住。曹操用若干土堆造成一条防御线。愚笨的袁绍,也照样造成一排土堆,表示对垒。他不曾知道,如此就变成了一个阵地战,使得势穷力竭的曹操得有喘息的余地,从容以许昌所屯积的兵力与财力来补充^⑤。在官渡的阵地战上,袁绍也曾试用了若干战术,均为曹操的发明所克服:袁绍用楼车来进攻,曹操用“霹雳车”来抵御。袁绍掘地道,曹操也在自己的阵地掘一条很深的横行壕沟,静待袁军掘地道的人,来到自己的壕沟里送死。这壕沟称为长堑。

袁绍与曹操相持了甚久,不曾听到刘表与孙策

的出兵消息。刘表呢，坐观成败。孙策呢，已经在似乎即将出兵之时，遭了刺客的暗杀。剩下来，可以作为呼应的，大概只有汝南的黄巾余党。于是刘备自告奋勇，愿意担负这个纠合黄巾、骚扰许昌的使命。事实是，这个游击战略又告失败。刘备的游击队伍刚到许昌的城郊，便被留守许昌的荀彧，派兵抵挡回去。

官渡之战，从建安五年的春天开始，相持到冬天十月，才有决战。形势很特殊，不是主力相拼，而是互相夜袭。曹操知道了袁绍有很多粮食，刚刚运到，屯积在袁绍阵地之后四十里的附近。押运员是淳于琼，有兵万余人。曹操就选定了一夜，带领五千人去劫粮。袁绍听到说他要劫粮，也将计就计，派了张郃、高览来偷袭曹操的阵地。谁知道，张郃高览走到半途，看见自己的后方起火，反而佩服了曹操，把劫粮的命令丢在脑后，就此向曹操投降。袁绍的大军，经不起这个打击，立刻崩溃。袁绍下令退却，叫士卒渡河，扼守黎阳的渡口。

其后不到两年，在建安七年的夏天，袁绍呕血而死。再过五年，袁绍的三个儿子：青州刺史袁谭，幽州刺史袁熙，冀州刺史袁尚，及一个外甥并州刺史高干，都依次为曹操所消灭。曹操于是拥有了兖、豫、徐、幽、冀、青、并七州，及司隶校尉部，与扬州、荆州的一部分，超过了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前例^⑤。

赤壁之战

曹操的统一工作，在灭了袁氏父子以后，可算是完成了一大半。剩下的，只是荆州的刘表与江南的孙策之弟，孙权。

刘表拥有今日的湖北、湖南，招揽贤士，深得民心；对于曹操，未尝没有抵抗的能力。可惜，在袁绍与曹操对垒的时候，他不听刘备的劝告^⑦，未曾有所动作，失了千载一时之机。到了建安十二年，袁绍三子都已经死在曹操及其拥护者之手；次年，建安十三年，便轮到了刘表；刘表在大军压境之下，“疽发背，卒”。他的长子刘琦，驻守武汉在外（名义是江夏太守）；他的次子琮，继承了荆州刺史的位置，驻守襄阳。他的朋友刘备，原驻新野，退守樊城。

刘琮十分不肖，瞒着刘备与乃兄刘琦，暗地里降了曹操。刘备处于两面受敌的情势，于是急速退兵，先奔江陵，中途在当阳的长坂坡吃了一个大败仗，抛弃了自己的部队与妻子，偕同诸葛亮来到夏口，与刘琦共商应付之策。

刘备、诸葛亮、刘琦，共同认定了，要抵抗曹操，必须向孙权借兵。孙权这时候驻军柴桑（九江西南二十里）。诸葛亮奉命前往，先劝孙权投降，向孙权说，曹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刘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为之，……若不能当，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孙权说：“你

劝我投降,为什么不先劝刘豫州投降?”诸葛亮回答:“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孙权勃然大怒,说:“我那里能够以整个江南的地盘,十万人的武力,受制于人!我的计划已经决定,只有刘豫州可以共同抵挡曹操”。

孙权,虽则说是决心作战,其实还是没有决心。他问诸葛亮:“你们还有若干兵力?”诸葛亮说:“足有两万:刘豫州一万,刘琦一万。”他又问周瑜:“曹操的力量究竟怎样?”周瑜说:“曹操有四个弱点:第一,陕西有马超、韩遂,足为后顾之忧;第二,北方人不惯行船,他在江陵收用了刘琮的兵船顺流而下。是舍己之长,用己之短;第三,天气已经寒冷,觅草不易,曹操的骑兵陷于窘境;第四,北方人不惯于南方的饮食,不服水土,疾病必多。况且他,号称有八十万人,其实只有十五六万,加上刘琮的兵,也不过添了七八万人。我能有五万兵,保能破他。”孙权说:“五万人一时不易召集,我给你三万。”

周瑜统率了这三万人,在武昌会合了刘备与刘琦的所谓二万,也凑成了五万,沿着长江南岸溯江而上,与曹操的大军遭遇于嘉鱼县东北的赤壁。有名的赤壁之战,于是开始。赤壁之战的重要性,第一,在于粉碎了曹操的统一企图,造成三国鼎立的局面。第二,在于周瑜、黄盖等懂得以少胜多,用了奇妙的火攻战术,以五万人抵抗所谓八十万人。第三,在于刘备和

孙权能有勇气，以极脆弱的力量，抵抗极强大的力量。

曹操在江陵把大部分的兵力(大概是步兵罢)，装在船上，顺流而下；其余的(也许是骑兵吧)沿着长江南岸与“水军”并进。果然，他的北方士兵，得病的很多，在嘉鱼附近初次交锋，便不顺利。曹操将所有的岸上军士，都命令上船，把所有的船都开到了长江的北岸。这是个错误，北军利在速战，不该把船靠在北岸，作持久的打算。他之所以如此，也许是由于北人不习南方地理，惟恐过于深入，一旦受有挫折，急切之间，难以渡江北返。

其后，他为了减轻北人的晕船，把所有的船，都互相锁紧。这也是一个错误。周瑜与黄盖的长处，在于认得清敌人的错误，而加以利用。他们预备了几十集小船，满装干草，草上浇油，油上覆布，上插牙旗——这些小船都扣在若干大船的后面，由黄盖乘在大船之上，出面诈降。诈降的船走至江心，利用江心的急流，把小船一齐点了火解开，冲到曹操的互相锁紧的千余大船之上。结果，曹军全部崩溃，曹操率领残余，狼狈而逃。

众人都以为曹操北走，必是一直回奔襄阳，惟有诸葛亮料定了他必然不肯舍弃江陵，一定会向着正西的方向走。

诸葛亮埋伏关羽一支军队，在赤壁与江陵之间的华容道上。然而关羽的兵力究竟有限，不免为曹操所冲破。但是曹操也未敢在江陵如何耽搁，就匆匆回到

河南去了。

曹操叫曹仁留守江陵，叫于禁留守襄阳。曹仁那里是周瑜的敌手^⑧？于是江陵终于为孙权、刘备、刘琦的联军所得^⑨。

猇亭之战

在赤壁之战以后，刘备与孙权共占荆州。荆州七郡，除了南阳郡尚属曹氏以外，江夏与南郡入于孙权之手；武陵、零陵、桂阳、长沙四郡入于刘备之手。

刘备被自己的部下拥戴为荆州牧^⑩，州治在于江南的公安。孙权派周瑜作南郡太守，驻扎在江北的江陵。周瑜不赞成刘备领有江南的四郡。但是孙权很明白，共同的敌人曹操尚未铲除，不可不让刘备有相当的依据。

建安十六年，刘璋在曹操与张鲁的威胁之下，欢迎刘备入蜀^⑪。刘备叫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留在荆州；自己率领了庞统、黄忠与几万步兵，经过三峡，再溯涪江而上，与刘璋会于涪县（绵阳），然后北上，驻兵葭萌关（剑门）。

第二年，刘备就从葭萌关回袭成都，与刘璋相持于雒县（广汉），从建安十七年到十九年。经过了三年的恶斗，他倚靠了诸葛亮、张飞、赵云等的援兵与马超的西凉队伍，才终于取得益州，把刘璋流放到湖北的公安。

刘备跨有荆益二州，引起孙权的嫉妒，派诸葛瑾

来“索还”荆州，不成；就命令鲁肃以三万人进攻关羽。刘备也亲自由四川回到公安，集中了同量的兵力，与鲁肃相持于长沙与常德之间的益阳。结果是，两军言归于好^②，以湘水为界，重分荆州。刘、孙各有三郡^③。

这一种和好是暂时的。

其后，建安二十二年，曹操第三次讨伐孙权，孙权怀恨刘备，索性向曹操递了降表。

建安二十四年，刘、曹二方战于襄阳。当关羽围攻曹仁，俘虏于禁、斩杀庞德的时候，孙权派吕蒙，从浔阳溯江而上，收降公安守将傅士仁，江陵守将糜芳，同时陆逊、潘璋，也取得了宜都、枝江、秭归，关羽虽则在襄阳获胜，回路却已截断，他逃奔当阳西南的麦城，终于中了埋伏，为孙权所害。

关羽既死，隔了两年^④。刘备大举东下，兴兵复仇，产生了著名的猇亭之战。刘备的兵力究有多少，虽已无考，但是远超过于陆逊所统率的五万，则无可疑。刘备的大军从四川进展到宜昌，五六百里，势如破竹，陆逊均未抵抗。刘备的主力过了宜昌，到了猇亭，进入平原，过了七八个月，陆逊这才下令反攻，正式决战。

陆逊的成功，是基于地形的认识及敌情的明确判断。他深知三峡之中，刘备占有居高临下的优势，于是退至平地。他又深知旷日持久，刘备的运输不易；并且一进再进，兵士均已疲劳。刘备的饥疲之卒，所恃的，惟那巧妙的连营阵势或八阵图。所谓八阵图，事实上为互相犄角的若干营垒所构成，的确不易冲

破。陆逊的战术是,同时俱攻。倘若他单攻打刘备的一个营垒,则其他的营垒甚易相救;若是同时俱攻刘备的所有的营垒,则各营自救不暇,失掉连营的作用,力量较之不连营更分散。此外,陆逊又用火攻的方法,使得刘备的各营不仅不能相救,连自救都感困难;因为,一方面要对付敌人,一方面又要对付火。刘备的惨败,于是不可幸免,全部的军队,除了黄权的一部分其后投降曹魏以外,完全遭受歼灭。

刘备退到白帝城,在未死以前,接受了孙权的和谈。孙权之所以战胜求和,是因为曹丕已经出兵,派曹真攻江陵、中洲,派曹仁攻巢县、濡须口。刘、孙议和的条件:是荆州完全归吴,两国共敌曹魏。从此以后,经过诸葛亮与费祎、姜维,蜀、吴之间不再有任何的战争,一直到三国时代的终了。有时候,两国甚至约定于指定的日期共同北伐,彼此互相响应。

祁山之战

所谓六出祁山,只能称为六次北伐;因为六次之中仅有两次经由祁山:第一次与第五次。

第一次,是在后主建兴六年的春天(公元二二八年)。诸葛亮分兵两路,一出斜谷,由赵云统率;一出祁山,由自己统率。赵云所遭遇的魏方主力是大将军曹真;他自己所遭遇的是张郃。在街亭,马谡所统率的先遣队伍为张郃所击破。于是那一度响应汉方的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又成了魏的领土。

第二次,是在街亭之役的冬天,诸葛亮改由现今的川陕公路前进,经过大散关,以宝鸡为目的地。宝鸡在当时叫做陈仓,守陈仓的魏将姓郝名昭。诸葛亮的兵究有几万,现今难以确考,但是郝昭的麾下只有一千余人,那是无可疑的(魏略)。郝昭以这一千余人,竟能死守二十几个日夜。诸葛亮用云梯,郝昭就用火箭烧断他的云梯;诸葛亮用冲车,郝昭就用石磨下堕,压断他的冲车;诸葛亮填平城壕,准备令人爬城,郝昭就在城墙以内,再造一重城墙。结果,诸葛亮只得暂退汉中。魏将王双追他,遭遇他的埋伏,死于刀下。

第三次,在建兴七年的春天,紧接着去冬宝鸡之役,诸葛亮派了陈式攻取武都(甘肃成县一带)与阴平(甘肃文县一带),自己出兵建威(成县西北)。魏的雍州刺史郭淮,首尾不能兼顾。诸葛亮收复武都阴平两郡,获得巨大的胜利。

第四次,建兴八年,魏军大举反攻,司马懿、张郃、曹真,三路出兵,意图会师汉中;司马懿由街亭,为西路;张郃由子午谷,为东路;曹真是统帅,由斜谷(自郿县西南行,直指汉中)为中路。诸葛亮集合大兵于汉中之旁的城固,坐待三路之会师而来。这时候,有了大雨,魏的三路大军都半途撤退——只有西路司马懿的前锋郭淮,与魏延略有接触,魏延获胜。

第五次,在建兴九年,诸葛亮再出祁山,用木牛运粮,与司马懿相持于上邽(天水西南)。这是一个时间很短的持久战,从春天二月,到夏天六月。其间,也有

过一次激烈的会战，诸葛亮获得甲首二千级，衣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他之所以终于退兵，仍旧是因为粮尽，所谓木牛，并不曾能够彻底解决运输的问题^⑤。张郃率兵追击，正如第二次宝鸡之役的王双，也遭遇了诸葛亮的埋伏，死于乱箭之下。

第六次，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出兵斜谷，到达郿县，进占武功，“用流马运”。这是企图利用渭河的一段为交通线。流马是一种船，正如木牛是一种车。司马懿的对策，依然是持久二字。流马的效用依然有限。诸葛亮改行屯田，预备以持久对付持久。经过三个月一百余日的苦干，诸葛亮不幸积劳病故。

诸葛亮北伐的失败，并非战斗本身的失败，而多半是由于军粮不继。陕甘之间与川陕之间交通极困难，尤其是汉中与文县，汉中与宝鸡郿县，汉中与成都之间，全是若干毫无公路或铁路，纵深数百里数千里的大山。历来据有四川的人，守固可为，攻外不易。并且，守蜀惟有守于蜀境以外：所谓“若无汉中，是无蜀也”。这也许正是诸葛亮屡次出兵“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理由。他的战略，实是一种“攻势防御”，所谓以攻为守。他若是不攻，就不能保持主动，就要处处防备敌人；如此长距离的秦岭，到处有敌人可以侵入的谷口，如子午谷、斜谷、阳安关、阴平关等等，防不胜防。尤其是兵力较小的蜀汉，与其分兵分力于无数的谷口，不如集中兵力，直捣敌巢，使敌人疲于奔命，无暇攻我。

进一步说，诸葛亮未尝无吞魏之志，然而荆州既

失，条件已缺。当初在隆中，他就预定了两条路出兵：“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刘备）身率益州之卒，以出秦川。”无奈这位上将（关羽），早已随荆州而丧失。我们不应该责备他，正如我们不应该责备其后“九伐中原”而终于无功的姜维。倘若刘备能单独攻下雒县（广汉）与成都，则诸葛亮仍可留在荆州，辅助关羽，荆州便不致丧失，那末，三国的局面实未可知。

附带的，我们应该说，在诸葛亮努力北伐的时候，孙权很能遵守盟约，常常出兵呼应。最初，街亭之役，孙权派了鄱阳太守周鲂，诈降于魏，诱致魏将曹休，大破之于石亭。其后，宝鸡之役与建威之役，孙权称帝，表示与魏决绝，并且与蜀订约。将来平分魏的领土；豫、青、徐、幽四州属吴；兖、冀、并、凉属蜀；司隶校尉部则东西以函谷为界（蜀汉建兴七年，吴青龙元年）。再其后，当魏军三路进攻蜀汉的时候，孙权派了全琮攻打六安，自己亲征合肥，以示牵制（青龙二年）。不久，诸葛亮再出祁山，孙权又命令中郎将孙布诈降，诱致魏将张凌，设伏于阜陵，为张凌所觉察，中途退走（青龙三年）。最后，诸葛亮屯田于五丈原，孙权三路大举，令陆逊、诸葛瑾集中武汉，孙韶、张承威胁扬州，自己御驾亲征，再围合肥。于是魏明帝也御驾亲征，统率大量的水军，来至寿县，才逼得孙权解去合肥之围。——诸葛亮东连孙吴的政策，证明是没有错。

阴平之战

当初赤壁以后,不该有孙、刘二人的冲突,以致造成了魏的独强。魏在那个期间,削平潼关以西的马超、宋建,并有雍、凉二州;又向北,羁縻了南匈奴的单于呼厨泉,讨破了代郡上谷的乌桓,收降了辽东太守公孙渊。并且,练就大量的水军,控制全淮,在合肥又修筑了新城,使得孙权从此不能发展。结果,后汉的十三州部遗产,魏有其九、吴、蜀合计不足四州。

若非诸葛亮与姜维先后为攻势的防御,不断出击,同时有孙权及其后的诸葛恪为贤明的响应,魏之并蜀,无须等待到后主即位以后的第四十一年。

姜维的苦心与忠诚,是够得上流芳百世的。在诸葛亮初出祁山的一年,甘肃三郡的吏民曾经一致背魏应汉,而姜维便是其中的一个,他年方二十七岁,是兼有文才的少年军官^⑧。诸葛亮把一己所有的军事学识,都慢慢地传授了给他。

在诸葛亮死后,蒋琬与费祎二人相继秉政,有十二年只守不攻,到了延熙十年,才派了姜维,以卫将军的名义,与魏将郭淮、夏侯霸等大战洮西(甘肃省西南部分),获得胜利。这就是所谓九伐中原的第一次。九伐,诚然有之。而所谓中原,只是凉州而已。诸葛亮当年出兵,时而祁山,时而斜谷,可谓力争上游,力争渭水之上游。姜维呢,简直是争夺渭水之源。第二次,延熙十二年,出兵雍州。第三次,延熙十三年,出

兵西平(西宁)。第四次,十六年夏,进围南安(陇西县东北)。以上,都不曾成功。第五次,十七年夏,克复了狄道(临洮)、河关(导河)、临洮(岷县),但是未能占有,于是尽移三县之民入川,安置于绵竹及繁县(新繁)。第六次,十八年夏,仍出狄道,大破魏将雍州刺史王经,斩杀数万。第七次,十九年夏,与胡济约期会师于上邽,胡济失期不至,姜维反为邓艾所败。第八次,延熙二十年,姜维率数万人,改出川陕公路,与司马望、邓艾相持于芒水。第九次,景耀五年,出兵甘肃,为邓艾所败,西走沓中。

总计姜维九次北伐,竟有七次失利。失利的原因,有人说,都是由于宦官黄皓。实则黄皓专权,始于景耀元年,不能影响到前八次的北伐。真正妨害姜维的,倒是出师表所称许的费祎。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费祎说:“丞相犹不能定中原,况吾等乎!”诸葛亮的贤明的攻势防御政策,到了费祎手中,竟然变成了失败主义。

在姜维第九次北伐的明年,后主景耀六年,司马昭派遣征西将军邓艾、镇西将军钟会、雍州刺史诸葛绪,三路伐蜀。邓艾担任西路,在甘肃与姜维相持;钟会担任东路,在陕西直捣汉中,诸葛绪担任中路,隔断陕甘,使姜维不能东西应援。

在沓中,姜维战败;于是向东撤退,不料那陕甘枢纽的阴平桥头,已为诸葛绪所占领。究竟这诸葛绪,尚不是他的对手;他只须略施小计,阴平又入于他的掌握。(姜维故意不争阴平,引兵奔向天水,诸葛绪惟

恐天水有失,立刻回师。结果是,阴平仍被姜维渡过。)

阴平之南的桥头,有廖化与他共守。廖化刚从后方来,告诉他汉中与阳安关均已失守。姜维认为处此局势,惟有赶快退兵,保卫四川。姜维与廖化,于是退到汉寿(昭化南)。在汉寿,遇到张翼、董厥。姜廖张董四人带领了所有的兵,死守剑阁,抵住了钟会。

邓艾追踪姜维之后,占领阴平。这阴平,地居成都之正北(甘肅文县),由于大山横断,在当时是无路可通。邓艾若是希望入川,惟有沿着白水东下,先到广元,再经剑阁。因此,姜维以为,只要守住剑阁,邓艾与钟会皆不足虑。

谁知邓艾竟有另一种的看法。他以为本来是自己担任牵制,钟会担任击虚。现今钟会担任了牵制,那末,自己何妨击虚?若是也沿着白水而下,无非与钟会会师罢了。剑阁天险,依然难攻,倒不如改由阴平翻山,辟路南下,与大自然斗争,真正的“如入无人之境”。于是七百里的大山,竟被他一一翻过,遇到悬崖绝壁,不惜“以毡自裹,推转而下”。阴平之南,有摩天岭;越过摩天岭,有德阳亭(平武);再南,就是江油。江油的守将马邈向邓艾投降。邓艾由江油,推进涪县(绵阳),再推进到绵竹,诸葛瞻奉命由剑阁赶来抵御,全军殉难。

这时候,姜维犹在剑阁,率领大军四万余人,退至郫县(四川三台),准备由中江的小路回援成都。他不曾料到后主听从了谯周的建议,向邓艾投递降表。后

主自己降了，又强迫姜维投降。于是姜维的军队便与钟会的军队混而为一。

姜维之降，据汉晋春秋说，本是一种权宜之计。他第一步，促成钟会以阴谋的手段消灭邓艾。邓艾既死，他第二步，令钟会自称益州牧，申讨司马昭。这两步，他都办到。第三步，他劝钟会尽杀魏将，然后出兵，钟会已经把所有的魏将都拘留起来，不料功亏一篑，未被拘留的下级军官也人人自危，终于发生暴动，把钟会与姜维一齐格杀。

长 江 之 战

祁山与阴平的战事均在西方，东边的魏、吴之间的交锋，我们应该补叙。

有两个据点，是魏吴所必争；一是合肥，一是襄阳。这两处均在魏国掌握之中，因此，吴国一向是处于被威胁的地位。在表面上看来，吴国足可保守长江以南，其实，若不在江北先占优势，长江之险就不能视为可靠。吴国之尚未被灭，一半由于在蜀未灭之前，魏有西顾之忧。一半又由于吴国的国策，也是以攻为守，不时对魏国的领土骚扰，御寇于国境之外，拿人事上的主动，补救地理上的劣势。

孙权在世的时候，曾经一再出兵，作诸葛亮的呼应。赤乌四年（蜀汉延熙四年），他又单独进攻，令全琮、诸葛恪、朱然，三路进兵，分向寿县、六安、樊城。这时候，诸葛瑾已做了大将军，越过樊城，占领了南漳

县西的柵中。等到五月，司马懿带兵前来，孙权才肯撤退。隔了两年，孙权又派遣诸葛恪出兵六安，大破魏将谢顺，掳获不少的男女人口。这一次，又是司马懿率兵前来，进入舒城，袭取了诸葛恪的大本营——安庆，才使得诸葛恪退守九江。蜀汉那一方面，蒋琬为大将军，不仅按兵不动，而且离开汉中行营，退居成都，孙权仍旧对蜀汉信守盟约，但是一般人已经疑心到蜀、魏相通，背盟谋吴了。赤乌九年，在姜维第一次北伐的前一年，孙权派车骑将军朱然，再击柵中，斩获一千余人。赤乌十二年，正当姜维第三次北伐的时候，魏国派了大将军王昶、荆州刺史王基，分围南郡（江陵）、西陵（宜昌）；均遇到吴军坚守而不久相继引退。

孙权死后，孙亮的元年，魏国令诸葛诞以步骑十万，进图南京的对江门户——东兴（巢县东南），另派王昶攻南郡，毋丘俭攻武昌，以为牵制。在吴国的一方，有继承父亲而任大将军的诸葛恪，在东兴与魏军交战，大获胜利。斩杀魏将韩综、桓嘉等人。明年，诸葛恪率兵攻魏，围合肥的新城，不幸遇到瘟疫，死了一大半兵员，回到南京，被武卫将军孙峻杀害。这一年，是姜维第四次北伐的一年。

其后，魏国防守东境的诸将：如镇东将军毋丘俭、前将军文钦、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先后因不满于司马氏之专政而奔吴（五凤二年及太平二年），吴国不费一兵一卒，而获寿县，一时兵临淮上，声势颇大。太平三年，司马昭夺回寿县。吴国自身也发生大臣专政的现

象：孙亮的儿子孙琳，废了皇帝孙亮，改立孙权的另一儿子——孙休。

孙休在位七年，只晓得读死书而不敢打仗，因此吴魏之间便不再有什么军事上的接触。他坐视西蜀灭亡，不加援救，结果，魏将胡烈于灭蜀以后，率领步骑二万由四川来侵宜昌，吴军不战而退。

孙休在三十岁的时候死，丞相濮阳兴与左将军张布共立孙皓。孙皓既立，吴、魏之间，就谈不上有什么对垒。他虽然在位有十五年，用了六个年号，事实上只是以骄奢淫佚的方式，过着苟且偷安的生活。

然而在三国之中，吴总算是最后才亡的一国。那地域最大、兵力最强的魏国已于公元 263 年灭蜀之后，没有两年就为晋所篡。司马氏一家，自从在 249 年（魏废帝曹芳嘉平元年），打倒曹爽，便一直专政，有了十五六年。那些名为皇帝的曹操子孙，都是苟延残喘。到最后，无疾而终^⑧。蜀吴二国之亡，却不失为轰轰烈烈。

晋国灭吴的战略，是六路进兵，以五路对于长江为平行垂直线的进军，使得凭藉长江的吴国，首尾不能呼应；另一路，则出其不意，迎头痛击，顺长江之流而东下，直趋南京。前五路是：第一路，司马伷，进攻涂中（滁州）；第二路，王浑，进攻牛渚（采石）；第三路，王戎，进攻武昌；第四路，胡奋，进攻汉口；第五路，杜预，进攻江陵。其他一路是，第六路，王濬，由重庆率领水军，浮江东下。

即使孙权与陆逊俱在，对于如此的六路大兵，必

已虽于应付,何况如今朝无大将,居帝位的又是孙皓。孙皓的办法,是以“不应付”应付之,听其自然。于是,所谓长江之战,虽然晋方的计划极好,而根本并无大战产生。值得记述的,只是:杜预攻占江陵,斩了吴国的江陵督伍延;王浑也斩了吴国的丞相张悌、丹阳太守沈莹;王濬呢,舟师所至,土崩瓦解,很迅速地经过武汉、九江、安庆、芜湖,来到下关。孙皓于是就写了降书三份,分送比较迫近城下的三人:王濬、王浑、司马伷。降书上说:“暗劣偷安,未喻天命,至于今昔,猥烦六军”。他降了以后,爵位次于后主一等:后主为公(安乐县公),他仅是侯(归命侯);后主尚能“开国胙土,率遵旧典……食邑万户,赐绢万匹”;他呢,所受到的仅有“田三十顷,岁给谷五千斛,钱五十万,绢五百匹”。

结 论

三国之分,是分于东汉的外戚、宦官、党锢、黄巾、董卓之祸。三国之合,是合于司马氏一家之长于用兵,勤于治理,使得他们所主持的中原,蓄养了统一天下的能力。

总结三国时代将近一百年之中,最能用兵的大概要推曹操。其人道德如何,姑不具论,然而他白手起家,毫无依附,却能立足甚稳,次第发展,先有兖州,次有豫州,继取扬、徐,再进而吞并冀、幽、青、并,破灭荆及雍、凉,系虏匈奴乌桓,几乎统一了中国。青州的黄

巾,自从在兖州被他收编,便成为他的基本武力。他迎奉献帝于众人不迎之时,是他在政治上的成功;屯田许昌,使得军用不乏,是他在经济上的成功;以寡攻众,以弱敌强,在官渡一举而破袁绍,是他在军事上的成功。他对吕布作战,常用设伏诱敌,中途“遭遇”的方法,对马超作战,又用掩蔽伪装及反间的方法,这些,尚不过是微枝末节的战术而已。一般人对他不满意,恨他在事实上篡位,不忠于汉,但是大家不曾体会,当时的君主专制政体,久已是君主而不专制,大权一向旁落,从西汉霍光开始,一向是“大将军”秉政,三公都是虚设,而且后汉在章帝后,不曾有过“长君”,能够在位的全是幼主。至少,关于皇帝大权旁落,我们不应该单独责备曹操一人。

在另一个观点之下,我们也应该称许刘备。无论如何,他总是一个为主张而奋斗的、富有热情、对得住朋友的英雄。单从他对于关、张、诸葛,死生无间的友谊,就可以证明他决非传说所谓专卖朋友、专倒戈以自利的“枭雄”。他对于陶谦、袁绍、刘表,均不曾有过什么枭雄的表现。他只是对于曹操、刘璋二人,作风迥然不同;然而这两人,的确是对他初则欢迎,终怀猜忌。刘备在上半生,唯一的缺点,便是立足不稳,没有力量,或没有决心去割据一方,求独立的生存,我们只看见他一再逃亡,投奔依靠;这由于他学问较浅,既无地理形势的眼光,政治分析的头脑,又缺乏充分的军事知识,以致即使稍有地盘,也不能守。自从获得了诸葛亮的帮助,他的事业就上了轨道:有目标,有计

划,有配合,有运用。结果是:一切都逐渐有了基础。他自己一人,远不如曹操;加上了诸葛亮,才胜过了曹操。

至于孙权,在刘备与曹操的相形之下,似乎不值得我们称赞。他,有什么?基础,是父兄的;人才,是父兄的,然而他的长处,就在于能够守业,知道应付环境,知道团结部下。曹操与刘备二人,若是死后能有这样一位子弟,魏、蜀是否会遭篡灭,真成问题。一般人均以为创业极难,守业极易,不知道创业只须打击有形的有数目的敌人,而守业则须打击无形的无数的敌人,并且还要克服自己精神的惰性、制度的惰性与时间本身的惰性。孙坚、孙策,所遇到的只是董卓、袁术及若干的山贼,可以说,都是不成材的人物;而他所遇到的却是庞大的、精悍的曹操与刘备;他第一次被试探于赤壁,这二次被试探于猇亭。这两次,他都获胜。

在曹刘二人相继逝世以后,三国的舞台之上,孙权之外,仅有诸葛亮、司马懿、姜维、邓艾,值得我们注意。当初剧烈的斗争,一次紧接一次的若干大决战,都渐渐的成为过去;代之而起的,是持久的对抗,一年又一年的四五千至多两三万人的小接触。各国均注意于内部的整理或内部的政争;纷乱的局面在不被觉察的变化之下,趋于稳定,而最后的全局稳定就是晋的统一。社会上的真正人才的总数,并不曾有什么消长,但是精力的表现,已经换了方向,减了浓度,远不如曹操、刘备、孙权之富有色彩,之易于博得后世的

追忆与称道。

注 释

① 从中平元年黄巾之乱,到咸宁五年的王潜灭吴,共为九十六年:公元 184 至 279 年。

② 上军校尉,中军校尉,下军校尉,典军校尉,助军校尉,佐军校尉,左校尉,右校尉。

③ 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渤海太守袁绍。

④ 见袁绍上献帝表:“故遂引会英雄,兴师百万,饮马孟津,歃血漳河”——《后汉书·袁绍传》。

⑤ 当初袁绍是属于何进的一派,主张立何皇后的儿子(少帝)而反对立陈留王(献帝)的。这时候,袁绍又颇想拥立幽州牧刘虞为帝,但为刘虞所拒绝。

⑥ 曹操的家乡谯县(亳州),离开当时扬州的首县寿春(寿县)不远,扬州刺史陈温准许他募足了四千人,这四千人在寿县、怀远的途中逃亡甚多,只剩下五百人左右,到了宿县才又补充,凑足了一千人的数目。

⑦ 公孙瓒之灭亡,也是在初平四年的春天,但比较曹操第一次讨伐陶谦,为时略后。

⑧ 张邈是兖州陈留郡的太守。

⑨ 昌邑是山阳郡的首县,在今日山东金乡县的西北四十里。

⑩ 东汉自窦宪以来,掌握最高政权的一向是称

为“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

⑪ 魏志武帝本纪，只承认东郡太守是袁绍所保荐，至于兖州牧一职，却是兖州的官吏所自动推举的。

⑫ 当时袁绍已是吕布的敌人，也许有出兵助曹的事。

⑬ 《后汉书·百官志》：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

⑭ 系关羽所斩。

⑮ 曹操从建安元年定都许昌的时候，就开始实行屯田制度。

⑯ 后汉有十二州及司隶校尉部，司隶校尉部相当于一州。

⑰ 刘备在汝南游击失败以后，奉了袁绍之命，来游说刘表；从此便留在刘表那里，驻防新野，极不得志。但是新野离开南阳不远，工作清闲的刘备，倒反有了访求人才的机会，终于求得了诸葛亮。从此以后，刘备的行动就有了一定的计划。

⑱ 周瑜在攻打江陵的时候，曾为流矢所中；其后箭疮溃烂，死于巴丘（岳阳）。

⑲ 刘备表孙权为徐州牧，实则徐州尚在曹操之手，又表刘琦为荆州牧，自居为豫州牧。这些所谓“表”，根本也到不了汉献帝的面前。

⑳ 在刘琦病死以后。

㉑ 献计的是别驾张松，奔走接洽的是参议之流的法正。

㉒ 所谓单刀赴会，即在此时。

②③ 孙权有江夏、长沙、桂阳；刘备有南郡、武陵、零陵。

②④ 传说以为关羽死后刘备就立刻东征，是错误的。

②⑤ 现今河南有小木车，形似四川之鸡公车，俗称土牛。诸葛亮长于发明，尤喜于创立新颖名词，例如有一种连弩，他在发明以后，就取名“元戎”。

②⑥ 姜维在当时，已是才子。

②⑦ 亡国以后，也很受晋的优待，正如当年汉献帝的受魏优待一样。

(1939 年)

淝水之战

在公元383年，淝水之战的前夕，汉族是到了很严重的关头。五胡（匈奴、羯、氐、羌、鲜卑）不仅在北方骚扰了八十年，而且已经合并成为一个大国，统一了中国的北部。这便是前秦，又称苻秦。苻秦是创始于苻洪。他的孙子苻坚，想更进一步，征服南方，统一中国。

苻坚动员了一百二十万的大兵，分三路进军，来攻打淮河以南的东晋。北路是山东河北的兵，经由徐州南下；西路是四川与汉中的兵，经由长江与汉水顺流东下；中路主力，由他自己率领，从西北迤向东南，经由渭水、黄河、汝水、颍水，直到颍水入淮的所在，颍口；他自己屯于项城。首先到达颍口的是前锋司令苻融，兵力有二十五万。以如此兵力，进攻淮河南岸的寿阳（寿县），当然不是很难的事。东晋的寿阳守将胡

彬只得退保硖石(凤阳县西)。

苻融派了梁成领二万人渡淝水直向正东,到达洛涧(洛河),栅断了淮河的水面,阻止东来的援军,胡彬陷于包围之中。

谢安叫谢石率领八万人前来抵抗,扎在洛涧以东。苻坚截得胡彬致谢安的书信,信中说“粮尽”。苻坚,因此深知晋方空虚,就不再等候主力,而离开项城,亲自到寿阳来指挥前线的作战。

他的在洛涧西岸的阵地,遭遇了晋军一次很猛烈的夜袭。晋军将领刘牢之率了五千人,夜袭秦军的营垒,杀了秦将梁成及其士卒一万五千人。梁成部队的残余由于后路被晋军切断,多半因争渡淮水而死。

这虽是前哨的一个接触,关系却是极大。淮河的封锁线既破,胡彬所受的包围已解,晋军沿着淮河的南北两岸,水陆并进,一时声势颇为浩大。苻坚站在寿阳的城墙,望见淮河北岸的八公山,草木皆兵。他长叹一声,说:“这些都是晋兵,怎能说他们人少呢?是我们估计错了。”

最后的决战在淝水。苻秦的兵守着西岸,晋军进抵东岸。谢石、谢玄、谢琰,以精锐八千,渡水突击,当地的秦兵人数有三十万,对于这八千人的突击,本可不受什么影响,只是最前线略受一点震撼而已。谁知这轻微的震撼,竟然使得秦兵全体溃退,至于不可收拾。

传统的淝水之战的解释,是:谢玄写了一封信给秦军的前锋司令苻融:“君悬军深入,置阵逼水,此持

久之计，岂欲战者乎？若少退师，令将士周旋，仆与君公，缓轡而观之，不亦美乎？”苻融将计就计，麾军少退，预备等待晋军渡水的时候，及其半渡，“覆而败之”。他的在后方的部队误会了，以为前方战败，纷纷逃命。苻融弹压不住，死于乱军之下。

我对于此种解释颇为怀疑。即使事实上果有谢玄请苻融让出战场的交涉，也并不能充分解释秦兵的大崩溃。必定在秦兵后路，另有晋军透露出迂回包围的倾向；或是秦兵受了某种份子的故意造谣而在军心上产生了恐慌。

《晋书》列传卷五十一，有关于朱序的记载。朱序原为东晋的梁州刺史，镇守襄阳，因同守襄阳的李伯护私通敌人而受害，成了苻秦的俘虏。他逃到宜阳，躲在友人夏揆的家中。夏揆因此遭受逮捕。他放弃了回晋企图，向苻秦的政府自首以救夏揆。苻坚很佩服他的义气，请他做了一名尚书。

在苻坚大举伐晋的时候，朱序也随从在军。苻坚令他到谢石的营中，宣传自己的兵威，劝谢石赶快投降。朱序见了谢石，把劝降的使命搁在一边，反把苻氏的虚实，向谢石尽情报告。他说：“苻坚的兵确有百万之多，但现在尚未到齐，攻击他应该乘早。”谢石接受他的建议，派谢琰率领勇士八千人，涉淝挑战。

谢石的八千人突然攻击苻融的部队，使得它略为受了一点震动。这时候，朱序在秦兵的后方，“唱云：‘坚败’，众遂大奔。”

从这一段史料看来，朱序始则报告敌情，继则摇

惑敌军军心，促其崩溃；他的行动，对淝水战局有决定性的影响。

此外尚有一段事实，我们不可忽视。退守硤石而遭受包围的胡彬，自从刘牢之在洛涧获胜，解了他的包围以后，包围他的部队便和刘牢之的部队联成一片，沿着淮河北岸，向西进展。在战略上，胡彬这一支军队颇有绕到秦军寿阳后方的可能。秦军的军心瓦解，不仅是由于朱序的造谣；也由于实力的威胁。

此外，谢安所派的兵共有八万；交给刘牢之与胡彬的只有一万三千人左右，其余的六万多，可能也已经在暗中绕到了敌人后方，虽则晋书不曾交代明白。

谢安在淝水之战的前后，其镇静的精神与苻坚的慌张，恰好成为对比。谢安深知以弱御强，以寡御众，不是一件易事；但当谢玄来请示方略的那一天，他毫不惊讶，淡淡地说：“政府已经另有办法。”谢玄不敢再问。谢安于是邀集了许多亲朋，到郊外的别墅去游玩。他与谢玄又对下了围棋，平常谢玄是赢的，在今天却输给了他。他又观赏了半天风景，到夜间，才召集诸将，面授机宜。

后来淝水之战结束，谢石、谢玄、谢琰等人的报告，递到南京。谢安那时候也正在与一个客人下棋，看罢了报告毫无喜色，仍旧下他的棋。客人倒是心焦得很，问他：“消息究竟如何？”他慢慢地答道：“孩子们居然打败了敌人。”

后来他回到内室，虽然不免把木屐碰了门槛，碰坏了木屐下面的屐齿，比起苻坚却仍旧高明得多。苻

坚始则夸称投鞭可以断水，继则洛涧一败，便以为八公山草木皆兵，最后于淝水决战之时，前锋近三十万人崩溃无余，自己狼狈而逃，把风声鹤唳，都当作追兵。真癩！

一个拚命的留学生玄奘

我们钦仰玄奘为人，敬佩他的精神，毅力，拜服他的造诣，所以我们虽也是出国读书的人，看见说今日留学生比起玄奘来“不及他千万分之一”的话，只觉得说得对。

玄奘是贞观二年去印度，贞观十九年才回国的，回国后先后翻译了一千三百余卷的佛经，创肇法相宗，启迪唯识宗，的是一番“大业”。我们因为种种原因久居海外，看他这种精神，觉得人家之称我们为“流落者”不足耻，如果在这时期内能有所得，则也许我们能有机会回国之后，还能够为祖国做些事。比起玄奘出国二十多年来，我们在国外的时间还短；比起玄奘出国时只有二十六岁来，则我们一般年龄较大；而以我们今日所

处的情境来看，则国家更需要我们。以我们这种情境，这种年龄来说，我们可有二十多年的打算，却不能有拖其二十余年的心理。亦即是说可有最坏的打算，却不能没有最好的希望，而基于这种希望势非超速着力不可。再翻过来说，我们很多人也许一生里造就终及不上玄奘，然心里却不能不以之为准，脸皮不能厚得人也变成顽冥不灵。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篇文章可以使一般人知道玄奘不是《西游记》中什么事都要靠孙悟空的，盘丝洞妖精要抓去，女人国要招亲的白脸和尚，也是好事。好事之谓何？谓使一般人多得真知也。知识，或者说学问，是一点一滴地积聚起来的，若再能使之有系统，能触类旁通，则人人皆是专家矣。

是故我们以为黎先生大作好，盖读书人看了有好处，一般人看了亦有好处也。如果我们再说黎先生文章流畅动人，则有几位读者不会说我们多此一举？

——林语堂先生在本文刊于《天风月刊》时之按语

我认为唐僧玄奘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之一，因为他的一生奋斗经过最能代表中国的民族性：为了追求一个目的，颇能苦干到底，并且于必要时拿性命来孤注一掷。

他为了想留学,就冒禁出玉门关。一个人单骑独马横渡莫贺延沙漠,几乎渴死,为了拒绝高昌王的强留,而绝食;在穿过帕米尔北的冰山之时,几乎滑了下去;最后,在学成以后,为了坚持自己所讲的讲演词,而情愿于万一辩论失败之时当众斩首,这些,都足以证明他的拼命精神。

他自始至终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做学问的人,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念过不少书,写过不少文章,也翻译过不少书。一直到死为止,他没有离开过书本。这种恒心,这股劲儿,只有中国人和德国人有。(日本人也有点儿如此,可惜一般的日本学者负责任的态度有点不够,喜欢自恃聪明,以皮相之谈与隔靴抓痒为满足。)

到今天,谁还能否认玄奘的伟大呢?只有他经手翻译的佛经,才是最精确而信,达,且雅的。只有他口授的大唐西域记,才是公元第七世纪中亚细亚及印度的最可靠史料。只有他所介绍的唯识论与成唯识论才是佛教哲学的最高峰。

在他以前,华文的佛经不算不多,甚至一经常有数译,然而错误极多。在他以前,介绍来华的佛教宗派也不为不多,然而能保存各该宗派的本来面目的却一个也没有。

他自幼出家,天性好学,有书必看,有师必问。其后他离开家乡河南到四川拜访了不少名刹,博得许多老前辈赞不绝口,然而他的疑问越来越多,所以就决心探水求源,到印度去跑一趟。

那时候唐朝开国不久,西突厥雄踞中亚,新疆以及阿富汗一带的小国家都是仰它鼻息的,因此唐朝政府为了国防原因,禁止老百姓出国。谁要是胆敢偷越玉门关,关上的守卒有旨射杀勿论。在如此情形之下,玄奘当然请不到留学护照或官价外汇。

玄奘不顾一切,骑了马向玉门关走。走到凉州,有人请他演讲,因此就结交了很多新的朋友,大大的减轻了前途的困难。凉州有一位老和尚慧威法师秘密助他成行,派了两个徒弟护送:白天睡觉,夜间走路。(其实大可不必,因为在他们一行三人到达敦煌的时候,瓜州刺史独孤达早就听到风声,不仅未加速捕,而且特设素宴欢迎。)

玉门关不归独孤达统辖,否则事情便简单了。独孤达选了一位路熟的胡人带路,仍旧昼伏夜动,于三更左右到了玉门关附近。这玉门关是建筑在一条河上面的(叫做瓜鸭河),形势雄壮得很。胡人带他绕道至关北十几里水浅河窄之处,藉着两旁有“梧桐”树丛作为掩护(此梧桐谅必不是普通的梧桐树,是一种盘根错节的矮树,遍生沙漠地带,在今日新疆本地人仍称它为“梧桐”),两个人动起手来,“斩木铺草,驱马而过”。

这位胡人很像是一位走私专家,有办法得很。但是他“为德不卒”,做人情做不到底,才出了关就要回去。他临走之时告诉玄奘,说前面还有五个堡垒,要小心才好。我们的玄奘才走到第一堡垒,便被守卒发现,捉到了堡垒里去。幸亏这堡垒的军官(姓王名祥)

是一位佛门弟子,不仅不公事公办,而且留他息了一晚,又亲自送了十几里,并且指点他“终南捷径”,走小路避开第二堡垒与第三堡垒,而走向第四堡,因为第四堡的主持人王伯陇也是一位佛门弟子,与王祥交谊颇好。玄奘如法炮制,走到了第四堡垒,果然又蒙王伯陇优待。这王伯陇送给玄奘一个皮口袋,盛满了水(笔者在新疆旅行时所用的是大葫芦);告诉玄奘如何绕过第五堡垒,直向一百多里外的野马泉去打尖。野马泉有水,可以喂马,可以把喝干了的皮口袋再行盛满。

可怜的玄奘走了一百多里,不曾看见有野马泉。一失手,又把皮口袋掉下了,剩下的水完全倒光。心慌、口渴、又走了四夜五天,越走越看不见什么野马泉。任是铁铸的罗汉,也要走得筋疲力尽了。玄奘这时好比死了一般,一躺下去就睡在沙中爬不起来,睡到半夜,忽被一阵冷风吹醒,浑身一阵清凉,居然又有了挣扎的力气。那匹坐骑(也许就是小白龙罢!)也一样的如同大梦初醒,聪明万分,昂着头直向一处它要去的地方跑,完全不依玄奘指挥。原来距离不远,便有一块小小的青草地与水塘。玄奘与马,死里逢生,痛痛快快的休息了一天一夜。

总结玄奘的留学历史,彻头彻尾都是充满着这种拚命精神。本来,天下的大事业何一非由拚命得来?这条命如果不拿去拚,拚取比较有意义的东西,勉强留下来也无甚价值可言。因为活到一百岁还是要死的啊!

玄奘与马在充分休息了以后,又走了两天,到达伊吾国(哈密)国境,挂单在一座庙里。伊吾国的国王亲自走来拜访,又把他请到王宫里去住。住了十来天,高昌国的国王派来特使,硬请玄奘到高昌国去走一遭。(高昌国的国都在今日吐鲁番的交河城遗址,俗名雅尔湖,笔者于民国三十二年曾经骑马去凭吊过,楼阁俱圯,规模犹在,城内街巷纵横,中心有佛塔一座,多数民居均有地下室,想见当年文化水准之高。)

高昌在唐代西域诸国之中,汉化程度最深,公文全用汉字,居民成份汉人的百分数也最大,不少为汉代戍军的苗裔。王室麹氏也自称是汉人。黄文弼教授著有“高昌麹氏纪年”,可资参证。国王麹文泰是一位虔信佛教的开明君主,对老百姓很好。他一心想留玄奘为国师,主持全国的宗教与教育。玄奘不肯,麹文泰想尽方法来苦留:包括攀亲与武力恫吓。他向玄奘说:“你不听从我的要求,我就押解你回中国,不让你满足去印度留学的志愿。”玄奘说:“你定要逼我,我就死在此地。”说罢,就开始绝食起来。绝食了四天,把麹文泰弄慌了手脚,连忙赔罪,允许玄奘西行,而且赶做袈裟,预备干粮,指派护送人员,拨给驮马坐骑,附带的唯一条件是再留一个月,讲经一部(《仁王般若经》)。

转瞬间一月已过,麹文泰只好送行。他率领国都全城人民与全朝文武,陪同出城,走了若干里才与玄奘殷殷道别,并且赠送亲笔信二十四封,分致屈支以

西二十四国国王，另加奏章一道，奏请西突厥大可汗叶护，特别关照。

玄奘获得了如此热心而有力的知己，原可一路顺风，直达中天竺纳兰陀寺，无奈一劫方消，另一劫又生。他此刻本已了解行路之难，特地约好商人与他们的驼队偕行，谁知走了不久，便遇到大批强盗，把商人的货物与他自己的旅费、马匹、食粮抢掠净尽。有若干商人痛心之余，决意自杀。我们的玄奘法师却能处之泰然，彻底认清人生原是空来空去，不能有所得，也就不能有所失，正如般若波罗密心经所说。他温言劝导商人，叫他们不必难过。他不用高深难懂的佛法来立论，而用浅显的“世间法”来化解。他问那些商人：“是钱要紧，还是性命要紧？”商人说：“性命要紧。”玄奘说：“强盗抢去了你们的钱，有没有抢去你们的性命？”商人说：“性命还在。”玄奘说：“那么，你们还愁什么呢？”于是，商人们恍然大悟，就不想自杀了。

玄奘继续向西边走，顺着天山的南麓，经过今日的焉耆（阿耆尼国），库车（屈支国），拜城（跋禄迦国），然后冒险穿过帕米尔北麓的大冰山（凌山），真正是又来一次“拼命”的壮举。这冰山从来积雪不化，而且每年秋冬之交照例添铺一层厚冰，几百万年以来所堆的冰也够瞧的，看看就叫人发抖，何况要牵着一匹马爬上爬下，爬个七天七夜，稍不留心，便滑下无底深渊。玄奘说，连他自己也不敢向渊底注视，因为下面是数不清的千年不化的僵冻尸首。这七天七夜之中，他还要喂马喂自己，架锅烧饭；有时候也不得不休息片刻，

“席冰而寝”。读者诸公,请问这不是拼命是什么?与他同行的商人,死掉了十分之四。

过了大冰山以后,就到达今日俄属中亚细亚,玄奘仍旧向西走,略为偏北,喝尽了西北风,整整的喝了四百里西北风之多。在他的南面便是所谓热海。叫它热海,分明是地理家有意解嘲。这热海的水据玄奘说是“色青味苦”,他大概是领教过了的。吃苦水吃上四百里,我们今天的留学生们有几个人受得了呢?

其后,总算苦尽甜来,他走到叶护可汗的“素叶城”,叶护待他很客气。这素叶城方圆有六七里,滨临素叶水上,风景确是不坏,也许便是西洋史家所津津乐道的巴加松城。再向西走上四百里,就到了万花锦簇的千泉,那时候却好是暮春三月。我们的和尚总算是又交好运。

可惜玄奘心中有事,好景不敢留恋,又向西走,走到咀逻私城,打听到当地附近有安置中国俘虏的“小孤城”,也不曾有时间去慰问。

从此,他就转向西南,穿过敝赤建国、赭时国、宰堵利瑟那国,到飒秣建国。

再走,经过揭霜那国(Karsh)翻山。又到了拼命的时候,所翻的山是兴都库什山,所穿的山峡叫做“铁门”。又走了若干里,到 Balkh,是昔年亚力山大死后希腊戍卒所建的巴克屈里阿帝国的雄都,也就是大月氏于汉文帝时西迁以后据以发迹的新根据地,在唐初玄奘经过之时已不重要,成为叶护可汗所卵翼的小国之一。(在今天却是阿富汗的一座小小名城。)

再走,再走。到了阿富汗的京城喀布尔。又走,又走,走完阿富汗,到达印度。

到了印度以后,他畅游“迦湿弥罗”全境,接着便留在派夏哇城住了两年,专学梵文及大乘经典。学完以后,又在邻近的舍阿考特城再学两年。

这时候正是佛教在印度由盛而衰、又由衰而盛的一个所谓回光返照时期。作为佛教保护者的戒日王又是一个威震全印,统驭中印北印的一位英主。戒日王的发祥地他奈斯瓦属于恒河流域,紧接五河流域(旁加布)的最东部(派夏哇是在五河流域的最西部)。

戒日王一方面为很多小国的霸主,一方面兼领康奴机国的王位。他对于玄奘之来,表示极诚恳的欢迎,礼为上宾。玄奘就留在该国的跋达罗毗诃罗寺,又念了三个多月的书。

其后,玄奘就鼓起勇气走到佛教圣地般那雷斯附近的那烂陀寺去拜访戒贤大师。这位戒贤大师的梵文原名是般若·跋陀罗,是当时全印佛教学者中数一数二的老前辈,据说他已经预料到中国将有一个天才弟子前来受教,所以竭力“忍死”(抵抗病魔)以等待我们的玄奘法师来见面,好把自己所有的学问完全传授给他。玄奘果然终于来到,般若·跋陀罗的内心欢喜真是匪言可喻。

(上面这一节故事,是真是假,我们只好姑且以玄奘的弟子辩机所记为凭。但想来也不一定是绝不可能的事,心灵感应(Telepathy)在今天已是一种科学。笔者曾经见到过“大江东去”的主人翁钮先铭先生,问

他在南京陷日后避难清凉山的经过。他说,清凉山的老和尚一见他面,就说“我早就知道你要来了。”)

从般若·跋陀罗老法师,以及另一名僧、仗林山的胜军法师那里,玄奘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妙论:总而言之,既非普通的大乘,亦非小乘,而是所谓中论。这中论渊源于公元第二世纪的龙树,立论重点在于空与不空之间,既非绝对的认为万象皆实,亦非绝对的认为万象皆虚,而是折衷为因虚果实:“我”是真的,造成“我”的因素都是虚幻的。西洋人研究这一派的佛家学说,称之为主观的唯心主义。

这中论的一个支流便是“法相”。法相以为因果轮回的定律(法),只是若干虚幻的相(现象)所凑合。于是玄奘从此便学有所宗,由博返约,于进一步再作探讨之时就左右逢源,无往而不自得了。后来学成归国,就在中国创立了法相宗。

可惜这法相宗理论太高,在中国传不到三百年就消失了。然而玄奘的心力并未白抛。至少,他获得了自己所萦怀的问题的答案。而且他也尽了启迪后进的责任,增加了文化火炬的光辉。他所翻译的法相经典,如世亲的唯识论以及护法的成唯识论,到了民国时代居然又成为不少学者的研究对象;熊十力先生便是这些学者中颇有成绩的一个。

玄奘在印度周游大小几十国,前后满十五年,其盛况比之孔子周游宋卫陈蔡,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虽则在性质上不同)。玄奘之了不起,在于既能逢人请教,又能信道不疑。到了最后,他被印度人公认为

全印度第一位佛教学者。

有一件事发生在公元643年(贞观十五年)的冬天。戒日王发起请玄奘在国都‘曲女城’(就是卡奴机城)公开演讲,应召而来者有十八位国王,三千多佛教名家,二千婆罗门教及外道的信徒,又有那烂陀寺的全寺和尚一千余人。到时候戒日王带了全部侍卫及妃嫔宫女,亲自主持,请出真金铸成的大佛像,祭祷一番。戒日王介绍玄奘主讲,专就大乘立论(大概是把中论算作大乘的嫡祖了)。玄奘把讲稿高声宣读,并且声明如听众之中有人能驳倒讲稿中的任何一个字,他(玄奘)情愿砍头。从早到晚,没有一位听众敢出来和玄奘辩论。第二天,第三天,天天如此,一共讲了十八天,始终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应战。这擂台总算被玄奘占稳了。十八位国王纷纷送礼道贺,礼物的总数价值超过万万,然而玄奘一概予以谢绝。戒日王只好选了一匹大象,请玄奘坐在上面游行全城,让老百姓瞻仰,并且告谕各地百姓,说这位中国和尚讲了十八天,没有人敢和他辩。

戒日王自称弟子,请玄奘参加他的第六次布施大会。会中,戒日王把所有的金银,甚至随身衣服,都一概散光。到会的群众传说有五十余万人之多(想必包括不少希冀布施的穷人)。这也是盛极一时的壮举。(幸亏有若干小国国王替戒日王赎了不少东西回来,否则戒日王可能不得不光着身体回宫呢。)

玄奘留学,得到这样的成功,也应该回国了。所以,他顺便就向戒日王告辞。这时候,戒日王又有钱

了,便送他大象一头,金钱三千,银钱一万,又派了专使分赴玄奘将要经过的各国,请各国政府特别关照。

于是玄奘就买了不少的佛教经典与有关历史及文学的未刊书籍与抄本,捆捆扎扎,装在若干匹自己买的象的脊背上,浩浩荡荡地朝着祖国的方向前进。(当时的印度没有一部印成的书。)

不幸,在渡过恒河的时候,有一匹象由于负担太重,立足不稳,而翻下水,溺死了,损失了经典五十夹之多。

出了印度,经过今日的喀什米尔(迦湿弥罗),玄奘翻山(所翻的是昆仑岭中的大头痛山与小头痛山),到达了于阗(新疆)。于阗此时已是大唐的属国,由于唐太宗在玄奘走后灭了高昌,破了西突厥。玄奘在于阗写就了奏书一通,报告唐太宗,并且在字里行间请恕当年冒禁出关之罪。唐太宗毫不责备,叫他“即速来都”。

玄奘赶到长安,唐太宗已经为了准备讨伐高丽而跑到洛阳去了。长安留守房玄龄传旨,叫玄奘到洛阳去会面。唐太宗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英雄识英雄,一见面便请玄奘创办一个“编译馆”,招了许多和尚来当助手与徒弟,把玄奘带回来的大乘经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论一百九十二部;小乘的经典经论戒律合计又有一百九十二部,再加上因明论二十六部,其他一十三部,统统着手翻译。

玄奘最得意的一个弟子并非辩机,而是窥基。窥基的身体好得很,曾经有过几十个太太,并且养过几

十个打手，经常与这些打手练拳。窥基不是别人，是鼎鼎大名尉迟恭的儿子。玄奘的译经大业，在窥基的手中完成。

劳佛(B. Laufer)说过，“真正的历史比小说更有趣”。鄙人也以为《西游记》虽然好玩，仍旧没有《大唐西域记》有趣。让我索性再“噜嗦”一下：孙悟空没有这么一个人(还用我说?)，悟空和尚倒是有过，也到过印度，却不是陪了唐僧去的。至于猪八戒、沙悟净二人，究竟是有是无？那我就一时回答不出了。小白龙是唐僧所骑的马。龙变为马的故事，在唐朝的库车(屈支国)很流行，玄奘自己也对弟子讲过这个故事；并且同时时候在迦湿弥罗也有一种相传为龙种的马。信不信由你，我在库车也骑过一次白马，跑起来腿动身不动，活像一条白龙。

(1952 年)

王安石

我的业师梁启超(任公)先生说,王安石是大改革家,中国千古一人。在他以前,有过改革家,如在齐的管仲,在秦的商鞅。然而,论到有见识,彻底了解宋朝的政治缺点、人民疾苦、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有毅力贯彻他的计划,在宋朝以前或其以后,中国只有王安石。王安石并且在道德上与文学上也是一位完美无缺的人。

我是梁先生最后一班的四个学生之一,很服膺他的教诲。我认为他的著作虽多,其内容之精美、客观,而充满了爱国心,以王安石传为第一。可惜这一部写成于清朝末年、戊戌变法及戊戌政变之后的二百一十二页的杰作《王荆公》,仅存于大部头的《饮冰室专集》之中,外间流传极少。我这一篇小文章,只是很简单的关于梁先生的伟著的介绍。其中,略为加进一些个

人的心得。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长的朝代之一，有三百二十年，公历 960 到 1279 年。它有过十五个皇帝，北宋的太祖、高宗、真、仁、英、神、哲、徽、钦；南宋有过六个，高、孝、光、宁、理、度，加上三个末代的幼祖帝昀、端宗、帝昺。

在大体上，这个朝代很平安，艺术、科学、历史学与哲学，成就不小。内政外交，却很不好，军政最糟；经济、财政，开头还过得去，后来入不敷出，通货膨胀；民不聊生。

内政方面，结构不良，叠床架屋，职权混淆，一官数人，一人数官。中央官带了官衔，到地方管行政；省的一级十分庞杂，却没有真正负责的长官。中央有沿袭自北周与隋唐的大官们，其首领是尚书令、中书令与门下侍郎。但由于唐太宗曾为尚书令，所以唐朝于太宗以后没有人敢做尚书令，也就不发表任何人。经过五代，到了宋朝，仍是如此。北周和唐朝最初是三权分立（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在高宗以后就三权变成一权了，由一位大官以尚书仆射或门下侍郎本职，作为三省三品以上官联合办公主席，称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简称为“同平章事”。到了宋朝仍是如此。然而在这位或这几位身为“同平章事”的宰相以外，却有管军事的枢密院，不归他或他们管。另有一些专管说闲话的谏官，有权引他或他们生气，甚至令他或他们拂袖而去。有时候，皇帝不懂事，或年纪太小，宰相或宰相们又要受皇帝或皇帝妈妈或皇帝

奶奶的气。

外交方面,北方有辽。辽原名契丹,是蒙古人以前的蒙古人,中心地点在朝阳一带。在唐朝末年已经崛起,于五代时候接受石晋朝代的贿赂燕云十六州,喧宾夺主。末朝的太宗出兵讨伐它,打它不过;太宗的儿子真宗和它讲和,约定每年送它十万两银子,二十万匹绢子。这是1005年的事。在1042年辽要求增加岁币为二十万两银子,三十万匹绢子,不再称为馈赠,而称为“纳”,纳的意思,和进贡差不多。宋不敢对辽打仗,乖乖地接受辽的要求。

1122年,宋连络了新兴的金,击溃辽。金是满洲人以前的满洲人,中心地点在今天的吉林。金归还了燕云十六州,但掳走了十六州的人民与物资。宋金在1126年开战,战到1141年,金夺去开封与其他地方,宋高宗杀了岳飞的头给金兀术,与金立约,每年给金岁币十万两银子,十五万匹绢子,对金称臣。

1161年,金对宋要求再割土地,战事又起。1165年战事结束,立约:宋不再对金称臣,而改称“侄”,岁币也不称贡品而称为馈赠,数量也减为五万两银子,十万匹绢子。土地只割河南两个州,江苏两个州。

1206年,宋朝宰相韩侂胄攻打金朝,两年以后战败。宋朝杀了韩侂胄的头送给金,改岁币为三十万两银子,三十万匹绢子,外加战费赔偿三百万两。

入占宁夏的君王,原称拓跋氏,后改姓李氏,又改姓赵氏,率领羌人,成立夏国,宋朝政府也对它没有办法,也每年送岁币安抚它。

原因是宋朝的军备很差,不能打。宋朝不是没有兵,而且是有很多的兵。然而自从宋太祖以来,不敢用将官管兵,怕将官造反(他自己是造反出身)。太祖及其后的宋朝皇帝,除了神宗以外,也不敢太训练兵士。太祖之时,有兵二十万,其后逐渐增加,到仁宗之时有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绝大多数是雇佣兵。来应募的人大都是无业游民,或灾民、乞丐。一入了营,便终身吃粮,一直到死。手背刺上了字,好比囚犯,不敢走,也不愿走。官宦人家常常调用他们为仆役。

有了这么多兵,却没有可以对外作战的勇士。其后岳飞和韩世忠、虞允文的兵,是自己招来,自己训练起来的。当家的皇帝不敢同敌人打仗,宁可对敌人称臣纳贡,甘心受屈辱,为国家民族丢人。大臣也是如此。在王安石变法,励精图治之时,韩琦、文彦博、司马光等人责备王安石引起辽人疑心,正如清朝大官唯恐老百姓得罪洋人,“引起国际交涉”。

财经方面,宫廷每三年利用郊祀(祭天)的机会,大赏群臣一次,总共三百万以上。官吏相当大的,儿子受到封荫。于是做官的世世为官,不必会办事。冗官越来越多,国家的财政当然入不敷出。从英宋1067年开始,便每况愈下。农民收入不能有余,普通仅够糊口,遇到婚丧便须借贷。若是年成歉收,或遇水灾旱灾,更不能支。借债利息通常在月利百分之三以上,一年下来,更难以有钱归还。有田的卖田;田卖完了,怎么办?

王安石中了进士,在鄞县(宁波)作了县长(知

县),看到乡下人困苦,便想出了以公家钱借给他们,取息仅为月利百分之二,于稻苗尚青之时借出,于夏季、秋季两次收获之时用谷子归还本利。有几个月只还几个月的利,加上本钱。

他在鄞县四年,实行青苗贷款十分成功。

他生于真宗天禧五年(1021),于二十一岁之时中了进士(1041)。在二十八岁至三十一岁之时做鄞县的知县。他官声不错,为人也很正派,在仕途上相当顺利,于仁宗一朝历官“知舒州”,群牧判官、知常州、提点江东刑狱、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知江宁府,于英宗治平四年(1067)九月,升为翰林学士。这时候,英宗已在正月逝世,继他为皇帝的是神宗。

神宗熙宁二年(1069)二月,命令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这是副宰相的职位,当时的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富弼。

同年十月,富弼罢相,曾公亮与陈升之二人同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韩绛与王安石二人同为“中书门下平章事”。

熙宁七年(1074)六月,王安石辞相,改知江宁府。八年(1075)二月复职,再任宰相二十个月。然后又于1076年十月下台。

哲宗元祐元年(1086)十月,王安石去世,去世之时,年六十六岁。

他在朝之时,深得神宗的信任,把生平所想做的
新法各节,如青苗、免差役、均输、市易、保甲、减兵、练

勇、鼓励农田水利、方田均税、漕运、收复甘青疆土、同化湖南四川少数民族、讨伐安南、改进军用武器、发动民众养马等等，都一一施行。此外，又试办新教育，建学校，以造专材，逐渐淘汰以诗赋取士的科举。

他的种种改革，在他当政之时与辞职以后，直至神宗去世之时，都成效显著。多数农民都受了低利贷款（青苗）之赐，免于高利贷的富户之剥削。

免役，是免去农民小有积蓄之户不再受官府强派差役，而改以按照真正的资财数目，改用钱来代替不胜其烦的差役，由官府去雇人当差。

均输是源自汉朝的一种办法。地方上解税给中央，与其押运谷物或货币，不如用钱或以谷物买各地方的特产到首都卖出，可以换取高的代价；也可以取出中央机关所需要的东西，不必用现钱在首都购买。

市易，是用政府的钱在沿边重要交通据点，买卖物资、服务给邻近的少数民族，尤其是邻国的人民。这个方法，不仅可以化干戈为玉帛，而且对我国的政府与人民也有莫大的收获。所谓茶马交易，都是本于此种办法而扩大。后来，内地的城设大保长，都保设都保正、副保正。每保如有窝藏盗匪三人至三日以上，同保之人虽不知情，亦负连坐责任。每家如有壮丁二人，必须以一人作为保丁，每一大保，必须输派壮丁五人，搜捕盗匪。保丁接受训练，学习武艺，战时可以为兵。于是募兵式的国军，于死亡及逃走之时不补，逐渐被保丁替代，化为征兵制的国军。

附带于保甲者，是熙宁五年的保马法，由曾巩的

弟弟曾布制定保马法十五条。人民愿意替公家养马的,马由公家选陕西好种发给,或由公家给钱,人民自己选买。人民不愿代养者,不许勉强。凡是代养公家的马的,平时可以自用,但不许一次跑马或走马超过三百里;在保甲的壮丁操练之时,可以征用。国家对外有了战事,则把马交还,马死了,倘若因为人民养得不好,应该赔偿。

减兵,王安石于兵丁死亡或逃走之时一概不补,把兵员从英宗时代的一百一十六万二千人在熙宁年间减至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如此的成就,为千古所未有。

先以一府(开封府)集训保长保丁,其后推广到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又扩充到五个路的所谓“义勇”。几年之内,一共训练了七百一十八万二千零二十八人。

王安石对已有的上百万的雇佣兵并非完全不管。他为兵选将,令兵有常将,将有常兵。每一个将的兵,成为一个单位,好比清朝末年新军的镇,民国初年的师。不过,王安石时的将,兵员较少,京城周围地区分属三十七将,西北分属四十二将,东南分属九十三将。

与练兵置将有连带关系的,是武器的改良。宋朝政府并非缺乏武器,而是武器虽多,而品质不改良,不仅不改良,而且每况愈下。各路的官僚按期缴新制的武器给中央政府,中央的官僚按照单子点收,只看数目,不看好不好,不管能不能用。熙宁五年,王雱提出一个改良的意见,不再让官僚经手验收,要派专家当

全国的兵器总管，称为军器监。王雱的建议被神宗接收。其后，直至神宗去世，中央收藏了很好的武器，老百姓也贡献了许多新武器的发明。可惜在神宗去世以后，儿子哲宗年幼之时，高太皇太后当家，引用司马光等人，把新法一概取消，同时放逐了主持新法的人。新武器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关于农田水利，王安石叫人民有什么设施与发明，尽管说出来，凡是政府认为可行，都让人民自己做，或予以协助。于是各地的坡、塘、圩埠、堤、堰、沟渠、鱼池，都如雨后春笋，遍地可见。一共开筑了一万七百九十三处，改良了与增加了良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农民也报告了许多改良的种子与新的各种作物种植方法。

方田均税，是王安石自己发明的把税公平化的方法。他把农田分为若干单位，各为一千步见方，每一单位确定它的收获量的多少，以评估纳税的多少。全国各县都画了测量地图，标出地点、号码及纳税的标准。每一家田地的肥瘠与每一块方田每亩缴税多少，出布告让老百姓知道，地图有错误可以请官吏改正，改正以后，一律按图纳税。

漕运，由东南运粮到开封，过去被官员夫役吞灭至二十万斛左右，官员藉口水大了、水小了，等等。王安石亲自处理这个积弊，招商包运一部份，以与官船的运量相比，以决定官船每船该运多少。结果，官船也有了每一船的运量标准，不再有吞没的现象。

王安石在执政之时，武功方面的建树也不小：派

王韶在今日甘、青两省，收复失地两千方里，派章惇与熊本在湖南省与四川省，把若干少数民族豪酋割据之地取消，又派了郭逵到安南讨平了叛乱。

王安石最后一项的改革，便是熙宁八年颁行《三经新义》给学官。所谓三经，是（一）《周礼》佚失后的代用品《周官》，汉朝人以为是西周流下来的中央官制；（二）《诗经》；（三）《书经》。新义是新的注解，王安石所作的《周官新义》，他的儿子王雱所作的《诗经新义》与《书经新义》，颁到京城的太学与京西、京东、河东、河北、陕西五路的州府学校，都开设了课程。王安石希望用这三部书，宣传他个人新的政治思想，充实政治设施的内容，改变汉儒专重字句训诂的风气，了解了这三部书的原作者对改善人民生活的苦心。

他也在太学之中，增加律学与医学为专科课程。

王安石当“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前后辞职两次。第一次，在熙宁七年阴历六月获准；第二次在九年阴历十月。两次均是辞了好几次才准。为什么辞了好几次呢？实在是身体吃不消，他日理万机，和神宗皇帝一样；但是神宗只管批准一件事或不批准，王安石却要在发动或批准之后考虑如何派人，如何实施，如何于实施之后一步步考察、纠正、补救，等等。对于各种内政、外交、财经、军政、保甲、练勇、减兵、养马、改进兵器、方田均税、农田水利、青苗贷款、免除差役，等等，都是如此。真是够烦，够费精神，而且大都又免不了有反对的人，要去辩论，要去生气，确实是累出了大病。

王安石于第二次辞去宰相以后,得以逍遥于南京湖山之间,而他的新法有神宗皇帝坚持于上,有他所推荐的继任宰相韩绛及陈升之等人维持于下,仍旧继续着,直至神宗皇帝逝世于元丰八年三月之时(1078)。

从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以参知政事的身分创制“三司条例司”开始,经过熙宁二年至十年,与元丰元年至八年,新法一共行了十九个年头,有了足够的时间成熟。人民得到政府的青苗贷款而摆脱了大户的高利贷的剥削,又免于差役的暴政,也有了保甲制度铲除盗贼,有了方田均税,又有了无数的新的农田水利,充实建设。

人们熙熙攘攘,觉得活下去很有意思。他们忙,忙得开心。王安石看见了升平气象,也感到自己的辛苦,不曾白费。他写出很多诗,优美的诗。其中有几首是描写元丰年间,人民的快乐。其中,《后元丰行》一首,是:

歌元丰,十日五日一雨风。
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麦。
水秧绵绵复多余,龙骨长干挂梁耜。
鲋鱼出网蔽州渚,荻笋肥甘胜牛乳。
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常闻鼓。
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
老翁塹水西南流,杨柳中间杙小舟。
乘兴欹眠过白下,逢人欢笑得无愁。

元丰八年三月,神宗三十八岁去世,儿子哲宗即

位,年纪才有九岁,祖母太皇太后高氏为“权同处分军国事”,在实际上当了女皇帝,好比清朝的慈禧太后。

五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圭去世,蔡确、韩绛、司马光作宰相,三人的名称是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门下侍郎、章惇知枢密院。

司马光大权独揽,立即由七月至十二月废掉保甲法、方田法、市易法与保马法。

次年,元祐元年,由闰二月至八月,又废掉青苗法、免役法、熙河路的经制财用司,贬谪蔡确、章惇、邓绾、李定、吕惠卿。九月,司马光死。他这个人史学很好,在《资治通鉴》中,于认为可信之史料之外,列出其他的异说,称为“考异”。但他讨论到当代的实际政治,却坚持己见,不容许有别人的意见。例如他认为宋朝应以祖宗之法为法,却说不出祖宗之法是否尽善尽美,是不是沿袭五代残唐而来,也完全忽略了宋朝仁宗时有兵一百二十五万多,而甘心向小小的辽与更小的夏,每年进贡。他又沿袭各种恶法陋规,例如强迫人民服“衙前”等劳役,坐视豪强大户用三分或以上的利息行高利贷,反而咬定青苗贷款之利息为四分,又说所有的人们都被强迫借青苗钱(所谓抑配)。

等到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司马光重新到中央政府以门下侍郎的官衔当了实际上的宰相,把王安石的新法于一年左右的时间,取消得干干净净。王安石于元祐元年四月逝世,目睹新法被摧残而无可奈何。所有执行新法的大小官吏,都被罢

免、流放。

司马光的同党竟然在宫里庙堂写榜,列出王安石以下四十人,给了这四十人以恶名。(这件事,记载于《玉照新志》,转载于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到了绍圣元年以后,新法人物再行执政,也列了元祐党人榜,作为报复。

苏轼本来也是激烈反对新法的人,于王安石实行新法以后,成效卓著,十分佩服,向朋友滕达道等人说,“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致有同异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亦觉疏矣。”

后来,王安石退休在南京,苏轼特地去拜访他。有一次,和了他四首诗。《次荆公韵四绝》,其中第三首是: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1997年5月4日完稿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是蒙古帝国的第一任中书令。

传说，在耶律楚材生下之时，父亲移剌履曾经替他算命，算出他将来“当为异国用”，因此而选了楚材二字作为他的名字，这名字的含义是“楚材晋用”。这传说不载于《元史》，而载于《新元史》及《蒙兀儿史记》。移剌履是否真能算得出耶律楚材会在若干年之后为蒙古所用，这是很难证明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楚材晋用也未尝不可以解释为“辽材金用”。移剌履本人便是一个辽材金用的人。

耶律楚材自幼受到母亲杨氏的良好教育。这一位杨氏，可能是汉人。楚材书读得很多，除了经史以外，也颇懂天文历法与卜算之道。除此以外，他诗也很会写，留下了一部《湛然居士文集》。就这部《湛然居士文集》（其实是“诗集”）来看，耶律楚材对于佛学

书籍，确也涉猎了不少。

他在金昌宗、卫绍王、金宣宗的朝中做官，官至“行尚书省左右司员外郎”。成吉思可汗的兵打下中都，他的年纪是三十或三十岁出头。（根据万松老人给《淇然居士文集》所写的序）。成吉思可汗访求辽朝的宗室，找到了他，从此便把他放在身边，西征花刺子模的时候也带他去。成吉思可汗给了他什么官，《元史》、《新元史》与《蒙兀儿史记》都不曾说。他的主要任务，似乎便是卜卦。“汗每出师，必命楚材预卜吉凶。汗亦自灼羊髀骨，用相参验。”

他在花刺子模的河中府（撒马儿干？）陪成吉思可汗住了很久，留下了“西域河中十咏”，每首均以“寂寞河中府”五个字作第一句。同时，他写了“西域和王君玉诗”二十首，其中颇露怀才不遇的情绪。例如：第一首，“归去不从陶令请，知音未遇孟尝贤。”第五首，“西伯已亡谁老老，卜商何在肯贤贤？”然而，他在河中却也未尝不自得其乐。河中十咏的第二咏，说：“寂寞河中府，临流结草庐。开樽倾美酒，掷网得影鱼。有客同联句，无人独看书。天涯获此乐，终老又何如？”

传说，成吉思可汗虽则对耶律楚材不予重用，对他的能力却看得很清楚。《元史》与《新元史》，都说成吉思可汗曾经向斡歌歹（窝阔台）交代过：“这个人是老天爷赐给我们家的，你以后凡是军国的大事都不妨交给他管。”屠寄在《蒙兀儿史记》中没有抄这一节，这是屠寄的“史识”超过宋濂与柯绍忞之处。事实可能是：成吉思可汗对耶律楚材，不过是看成算命打卦的

半仙之流；真正对耶律楚材的能力有认识的，是斡歌歹本人。

在斡歌歹当选的一天，耶律楚材一则劝主持大会的拖雷不可改期，二则劝察阿歹（察合台）以哥哥的身份首先向斡歌歹下拜，使得所有的贵族都不敢不下拜，包括斡歌歹的叔父帖木格在内。耶律楚材替斡歌歹出了如此的大力，难怪其后斡歌歹对他几乎凡事无不听从。

耶律楚材于斡歌歹可汗即位以后，建议了十八件事，包括设地方文官以与万户们军民分治、下级官吏非奉上级批准不许增加人民负担、死罪必须于申报获准后方能执行、蒙古人及回回人种田而不纳税的处死刑，挪动公家财务供私人经商的酌量治罪、监守自盗者处死刑、任何人不许对可汗贡献礼物，等等。

除了贡献礼物的一项以外，斡歌歹可汗对耶律楚材所建议的完全接受，下诏颁行。

那时候，有一些蒙古人，如近侍别迭之流，主张将汉人杀光，将中原的田地一概改为牧场，以便蒙古游牧。耶律楚材向斡歌歹可汗说，“汉人留下不杀，对蒙古帝国的政府有利无害，可以让他们工作，然后抽他们的税，约略计算起来，每年（黄河以北）可以抽到五十万两银子，八万匹绢，四十万石粟。这比杀了汉人而一无所得，岂不是好得多？况且，可汗已想渡河灭金，正需要庞大的资源作为战费。”

耶律楚材这几句话，救了河北、山东、山西千百万人的性命。

斡歌歹可汗于是授权给耶律楚材,叫他设计抽税的事。他就保荐了陈时可等二十个人,分任十路“征收课税使”与副使。这十路,是:①燕京,②宣德,③西京,④太原,⑤平阳,⑥真定,⑦东平,⑧北京,⑨平州,⑩济南。十路征收课税使与副使,直属于可汗,与各地管民政的文官,管军政的万户,鼎立而三,各不相干。

十个月以后,辛卯年(1231)八月,斡歌歹可汗到了西京(大同),十路所收到的银子、绢与粟,都陈列在行宫的院子里,可汗很高兴,当天就任命了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叫他全权筹设中书省。

中书省在金朝没有,在唐朝只是专管颁发诏令文书的机构而并无行政权。在金朝与唐朝,管行政的是尚书省。从斡歌歹可汗在辛卯年八月任命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的这一天开始,蒙古帝国开始有了中央的行政机构,而称之为中书省。(各地的沿袭自金的“行尚书省”,一时都不曾改为“行中书省”。)

中书省于中书令之下设右丞相与左丞相各一人。耶律楚材保荐了镇海为右丞相,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俗称为“田镇海”,很像是汉人,而其实是客列亦惕族人。他曾经奉命在和林一带屯田,成绩颇好,因此而获得了一个“田”字作为绰号。他是景教徒,精通畏吾儿文,蒙古帝国的所有对西方各地的公文,概由他主持审核颁行,正如对中原各地的公文统由耶律楚材负责一样。虽则是中文的公文,也一概由镇海用畏吾儿文加写“付与某人”,作为一种证验。至于左丞相

粘合重山，却是金朝的宗室，曾经在成吉思可汗面前当质子，而私自向可汗投降，愿对可汗效忠，其后倒也始终一贯，对蒙古效忠到底。他对金朝的山川人物，十分熟悉，颇能襄助耶律楚材做“建官立法，任贤使能，分州县，定课赋，通漕运”的工作。

中书省的机构，到了元世祖忽必烈之时才算完备。耶律楚材有没有设平章政事、右丞、左丞与参知政事，待考。可能设了其中的若干位，而并未全设。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耶律楚材是契丹人，镇海是客列亦惕人，粘合重山是女真人。他们三人没一个是蒙古人。

耶律楚材当中书令，从斡歌歹可汗在位的第三年（辛卯，1231）八月开始，到乃马真（乃蛮氏）太后摄政的第二年（癸卯，1243）三月、病死之时为止，前后有十一年又七个月，差不多全部时间住在和林。

他在和林盖了一座房子，格式与他以前在中都（北平）西山的一座相同。他写了一首诗“题新居壁”：“旧隐西山五亩宫，和林新院典刑（型）同，此斋唤醒当年梦，白画谁知是梦中。”又有一首诗“喜和林新居落成”：“登车凭轼我怡颜，饱看和林一带山。新构幽斋堪偃息，不闲闲处得闲闲。”

他身在廊庙，心系山林，功名之心极淡，利禄之心绝无。在十一年又七个月的任内，他把蒙古帝国的中央机构从头建置，也把地方上的军、民、财三方面的行政尽力调协。他所登用的人极多，权力之大可以想见，事实上也是应该的。可汗之下，主持国政的便是

他。右左丞相均可算是他的属僚。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成吉思可汗所任命的最高断事官失吉刊·忽秃忽，此时尚未去世。此人的职权与耶律楚材的职权是否有冲突之处？答案是：并无冲突。斡歌歹可汗给了失吉刊·忽秃忽以新的任务，“中州断事官”。既然是“中州”的，可见已不是“最高”的了。最高的断事官，从辛卯年八月开始，已经是耶律楚材，只是名义上不再叫做最高断事官，而改称为“中书令”了。

嫉妒耶律楚材，与怨恨耶律楚材的人，自然不会没有。做大官，有权在手，可以满足一些人的欲望与要求，同时也必然不能满足另一些人的欲望与要求，甚至在满足了张三的第一项要求与第二项要求等等以后，总有一天满足不了张三的第五项或第六项要求。古今若干聪明人之不敢做大官，原因在此。耶律楚材是好人，而不是绝顶的聪明人，胆敢以非蒙古人的身份，作蒙古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书令，真配得上称为拿性命拼。

第一个要他性命的人，是石抹明安的儿子石抹咸得不。此人仗着父亲曾为“太保”，自己又袭了燕京留守之职，“恣为贪暴”，而且“其下化之”（所用的人也是死要钱，乱杀人），弄得燕京城里盗贼横行，有许多“势家子弟”也公然在黄昏时候，走到有钱的老百姓家里勒索。耶律楚材曾经于充任中书令以前，奉了成吉思可汗之命，偕同塔察儿去查办，一举而捕斩十六人，使得燕京的人心恢复安定。那身为燕京留守的石抹咸得不，自知丢了脸，便恨死了耶律楚材。于是，在楚材

做了中书令以后，便唆动皇叔帖木格，派使者向斡歌歹可汗进谗，说楚材任用私人，“必有二心”。这一状，斡歌歹查了以后，知道是诬告，把帖木格的使者骂了一顿。

最后一个要耶律楚材性命的，是不知姓名的某中贵。这位中贵是通事官杨惟中的一党。中贵向斡歌歹告一状，说耶律楚材“违制”。（违的是什么制，《元史》、《新元史》、《蒙兀儿史记》都不曾交代。以常例论，这里所谓“违制”，可能是指“僭越”，用了天子才能用的东西，或盖了天子才能住的房子。）一向对耶律楚材深信不疑的斡歌歹，这一次竟然耳软，下旨把耶律楚材捆起。不久，斡歌歹后悔，叫人解了耶律楚材的绑。耶律楚材拒绝，说，“既然绑我，一定是有罪。我忝为公辅，犯了什么罪，陛下应该明白宣布，让百官知道。现在又要解我的绑，那是以为我无罪了。怎么忽而以为我有罪，忽而又以为我无罪呢？这不是儿戏么？国家的大事，怎么办得了呢？”斡歌歹向他说，“我虽然是可汗，怎么不会有错呢？”于是，君臣又和好如初。

耶律楚材的贡献，除了创设了全国税收机关与中央的中书省以外，还有很多，多到不胜枚举。其中最重要的，是：

① 速别额台在汴梁即将攻下之时，向斡歌歹报告，准备屠城。屠城本是蒙古军队对付抗命者的老办法。耶律楚材说，“得地无民，将焉用之？”斡歌歹因此而下令汴梁免屠，只杀金朝皇室完颜氏一族。于是，

有一百四十七万住在汴梁的人，因耶律楚材的一句话，而保全了性命。

② 此后，有许多抗命的城市，都由于有了汴梁的先例，而免于屠城的劫运。

③ 蒙古有一条禁令，凡是收容或资助在逃的俘虏的，或给予他们以饮食的，一概处死。并且，“无问城郭保社，一家犯禁，余皆连坐。”结果，“逃民无所食宿，殍死道路相望。”这一条禁令，耶律楚材向斡歌歹请求废除，获准。

④ 蒙古另有一条规矩：凡是被强盗抢去的东西，如果过了一年尚未破案，便由本地（本路，本府）的老百姓共同赔偿。这一条规矩，耶律楚材也向斡歌歹请求废除，获准。

⑤ 在蒙古帝国的领域以内，有花刺子模等国来的回回，经由各地官吏之手放高利贷，年利百分之百，过了一年便是一倍，过了两年便是四倍（复利）。还不起的人每每以妻子儿女作抵，仍旧不曾还清。耶律楚材于奏请获准之后，把所有的已欠本利，由政府代为偿还，用去了官银七万六千锭（一百一十四万两）。耶律楚材规定：从此以后，凡是付利付到了相当于本金的数额之时，一概停利付本。

⑥ 当时，除了政府自办的驿马以外，诸王与贵戚都可以自备驿马，用政府的驿馆为驿馆。这些诸王贵戚的驿夫与使臣，每每抢夺人民的马，而且在政府的驿馆中“要索百端。供馈稍缓，辄被箠撻。”耶律楚材定下规矩，诸王贵戚的驿夫与使臣，由政府发给牌札，

然后由驿馆依照规定的份量供应饮食。没有牌札的，概不招待。

⑦ 有一位姓于名元的，向斡歌歹建议发行“交钞”（纸币）。耶律楚材说，“当初金章宗开始发行交钞，与铜钱并用，后来经管的人觉得很方便，便尽量地发出，而不热心于收钞回笼，弄到后来一万贯交钞才买得到一块饼。”斡歌歹说，已经准了于元的奏，耶律楚材请求：如果一定要发行交钞，不可以超过一万锭（五十万两）的数目。

⑧ 蒙古军取得中原北部以后，查户口查得了一百零四万户。其后，积年逃离家乡的户口有十分之三四，但是蒙古政府所抽的赋税并未照减，仍旧按照原来的一百零四万户的赋税总数，向留在家乡的十分之六七的民户征收。于是，每一家平均要缴出比以前差不多多出一半以上的赋税。耶律楚材毅然决然，把三十五万逃户的赋税从赋税的总额之中减去，使得人民受惠不浅。

⑨ 斡歌歹把中原若干的州县与人民，分赏了功臣与皇亲国戚，让这些人可以自由抽取所封人民的赋税。耶律楚材认为这是“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主张土地与人民虽则在名义上是已经分封了，仍旧由政府派员代为收税，收好了转交给这些功臣与皇亲国戚。收税的标准是：每五户合缴丝一斤，叫做“五户丝”，给受封的功臣与皇亲国戚。另外，规定了每二户出丝一斤，作为国税，缴给政府。地税商税与盐税均全数作为国税。地税是麦田每亩上田三升，中田二升半，下

田二升,稻田每亩一概五升。商税按照三十取一的税则征收。盐税也是如此,不过盐价是每四十斤抽取银子一两。

⑩ 当时扑买(投标包税)的制度很盛行,有一个刘廷玉,花了五万两扑买到燕京的酒税;有一个“涉猎发丁”花了二十五万两扑买到全国的国有“廊房地基水利猪鸡”;有一个“刘忽笃马”,花了五十万两扑买到全国内地的“差发”(义务劳动?);有一个姓名不详的西域人,花了一百万两扑买到全国的盐税。耶律楚材说,这些人都是坏人,“捐一偿十”(出一两银子给政府,向老百姓收十两银子)。“使怒归于上,利归于下。”他向斡歌歹可汗请求,把这些包税的事都取消,获准。

然而,小的包税被取消了,最后却来了一位大的包税人,奥都剌合蛮。此人经由通事安天合的推荐,获得右丞相田镇海的信任,辗转取得斡歌歹的同意,以四万四千锭(二百二十万两)的代价,扑买到全国的户钞。耶律楚材认为这是增加人民的负担太多,不仅在原则上包税的制度是一种陋政而已。以前,在庚寅年(1230)他向斡歌歹建议用抽税代替屠杀作为对付汉人的政策之时,所定的税额不过是一万锭(五十万两)而已。其后,打下河南,灭掉金朝,也不过增加到二万二千锭(一百一十万两)而已。于是,他向斡歌歹力争,争到声色俱厉。斡歌歹说,“你是不是想动手打架?”结果,他的意见不被斡歌歹接受。

斡歌歹死后,乃马真(乃蛮氏)皇后摄政,对奥都

刺合蛮十分宠信,甚至拿空白的盖好了印的敕书若干张交给此人,叫中书省的令史照此人的吩咐加以填写,如果不填写,便砍手。耶律楚材向皇后说,“先可汗把军国的事,都交给了我老臣管。令史有什么相干?要砍,可以砍我的头。何况是手?”说到此处,他放大喉咙,厉声喊叫:“老臣事成吉思可汗及先可汗三十年,无负于国。可敦(皇后),我没有罪,您也不能杀我!”

可敦对耶律楚材,怎么敢杀?可惜,耶律楚材这一次气成了病,不久便死,死在甲辰年(1244)五月十四,年纪才有五十五岁。耶律楚材之死,是蒙古帝国的大损失,也是汉人的大不幸。

张 居 正

张居正是江陵人，生于嘉靖四年，卒于万历十年。他在十二岁时“进学”（当了秀才），十六岁中举（当了举人），二十三岁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翰林），受教于徐阶。（那时候，徐阶是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教习庶吉士”。）两年以后，散馆学业结束，张居正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

他当了编修七年，感觉到“京师十里之外，大盗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非得磊落奇伟之人，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然而“世虽有此，人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因此之故，他毅然决然，称病辞职，回到家乡，种了半亩竹子，闭户读书。

读书又读了整整六年。他的父亲（张文明）“忽忽不乐，日见憔悴”；父亲向朋友说，“吾生平志愿未遂，

望斯儿树立，用显吾祖。今顾若此，吾复何望！”

张居正只得又进京城，做官。这一次所做的，是右春坊右中允、国子监司业。高拱和他同事，是国子监祭酒。祭酒等于今日国立大学校长，司业等于是教务长。

高拱于嘉靖四十五年三月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十二月，世宗去世，徐阶写遗诏，邀张居正参加意见。次年，隆庆元年，二月间，张居正也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

半年以后，他上给穆宗一封“陈六事疏”，穆宗一一允行。

所谓六事，是：○省议论。部院等衙门“一切章奏，务从简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陈。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③振纪纲。“伏望皇上奋乾纲之断，普离熙之明，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号令，必断于宸衷，而毋致纷更于浮议。”④重诏令。“伏望敕下部院等衙门，凡大小事务既奉明旨，须数日之内即行题复。其有合行议勘问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缓急，道里远近，严令限期，责令上紧奏报。该部(院)置立号簿，登记注销。如有违限不行奏报者，从实查参，坐以违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为贤否。”⑤覈名实。“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满，毋得概引复职，滥给恩典。须明白开具‘称职’，‘平常’，‘不称职’，以为殿最。若其功过未大显著，未可遽行黜陟者，乞将诰敕勋阶等项酌量裁与，稍加差等，以示激励。”⑥固邦

本。“伏望皇上轸念民穷，加惠邦本，于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敦尚俭素，以为天下先。仍乞敕下吏部慎选良吏，牧养小民。”⑤饬武备。“今京城内外守备单弱，臣常以为忧。伏乞敕下戎政大臣，申严军政，设法训练。每岁或间岁季冬农隙之时，恭请圣驾亲临校阅：有技艺精熟者，分别赏赉。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

张居正在隆庆元年二月入阁，两个月以后就升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次年正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四年十二月，升“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国柱”；几天以后，加“少傅”，改“建极殿大学士”。六年正月，改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六月，穆宗去世；八月，加“左柱国”，改“中极殿大学士”。

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高拱于隆庆六年六月被罢免。他被罢免以后，张居正成为“首辅”，从此当首辅，一直当到万历十年六月病故之时。在这十个年头之中，他只有三个月（万历六年三月至六月）给假回籍葬父，不在京城，但是重要的公事仍旧有人送到江陵，请他裁决。他的加官，由少师而改为太傅，又由太傅而改为太师，均仍兼太子太师，可谓位极人臣。他不曾被封为侯伯，因为明朝的规矩不封文臣（除了外戚以外），但是他在万历四年十月被改为太傅之时，已经奉旨特许“俸如伯爵”。

他生平颇爱权力，而且定要全部权力。神宗从十岁即位，到二十一岁张居正死，始终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皇帝而已，一切听命于两宫太后，神宗的嫡母仁圣

太后陈氏与生母慈圣太后李氏。这两位太后由于有司礼太监冯保替张居正左右其间,也一直对张居正言听计从。

以施政的成绩而论,张居正不仅是明朝的唯一大政治家,也是汉朝以来所少有的。诸葛亮和王安石二人,勉强可以与他相比。诸葛亮的处境比他苦,不曾有机会施展其经纶于全中国。王安石富于理想,而拙于实行,有本事获得宋神宗的信任,而没有才干综覈僚佐与地方官的名实。

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对张居正的作风颇有批评,却不能不承认,在张居正执政期间“十年来海内肃清。用李成梁戚继光,委以北边,攘地千里,荒外警服。南蛮累世负固者,次第遣将削平之。力筹富国,太仓粟可支十年。罔寺(太仆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覈名实,清邮传,核地亩,一时治绩炳然。”

明朝自从成祖宣宗以后,朝野泄沓成风,政以贿成,民不聊生,张居正能以超人的铁腕,把政风士习扭转,做到令出必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边境相当太平,国内家给户足,转贫为富,化弱为强,真叫我们心向往之。

他忠君守法,敢于负责,因此也就免不了得罪很多人。中国的社会,几千年来重人情而不重法律,重私谊而不重公义。于是,张居正一死,他的家属就遭受奇祸。

张居正的治绩,在明史本传中仅有寥寥数语,在

明史稿中更少，而且贬多于褒。写明史与明史稿的人，囿于书生之见，视儒法为截然不同的二家，他们看不出张居正的难能可贵处，正如有些人之讥诸葛亮为“外儒内法”，讥王安石为“急功近利”，而茫然于孔子当年不谈政治则已，一谈政治即强调“足食足兵”与“富而后教”。孔子诚然以“道之以礼，齐之以乐”为提高社会水准的途径，但是也从来不曾主张过以姑息为政，像汉元帝以后的所谓儒臣。

张居正大权独揽，是事实。他却未包而不办。国家的大小政务，他处理得井井有条，纲举目张。他也颇能分权给主持各部的尚书，御寇平乱的将领，通漕治河的文臣。凡是负责办事的人，他都能让他们放手干，虽谤书盈策而他决不轻易换人。

在他执政的期间，六部尚书的更迭很少：

吏部——张瀚、方逢时、王国光。

户部——王国光、殷正茂、张学颜。

礼部——万士和、马自强、潘晟。

兵部——谭纶、王崇古、方逢时。

刑部——王之诰、王崇古、刘应节、吴百朋、严清。

工部——宋衡、郭朝宾、李幼滋、曾省吾。

在这些尚书之中，只有张瀚一人是被免职的。其余，或是因年老而退休，或是死在任上，或是转任他职。

张居正对于御寇平乱的将领，也尽量让他们久于其任，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是其中最著名的三位。

戚继光于张居正执政以后,在隆庆二年五月从福建被调到今日的河北省,先后担任苏州、保定、昌平,三个镇的练兵总理,与兼任蓟镇总兵官,到了张居正在万历十年六月去世,才又被朝廷调去广东。倘若不是有张居正给戚继光支持,戚怎么样也在蓟州干不了那么久,因此也就练不成守边的精兵,修不好沿边的“敌台”(堡垒),发展不了“车战”的战术,挡不住北元的可汗土蛮,保不了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一大段长城内外的领土。

李成梁于张居正执政以后,在隆庆元年由辽东镇的参将被升为副总兵。其后他屡败土蛮的部下与同盟者速把亥、炒花、黑石炭、黄台吉、卜言台周、以儿邓、爰免、拱免、堵刺儿、大委正、小委正、卜儿亥、恍忽太、……等等,也消灭了建州卫的都指挥(满洲人)王杲,击溃了“遼东都督”王兀堂,被张居正一保再保,连升为铁岭卫都督僉事,辽东总兵官,加官由“太子太保”到“太保”,受封为“宁远伯”。

万历十年三月,在张居正去世以前的三个月,速把亥进犯义州,被李成梁的参将李平胡射中而被苍头李有名斩首。神宗大喜,让李成梁在京师有一个“甲第”,加赏一个儿子锦衣卫指挥使。

张居正去世以后,李成梁继续镇守辽东,到了万历十九年十一月,因贪利、行贿,掩败为功、滥杀人民等等恶行,被谏官一再弹劾而不得不辞职。倘若张居正尚在,他决不敢如此,自己固可以保全始终,国家也不致遭受他卵翼努尔哈齐的养痍之患。他作战的能

力很高,威望亦重,其后在万历二十九年东山再起,“复镇八年,辽左少事”;所需要的只是在他上边必须有一个能够驾驭他,维持他,像张居正这样的人而已。

张居正时代的明朝北方边时,东段(今日辽宁境内)有李成梁负责,中段有戚继光负责,西段的负责人是王崇古。

张居正于隆庆四年任命王崇古为“宣大山西总督”(总督宣化、大同与山西的军务)。王崇古对当地蒙古人的领袖俺答与吉能,推诚相与,一面在防务上绝不懈怠,一面奏请朝廷让汉人与蒙古人互市,封俺答为顺义王,封吉能为世袭的都督同知。张居正于王崇古完成了安抚工作以后,调他入京,督理在京城及其外围的军营。不久,又先后任命他为刑部尚书与兵部尚书。

在张居正当国的期间,内乱不是没有,但张居正皆能选用将才,予以平定。

内乱之中,最厉害的三次,是四川的都掌蛮,广西的古田僮,与广东的罗旁僮。都掌蛮的首领叫“阿大”,据有兴文县东南的九丝山,称王。另一头目,叫做“阿苟”,据有凌霄峰,和阿大相犄角。张居正派曾养吾当巡抚,叫刘显留任总兵官。那时候(万历元年),有好多朝臣攻击刘显,张居正一概不听。果然,刘显感恩图报,很愿意接受曾养吾的节制,而曾养吾又是一位驾驭武人的能手。刘显等人诱擒了阿苟,夺回凌霄峰,随即围攻九丝山,攀登绝壁,打平六十多寨子,斩杀三十六个头目,包括阿大,取得土地四百余

里，卤获了九十二只铜鼓。

古田僮的首领，叫做韦银豹。他的父亲韦朝威在孝宗弘治年间造反，杀了副总兵马俊，其后降而又叛，叛而又降。韦银豹本人之叛，是在世宗嘉靖末年。他和另一头目黄朝猛两度抢劫广西省城的银库，杀了参将黎民衷，声势浩大。

张居正在隆庆三年叫殷正茂当广西巡抚，负责剿办。殷正茂到任以后，便调集了土兵汉兵十四万人，交给俞大猷。俞大猷那时候是广东总兵官，被调来广西帮忙。以俞大猷之才，对付韦银豹与黄朝猛，游刃有余。他分兵七道，连破几十个寨子，只有最后的一个潮水寨比较费力，打了几十天才打了下来。黄朝猛被自己的部下杀了，韦银豹诡计多端，用了一个与自己面貌相同的人替死，但是，在逃走不久以后，也被捉住。

不久，殷正茂被升为“提督两广军务”。于是，惠州的蓝一清与赖元爵，潮州的林道乾、林凤、诸良宝，琼州的李茂等等盗匪，也都被殷正茂一一荡平。

万历三年，殷正茂受任为南京兵部尚书，遗下的“提督两广军务”之缺，由凌云翼接任。凌云翼在万历四年秋天调遣张元勋、李锡等将领，大举进攻广东罗旁僮，打了四个月，打到万历五年的春天，一共打下了五百六十个寨子，有四万二千八百多僮人不是被斩，便是被俘，或自动投降。僮人首领潘积善，也投降了，罗旁僮所住的地区，在德庆州上下江，东西两山之间，有七百多里幅员。韩雍在宪宗成化年间已经把西山

的一部份镇压下去,剩下的是这些东山的部落。他们深处林莽,常常出来抢劫,兵来则退,兵去又来,一向是两广的心腹之患。

张居正能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曾养吾、殷正茂、凌云翼等等,确有知人之明。

外患与内患之外,另一种的患是水患。

明朝初年,黄河在洪武二十四年决口。决口的地点在河南原武县境。洪流泛滥到安山湖,把会通河淤塞了三分之一。所谓会通河,便是元朝所修筑的山东省一段的运河。明成祖有意迁都北京(北平),对运河十分重视,派了宋礼去浚。宋礼用了二百天的工夫,达成任务。

此后,河患虽则常有,皆不甚大。到了嘉靖年间,它便严重起来。嘉靖六年,黄河溢出堤外,流入沛县之北的庙道口,淤了运河几十里长。明世宗派盛应期去办,盛应期开了一条新河,从昭阳湖东北到留城口,约长一百四十余里,用六万五千个夫子,二十万两银子,做了六个月,未能如限完工。谏官认为这是劳民伤财,世宗便命令盛应期停止工作。盛应期要求再做一个月,世宗不许,于是功败垂成。

嘉靖四十四年,黄河又发脾气,在沛县飞云桥决口,流进了昭阳湖,又把运河淤了一百多里。世宗派朱衡去办理。朱衡也开一条新河,长一百九十四里,总算是筑成了。然而,这只是治标而已。

隆庆四年,黄河在邳州与睢宁决了口。张居正派潘季驯去治。潘季驯把所决的口子堵住。

万历五年,黄河在崔镇决口,向北流,淤塞了清河口,逼得整个的淮河向南搬家,冲坏了高堰(高家坝),弄得高邮、宝应等县成为一片汪洋。负责治河的“河漕尚书”吴桂芳与“总河都御史”傅希摯意见不合,吴主张疏浚老黄河故道,傅主张堵住决口,“束水归漕”。迁延到了次年的夏天,张居正再派潘季驯去负专责。潘季驯在过去也只是一个懂得治标的人,但是他有了经验,又肯实地研究,把他的心得报告张居正作为建议,说黄河“故道久湮,虽浚复,其深度必不能如今河”,应该“筑崔镇以塞决口,筑遥堤以防溃决。又淮清河浊,淮弱河强。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则居其八,非极湍急,必至停滞。当藉淮之清,以刷河之浊,筑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敌河之强,使二水并流(为一),则海口自浚。”张居正接受他的建议,让他放手去做。果然,做到了万历七年冬天,潘季驯把黄河与淮河同时治好。

在潘季驯尚未完工以前,也有不少的人攻击他,正如当年戚继光等人之被攻击一样。但是,张居正给予潘季驯以大力支持,对一切闲言闲语置之不理。

治水成功,水患变成水利。张居正特地把水退了以后的荒地,按户分给江北各县灾民,三年以后才征赋。明朝自从中叶以来,政府不做该做的事,而收不该收的钱。农民在种种高压之下,也就无精打采,把该垦的地不去垦,该种的田不去种了。再加上,土豪劣绅与贪官污吏相勾结,有田而不报,即使报也以多报少。在洪武二十六年年的时候,全国已垦已种的田

地,有八百五十万零七千六百三十二顷。到了弘治十五年,就只剩下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经过张居正一番整顿与鼓励,万历九年的数字竟然一跃而为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起洪武年间的情形,虽仍有不及,但是比起弘治年间的情形,真是进步得太多。

万历九年的数字,是经过三个年头的严格丈量而来。有人怀疑这数字的确实性,说张居正“尚综核,颇以溢额为功。有司争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见田(苛征暴敛现有的田)以充虚额,北直隶湖广大同宣府,遂先后按溢额田增赋”。说这种话的人,不知是何居心?依他们的意思,最好田地不必丈量,办事不必综核,因为一丈量综核就难免没有少数的坏官“争改小弓以求田多”,倒不如因噎废食,大家省事,大家静候亡国,饿死!至于说,因为有了“溢额”就免不了“遂先后按溢额田增赋”,似乎田亩尽管溢额,而所溢出的田亩绝对不可以征赋。这是一种什么想法?

明史食货志却也保存了几句公道话:“帝用大学士张居正议,天下田亩通行丈量,限三载竣事;用开方法,以径围乘除,畸零截补。于是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

明朝初年,各府州县本有记载田地的“鱼鳞册”,与记载户口的“黄册”。这两种册子,由于中叶以后上下官吏的偷懒与舞弊,久已与事实不符。张居正大刀阔斧,不怕得罪人,才把事实重新弄个清楚。(他有没有采用当时福建所已用的经册、纬册与“归户册”,待

考。)

田亩的数字,或可用大田化小的办法变多;户的数字,却没有办法化一人为两人来变多。洪武二十六年的户口,是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人。弘治四年,降为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人。张居正在万历六年所查出来的,是六千零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人,不仅比弘治四年多,也比洪武二十六年稍稍多了一些。这倒未必是因为有他当政,而人民立刻乐观,于短期内纷纷增加生育(或减少杀婴与打胎)。主要的原因,是:在他综核之下,经手调查的人不敢马虎从事。

张居正生平自称别无他长,只是耐得了烦。耐烦二字真能做到,并不容易。古今乐于做官的多,而舍得下工夫去办事的少,张居正倘若没有忠君(爱国)的心,没有视匹夫匹妇之疾苦为自己的疾苦之同情心,没有恒心与毅力,就一定耐不了总揽全国行政工作的烦。

儒家的理想宰相,是一个雍容大度,提纲挈领,对天子坐而论道,调理阴阳的人。下面各部门的麻烦的事,让下面的人去管。这样的宰相只适合于天下已定的太平时代。乱世或衰世,像明朝正德以后,迄于嘉靖年间的情形,就必须有张居正那样的一个火辣辣的角色,事必躬亲,才能拨乱反治。

他注重行政的系统,可见他不是不懂得分层负责的道理。他所不同于以前的若干大学士的,只在把“负责”二字做到名副其实。他自己负责,也要求下面

的人负责。他不许六部的尚书分他的大权，也老实不客气，让他们知道：在他们之上有一个内阁，而内阁的负责人是他自己。王夫之说得对，明朝政治的最大缺陷，是太祖在洪武十三年废掉丞相。太祖与成祖二人雄才大略，直接指挥六部，确有“皇帝而兼宰相”的资格。仁宣二宗，能力虽差，幸有三杨在内阁，仍旧办到了小康。此后皇帝不如太祖成祖，阁臣不如三杨，国事安得不坏！张居正断然确定内阁的地位，把太祖废相的失着补救了过来。可惜，他一去世，人亡政息，明朝又走向下坡的老路。

他并未把六部的权力剥夺净尽。事实上，他给了它们以应有的充分权力：命令各省的抚按（巡抚与巡按御史），必须秉承六部。对于抚按，他也让他们有权督责各府州县。这样，全国上下各级衙门，才形成了一个整体。他自己之所以能够在极短期间，完成极大改革，指挥灵活，运用自如，也全靠有了这个分层负责的整体。

在内阁及其以次一层一层的中央与地方各级衙门之间，公文的来往必须迅速。因此，他特别注重驿递（谷应泰所谓“邮传”），一举而去掉驿站方面的小腐败。公事经办人的故意拖延、诬报、虚报、瞒报、夸大其辞的妄报等等，他都有办法查出来，弄得没有人敢欺骗他，蒙蔽他。

张居正办事严格，但对人并不苛刻。人有小过，他写一封私函加以规劝或申斥。有了大过，他才依法办理。他把赏罚看得很重要。没有赏罚，的确也办不

了事。然而他一向是赏得重，罚得薄。

不讲道理的人，也未尝没有他们的所谓赏罚。张居正的赏罚，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一秉至公。他尊重明朝已有的考绩制度，而加以认真执行。京内之官六年一考，京外之官三年一考。过去，常常只是例行公事。他呢，毫不客气：特别好的他升，普通好的他留，不好的他降，太不好的他去。可是，他不像某些大官之以给人痛苦为乐。他在原则上，是让胜任的人久于其任。

胜任的人，却不易找。风气好，好人多；风气坏，好人少。在少数的好人之中，能办事的人更少。张居正懂得“不求全”。用人，只是用其所长。某人的短处，倘与所任之事无关，他从不计较。

他勇于自任，而律己未尝不严。反对他的人，说他接受贿赂，说辽王朱宪爝被废之时，王府的金宝都被他吞了。神宗因此而在他去世以后的第二年，抄他的家，却只抄得了十万两左右的银子而已（他家里原本是盐商，有钱）。

中国的社会，尤其是在明朝，是一个只讲私情，不讲国法的社会。谁要执法严明，谁就免不了得罪人。官位愈高，得罪人的机会便越多。想升官的升不到官，怕丢官的丢了官，说人情的说不到人情，借钱的借不到钱——如何不恨？恨张居正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他在世，大权在握，没有人奈何得了他。他一死，仇家对于他的家属，对于他的身后令名，就可以为所

欲为，弄得他在死后的第一年官爵被“追夺”，在死后的第二年家产被充公，家属被充军或下狱而死，长子张敬修被逼得自杀。

在他未死以前，便已有很多人想藉他丁忧而“夺情”（不离职奔丧守制）的一件事，造成轩然大波。其实，“夺情”是两位太后与神宗叫他如此，不许他因丁忧而沿例去职，要他留在任上办事。他自己未尝没有一再恳请去职“守制”。那时候，万历五年，他的改革的大事业刚刚做了一半；如果两位太后与神宗真让他走了，这大事业一定半途而废，明朝也决不会能够再撑上六十二年。反过来说，倘若在他死后，继起有人，像他一样综覈名实，替国家办事，明朝也不致于在六十二年以后便亡。

吴三桂觉悟经过

提起黎先生，大家都想起三国志。因为茶馆说书要钱，宋人话本刊行前后即有，不足为奇。一块惊堂木，一顶小帽，便足以使听众不睡觉，也可以收钱。然这毕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事。能于学舍之间，庙堂之上，公开讲演，还要人先出钱者，以黎先生为第一人。然而，这毕竟是小事。有多少人知道《中国战史研究》、《先秦史》等等的研覈精详？做社会教育工作，写“浅出”文章者，因其较易流传，影响较大，遂至其学问工夫所在反而湮没不彰，这是无可奈何的悲哀事。本文仍以浅显流畅、娓娓动人之文笔写出，可以见作者自信之强，用心之苦。历史本来就是一面镜子。这里我们呈出一面最晶莹

澄澈的镜子,让看官看看如何?

——林语堂先生在本文刊于《天风月刊》时之按语。

由于清朝政府有计划地把吴三桂写得不值一钱,所以我们一般人对于吴三桂的批评都不算好。总而言之,他是汉奸,而且“反复无常”。说他是汉奸,本不冤枉,不过连他晚年痛自忏悔,力图匡复的壮举也一概抹杀,就不免中了清朝宣传员的诡计。站在清朝立场,原不希望别的汉奸仿效吴三桂的榜样。

从开头说起。当吴三桂向多尔袞借兵,共同入关讨伐李自成的时候,不过是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将领。年纪轻,不懂事,太爱陈圆圆,把敌人当自己人。他满以为多尔袞会讲信用,打过了李自成就会退兵。等到引狼入室以后狼不肯走,吴三桂就毫无办法。那多尔袞偷偷地迎了顺治娃娃入据北京,事先不曾和吴三桂商量。

千错万错,是吴三桂不与南方的几位名将联系。凭他的一个人一支兵与敌国君臣周旋,能周旋出什么好结果来?再加上南方情形的混乱,也够叫人悲观。武汉的左良玉和南京的福王政府,定要拼个你死我活。诚然,福王无甚出息,阮大铖等人真正不是东西,害死崇祯太子这一件事也混账到极点。然而史可法能够万分悲愤,而继续容忍,为什么你左良玉偏受不了?大敌当前,哪一个老百姓在盼望你统率七十万大军的左良玉横击南京,摧残反清团结?如果左良玉不

东征而北伐,说不定迷途失群的吴三桂可以憬然醒悟,从容“归队”。

我责备左良玉,是责备贤者,毫无袒护吴三桂,替吴三桂解脱的意思。吴三桂一失足成千古恨,当了汉奸,总是事实。他接受了封号,由明朝的平西伯变成清朝的平西王。他让儿子做了清朝驸马。他在阿济格与豪格的鞭策之下穷追李闯,扫荡山陕,又续由陕南进军四川,把拥护桂王的刘文秀、李定国、白文选三位勇将一逼再逼,最后与洪承畴会师遵义,侧袭云南,占领昆明,以至威胁缅甸交出桂王,勒死桂王为止,真是“彻底”,“干净”,“不仁慈”,有劲得很。花了那么多的气力,所为何来?

为了陈圆圆么?女人不一定个个是祸水啊!陈沅女士虽则出身歌女,绝非娼妓。(娼妓也不都是无心肝的)。她自从与吴三桂重聚以后,并未有过具体的政治主张,所以说不上有什么亲清倾向。当大丈夫的政治行动,最好由丈夫本人负责,我们大可不必把人家的老婆拖进公堂对簿。

我要藉此机会,附带声明:陈圆圆是吴三桂的正式老婆,非小老婆。吴陈二人的感情,自始至终,都还不错,虽则中年以后,一方稍厌红尘,而另一方豪兴不减,致有三桂纳妾,圆圆出家之事,风流之中,略含辛酸。

妾究是妾,非妻可比。那绰号“四面观音”的如夫人,美则美矣,温柔不足。陈圆圆天性恬淡,情愿让“四面观音”一步,出家修行。笔者于抗战胜利之日的

前后旅居昆明，曾多方访求圆圆念经之处，蒙几位朋友帮忙到底，果然在航空学校飞机场附近找到小庵一座，老尼一人。据老尼云，圆圆法号寂静，活到八十多岁才“化”。为了证明她的故事，老尼拿出碑文一张，是“住持寂静”重修该庵的“记”，记上的年代已是康熙四五十年。

另一流行说法，是圆圆无庵，只在平西王府内划几间房子作一经堂。今日之昆明城外莲花池是经堂原址。并且有二三好事之徒，一口咬定圆圆投水自杀于康熙二十年清军打完吴三桂党羽，再入昆明之时。

我有很多理由，相信吴三桂精神苦闷。圆圆未修行以前，无论丰韵是否依旧，或脂粉加厚而 funny 起来，抑脂粉不施而以老卖老起来，俗语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彼此之间可谈之老话颇多，倒有点相交不在形迹，互相调剂于不知不觉之中，过日子不太无聊。等到圆圆真做起尼姑来，光头黄脸，道貌岸然，见面的机会既少，又加上十分客气，老实说，还有什么意思？

论及四面观音，我对她原无恶感，无非站在法统立场，不免替陈沅女士稍抱不平。话说回来，说来说去，总归是男人不好。四面观音专宠不久，便又有一位“八面观音”进了王府。四面，已经够美的了。（前面，后面，左面，右面，都像观音。）八面，那还得了。一定是擅长回眸一笑百媚生的解数，富于动态的美，好比巴黎服装比赛会的模特儿。

于是此观音与彼观音，天天斗法，天天祭宝，弄得王府里面充满妖云瘴雾。平西王仲裁计穷，常常请了

寂靜法師來，向雙方說法講經，達成暫時休戰。法師一本正經，每回任務完畢，立即告辭回庵，無論平西王怎樣苦留，法師總是堅決萬分，非走不可，叫千歲哭笑不得。

所以討小老婆没有什么好結果。它至少解決不了苦悶問題。“人到中年兩頭難，生非容易死不甘。”這兩句詩似乎是替窮人寫的。其實有錢有勢的人，也是如此。（甚至我輩略有幾分哲學的人，都有點那個呢。）

吳三桂開府昆明，兼制雲貴，大筆一揮，除了雲貴以外，全國各省的官位，他愛保薦誰，誰就補缺。北京舉朝文武，個個買他的賬。洪承疇與他，一內一外，確是把持了不小政權，簡直是與滿人平分春色。他又有鑄錢的特權，這便和皇帝差不了許多。當時皇帝與他以外，第三人無此福份。

洪承疇於順治十八年退休，康熙四年去世，從此以後，吳三桂頓失支援。他在康熙六年，請求解去節制雲貴的行政職務，未蒙挽留，於是便成了光頭的平西王，清閒得很。（雲貴總督是甘文焜，駐紮昆明；貴州總督是李本深，駐紮安順；雲南巡撫是朱國治，設署昆明；貴州巡撫是曹中吉，設署貴陽。）

此後有六個年頭，吳三桂閑居昆明，無事可做。如果由崇禎十七年，即順治元年算起，他當漢奸也已經有二三十年，該膩了。“英雄”“兒女”的滋味，也嘗遍了。什麼“英雄”？他自己知道。為清廷當工具，當劊子手，殺了自己的同胞，滅了自己的國家。那鄭成

功、张煌言、何腾蛟以及刘文秀、李定国、白文选，才真正是英雄！说什么联络清朝，解放中国，分明是勾结仇敌，奴役宗邦。吴三桂照照镜子，白发一天一天的多，应该惭愧。至于“儿女”一层，这好比吃糖一样，吃多了也不是味。况且只有陈圆圆算是真爱人，而陈圆圆今非昔比，满口的轮回因果，镜花水月，全无当年的浓情蜜意。唉，到了该用脑筋，观一观我生进退的时候。

据吴三桂后来自己说，他从来不敢忘怀于明朝的兴复，他之所以屈身事仇，是为了保存实力，待时而动，尤其是崇祯皇帝的三太子年幼，必须等待这三太子长大了，才能举事。为什么有桂王在面前而不拥戴，偏要把桂王捉来勒死？吴三桂说，是为了骗骗清朝政府，掩护自己的从容布置。是真的么？

据当时的文件看来，似乎吴三桂不过是假借名义，招摇招摇。在康熙四十七年，亦即吴三桂死后的三十年，有一位朱三太子被捕，全家三十余人判处死刑，罪名是“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朱三太子其时的年龄是七十五岁，推算起来，他在顺治元年是十八岁，在康熙十二年四十岁。为什么吴三桂要等到这位三太子活到四十岁才开始举兵呢？

在我看来，吴三桂不像是苦心孤诣准备了三十年头，才最后孤注一掷的人。否则在他浩浩荡荡替清室扫荡山陕、削平川滇的时候，为什么完全是汉奸面孔？“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卧卧薪？复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这四句虽是诗人骂他的刻

薄话，确也令他难以答辩。

反过来，如果把吴三桂与朱三太子的关系否认得干干净净，也未免上了清朝宣传员的当。有几件不大不小的事，很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吴三桂自称“受命托孤，刺股为记”，这一层，不像是随便乱说的。第二，他起事之时，定年号为“周咨”，并非如《清史稿》所称“大周”。他自称“总统天下水陆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并非如《清史稿》所称僭号为帝。传说他于临死以前，在衡阳大过其皇帝之瘾，国号“大周”，改元“昭武”，也颇可疑问。改元则有之，改国号恐怕未必，至于过皇帝瘾，简直毫无证据。

第三，他的部下将领本来不少，但于开府以后最受他亲信的却是桂王的旧部马宝、胡国柱二人，有点奇怪。这两位也就是其后“兴明讨虏”最出力的虎将。由于吴三桂的专摺奏准，马胡二人始终保存着十营明军精锐。那响应他最早的贵州提督李本深，更不用说，原是曾经帮史可法拼过命的将领，由于马胡两人的勇敢，及李本深的合作，吴三桂才能够像闪电一般，由昆明推进到长沙。

第四，在天地会的经典中不但有“长沙湾口连天近”一句，纪念吴三桂的壮举，而且洪门家谱上号称马贩子的后五祖，第一位写作吴天成，籍贯西蜀；第二位写作洪太岁，籍贯贵州，都特别得很。笔者到了贵州遵义以后，才调查到一点点痕迹，写在此处，权供参考。遵义有人告诉我，当地的一个洪门山头，是洪承畴所创。鄙人听了，当时惊讶不已。此公（洪承畴）本

是“三降三不降的发明家，种种作为都很神秘。现存沈阳的无数清室档案之中，必有若干洪氏亲笔的新鲜史料在那里静待我们去搜寻。他与吴三桂会师遵义，发动出于他本人，不是出于清廷。吴三桂带兵由四川（西蜀）南下，他带兵由湖南西进。这两位见面时说些什么话，只有他们二人知道。就军事情形而论，桂王力量已经到了指日可破的阶段，本不需要洪承畴出马。是不是洪氏此来，专为介绍吴三桂加入天地会呢？

第五，洪承畴死得早了一些，吴三桂起兵迟了一些，叫我们无法证明上项传说，然而吴三桂造反之时，一举而席卷黔湘川三省，牵动桂粤闽三省，获响应于温州、徽州、襄阳、苏州、大同、宁夏，如此之广，如此之快，不像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在背后给他大力支持。

吴三桂之败，其原因之一是与台湾方面不曾交涉好，彼此之间缺乏合作。而且台湾原是天地会的发祥地。怎么这一点没有联系好呢？这真是历史上的一大问题。台湾方面的志士，恨吴三桂害死桂王，原不能怪，但是大敌当前，有吴三桂大举反清，真是再好没有的机会，如何轻轻放过，令人不解。

话说回来，没有郑经所领导的台湾帮忙，吴三桂也未尝不能划江而守，与清廷平分天下。毛病出在江西。他有了浙江与湖南，而不知道赶紧用全力把江西拿到手，实在是疏忽。敌人的统帅康亲王杰书恰好看中这个弱点，从江西一捣就捣到广东边境，把尚之信

吓坏,把广东偷走。从此以后,吴三桂由于领域切成两片,走向下坡。可惜得很。如果他觉悟得早一些,下决心早一些,不要等到六十二岁才动手,也许不一定会失败。

(1952年)

八国联军与辛丑和约

列强习惯于“嚣张”；在义和团事变的期间犯了很多错误。列强于拳众尚未入京之时，向慈禧表示，根据条约上的权利，准备派兵到东交民巷来，保护使馆。慈禧在五月初四日答应它们：每一个使馆可以派来“三十名”洋兵保护。当天晚上，英俄法美意日六国的洋兵便从天津来到了北京。其中，除了日本一国以外，其他五国均派了超过三十名的洋兵。这是激怒慈禧的第一件事。（日本二十四名；英国七十九名；俄国七十九名；法国七十五名；美国五十三名；意大利三十九名。其后，在五月初七日，续到了德国洋兵五十一名，奥匈帝国三十二名，加上先后与洋兵同来的十九名各国军官，总数是四百五十一名。）

在这四百五十一名官与兵之中，有四十三名被分派到“西什库”，保护“北堂”（利玛窦所建的天主堂）。

剩下的四百零八名,成为防守使馆的全部兵力。在军器方面,除了四枝机关枪以外,全是步枪。(英美奥意四国使馆各有机关枪一枝。)俄国使馆虽有若干炮弹,炮却留在天津,不曾带来。

五月十三日(阳历6月9日),英国使馆的“翻译生”在北京彰仪门外的西人跑马场与义和团的团员发生冲突,开枪打死了一个团员。

当天晚上8点半钟,英国公使窦纳乐发了一个电报给驻在天津的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上将,说:“情势极端严重,请立刻派兵增援,迟恐无及。”

西摩尔接到电报以后,在次日上午九点半钟便带了军队由天津北上。中国天津当局于西摩尔的坚持之下,准他与他的军队搭乘火车。

第二天早晨,他到达杨村,已有其他几个列强的军队,陆续由天津赶来。于是,西摩尔的兵力,有了二千零六十六人之多。

这二千零六十六人,便是洋人历史书上的所谓“救援纵队”(The Relief Column)。各国的官兵人数如下:

英	九一五
德	五四〇
俄	三一二
法	一五八
美	一一二
日	五四
意	四〇

奥…………… 二五

这是列强激怒慈禧的第二件事。

慈禧在这一天(五月十四日),索性委派仇洋的端郡王载漪为“管理各国事务总理衙门”的大臣。

次日,五月十五,拳众进入北京。又次日,五月十六,西摩尔的洋兵才到达廊坊(由于杨村以北的铁路被拳众毁坏,因此而西摩尔的军队决定边走边修,军行缓慢)。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所谓“救援纵队”,并非于东交民巷业已被围攻以后才由天津出发。反之,东交民巷奥国使馆之开始被拳众进攻,是在救援纵队既已由天津出发以后的第三天。即五月十七日(6月13日)。各国使馆之一律被中国官军正式围攻之时,更在其后,是五月二十四日午后。

救援纵队于五月十三日晚间从天津出发,五月十四日到达杨村。在杨村的聂士成部队四千人,不但不曾加以拦阻,而且和纵队的军官“礼貌”了一番。

五月十五日午后,纵队到达廊坊,与拳众发生接触,打死了很多拳众。拳众继续抵抗,打到五月二十(6月16日),纵队毫无进展,西摩尔于是下令向天津撤回。

十天以后,纵队返抵天津租界。在这十天之中,且战且退,遭遇到中国正规军董福祥部(甘军)的追击,损失惨重。最后,还是租界方面出来了一批援军(多数是俄国兵,约有一千多人),才把纵队接应了回去。总计,在二千零六十六名官与兵之中,死了六十

二人,伤了二百三十八人。

天津租界的洋兵,于西摩尔出发之日,剩下的有七百人左右。但是,在五月十八(6月14日),从旅顺来了俄国兵一千七百名。加起来,总数是二千四百名。

大沽炮台被占以后,各国的援兵登陆,来到天津的有七千多人,连同天津已有的洋兵,实力增加到一万二千人。

此后,展开了天津的争夺战。中国的军队与拳众进攻租界,攻不下洋兵。进攻天津城,于八月初八日(7月14日)攻下。(聂士成于八月初五日在八里台阵亡。)

洋兵在天津及其周围地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无所不至,比起拳众来不可同日而语。拳众诚然也杀人放火,却很少犯过奸淫掳掠。

洋兵的次要任务,同时也是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迅速攻入北京,救出被围困的各国公使。

然而他们并不着急。原因是,有鉴于西摩尔的救援纵队在廊坊吃了亏,有鉴于他们自己在攻打天津之时又遭遇到聂士成、宋庆、马玉昆等人的坚强抵抗。他们纷纷向其本国政府请求增援,准备等待大批的援兵到达以后,再向北京进发。而等待的期间,他们又正好继续抢掠天津人民的财物,奸淫天津的妇女。

等候到七月初九日(8月3日),援军来了两万多,加上已有的洋兵,总数在三万四千左右,他们这才决定分出一万八千八百一十一名于次日进兵。

这一万八千八百一十一名洋兵的国籍如下：

日		八〇〇〇
俄		四八〇〇
英		三〇〇〇
美		二一〇〇
法		八〇〇
奥		五八
义		五三

传说，德国派出的援军最多，但此时尚未到达天津。传说，德军已有二百人参加，而奥义两军各有一百名，不是五十八名与五十三名。

庚子年七月初十日(1900年8月4日)，一万八千八百一十一名的八国联军从天津出发。

十一日，午前二时，他们占领北仓。

十二日，午后，他们攻进杨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中了炮弹，伤重而死。中国军队退守蔡村。

十四日，蔡村失陷，中国军队退守河西务。这一天，清廷新委的“帮办”直隶军务李秉衡，率领若干正规军、各省勤王军，与三千拳众进驻河西务。

十五日，联军攻占河西务，李秉衡退守通州。

十八日，李秉衡在通州自杀。联军占领通州，准备在二十一日(8月17日)进攻北京。

十九日，晚间，俄军单独行动，提前进攻北京的东便门(内城极东的北门)。日军不甘落后，也在二十日的黎明进攻北京的朝阳门(内城正东的城门)。

二十日晚间，日军用地雷炸开朝阳门与东直门

(内城东边偏北的一门),由这两个城门进入城内,占领了内城的北半部,又于次日午前一时,占领皇城。

俄军攻不下东便门,美军助攻,一齐爬了城墙进来。英军由水沟钻入,却最先于二十日(8月14日)午后3点钟到达东交民巷,“解了各国使馆之围”。

守城的董福祥的甘军,由彰仪门逃走。荣禄的武卫中军、武卫右军,端郡王载漪的神机营,载澜的新创不久的虎神营,以及所谓“八旗练军”,一共只剩下两千多名,陪伴着慈禧、光绪、溥俊,于二十一日清晨,向张家口方向奔逃。(义和团呢,早已溃得无影无踪。)

此后,联军陆续进入北京,把北京划成几个区域。朝阳门以北的半个内城,归日军占领。朝阳门以南,以正阳门的子午线为界,东边交给俄法二军,西边交给英美二军。其后,德义两军也分得防区,奥军似乎不曾分到。

德军的统帅瓦德西,到了二十七日(9月20日)才到达大沽。在他率领之下的德军,共有两万二千五百名左右。这时候,由于德皇威廉第二的保荐,俄皇尼古拉斯第二的同意,其他各国政府的不反对,瓦德西已经是联军的统帅。

各国政府之所以不反对瓦德西当统帅,因为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已于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上午9点10分钟左右,在走向总理衙门的途中,被甘军打死。

那一天,正是慈禧对“远人”宣战的前一天,也就

是“列强”夺占大沽炮台以后的第三天。

瓦德西到达大沽以后，进入北京，执行统帅任务。他派遣洋兵，到处搜杀义和团与曾经同情义和团或被认为曾经同情义和团的中国老百姓。他甚至“施行惩罚任务”，南至保定，北至宣化府（张家口）。在保定，不仅来了瓦德西所派的兵，而且先期来了法军单独行动的兵。直隶布政使廷雍被法军带回天津枪毙。

一般说来，联军的暴行只有“可耻”二字可以形容。日美两军军纪稍好。

义和团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慈禧应负其中最大的罪责。她不该宠信奸佞，残害忠良；更不该对全世界宣战，与下旨进攻各国使馆；尤其不该通飭各省督抚，“尽杀”境内所有的洋人。

在戊戌政变以后，她所最宠信的是载漪、载澜兄弟与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这几人均是反对维新最力的顽固份子，同时也是长于造谣、进谗、挑拨、逢迎的小人。他们有一个极大的阴谋：利用拳众制造京城与宫内的混乱，甚至对外的战争，以结果光绪的性命，拥立溥俊，让载漪以“皇帝本生父”的地位，窃夺慈禧所掌握着的政权。

他们以小忠小信取得慈禧的欢心。慈禧于是令载漪管理总理衙门，又准许载澜设一个虎神营，号称以对付洋鬼子为目的，实际上是供他胡作非为。（“虎神”的意思是虎吃羊〔洋〕，神制鬼。）刚毅与赵舒翘均被升兼军机大臣。

慈禧而且以庄亲王载勋出任步军统领，与刚毅共

同统率义和团,由载澜以右翼总兵的资格与左翼总兵英年,“会同办理”。

清朝的天下便坏在这几人的手上。太常卿袁昶在御前会议中慷慨陈辞,说拳众即使有邪术,亦不可用。因此,就得罪了载漪、刚毅等人。吏部侍郎许景澄请光绪“乾纲独断”,更遭了慈禧的疑忌。他们两人于七月初三被捕,七月初四被杀。

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不赞成对“远人”宣战。因此,这三人也死于非命(于七月十六被捕,七月十七被杀)。

因维新罪名而远戍伊犁的张荫桓,是当时中国极少数的外交人才之一,忽被载漪等人忆起,下了一个矫诏,诬指他通俄,令新疆巡抚饶应祺将他处斩。

慈禧的国际知识,赶不上今天小学校五六年级的学生。载漪、刚毅等人的常识,赶不上今天幼稚园的儿童。中外古今,不曾有过任何一个别的君主,对全世界一切国家宣战;也不曾有过任何一个别的政府,相信杀了外国的代表与传教士,便足以慑服外国国内的全体君臣人民。

况且,攻打东交民巷的主力竟是一些乱舞刀棍的乌合之众与土匪胚子的甘军!

也许,倘若荣禄不弄玄虚,而肯“借”大炮与炮弹给董福祥,董福祥可能真的打进了东交民巷,那么一来,中国不真的被瓜分,才怪!

董福祥从五月二十四日打起,打到七月二十日,打不进东交民巷,也打不进四十三名洋兵与五百名教

民所困守的“北堂”。这真是清朝，也就是中国，不幸中之大幸了。

另一件差强人意的事是：在盛宣怀的策动之下，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都决定了不从“尽杀洋人”的乱命。

因此，东交民巷仅死了洋兵七十六人，伤了一百七十九人，北堂死了洋兵十一人，伤了十二人，全国各地被杀的外国传教士也仅有二百三十一名左右。否则，辛丑和约的严酷更难想像。

辛丑和约

八国联军在庚子年七月二十日进入北京，辛丑和约在辛丑年七月二十五日签字。

在这一年之中，中国处于存亡绝续之交，而受苦最深的是北京、天津、保定及其邻近各县的同胞（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东南至沧州，西南至正定）。其次是，东三省的同胞。

联军所屠杀的中国人，百倍千倍于拳众及清朝官吏与军队所杀死的洋人。联军所劫掠的财产，联军所焚烧的房屋，也与拳众及不肖兵士所劫掠或焚烧的，不成比例。

在联军之中，最残忍的一人便是所谓联军统帅，德国大将瓦德西。

瓦德西在庚子年七月二十五日离开柏林，于八月二十二日到达天津，闰八月二十日到达北京。这时

候,联军早就在两个月以前解了各国使馆之围,战事在事实上等于已经结束。

然而瓦德西藉口为克林德公使报仇,同时执行威廉第二给他的训示:“不让任何一个中国人此后敢于正眼向一个德国人看一看”,除了对保定、献县、正定、永清等地大逞威风以外,又单独以德国军队向四面八方施行了三十五次的“惩罚”。

归根结底,克林德公使当初之被杀,诚然是清廷保护未周,然而出事的一刹那,最先“误触手枪发声”的却并非是中国士兵,而是克林德自己。并且,在中国士兵未动手以前,“附近比国使馆卫兵以为中国军队来攻,齐出发枪”,中国士兵还击,才射死了克林德。这些话,说来是多余的。

关于赛金花如何结交了瓦德西,如何影响了瓦德西,以及瓦德西是否真受了赛金花的影响,让将来的历史家去小心求证。赛金花由妓女而成为公使的如夫人,由公使的如夫人而自甘暴弃,再度为妓女,为老鸨,其人品毫无足取。值得我们牢记的是:在联军之中纪律最坏的正是德军与俄军。

打进北京的联军,原无一个德国兵在内。事后,德军陆续而来。各国也陆续增派了不少。到了阳历(1901年)元旦之时,德军驻在北京与保定的有四十九个连,驻在天津的有十九个连,又有四个连分驻其他各地,总数在九千人与一万一千人之间。

法军的总数约有九千五百人左右。日军有四千人,其中半数以上驻在北京。意军可能有二千人。英

军的总数是一万二千人,其中除炮兵及四百五十名水兵以外,均是印度人而不是英国人。美军的总数,是一千八百七十六人。奥军的人数极少。

俄军最多,而大部份在东三省。

庚子年冬月十一(1901年1月1日),俄军留在北京城内的仅有两个连;但是沿着铁路由北京到天津,由天津到山海关,各站均有俄军,总数是三十五个连左右。

山海关以东,入侵俄军的总数,却有十五万人之多。

俄军开始由海兰泡越界渡江,进入黑龙江省(包括今天的兴安嫩江二省),是在庚子年六月十八这一天(1900年7月14日)。

次日,六千多名在海兰泡居住的中国人民,被赶到黑龙江边。二十,这六千多人被俄军用斧头砍杀,用上了刺刀的步枪追赶,大部份跳入江中,淹死。

二十一,俄军把“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人民,集中在一起,用火活烧。

俄军占了黑河屯(今天的瑷珲县县治),攻下瑷珲城(今天的旧瑷珲),向西南推进,在七月初四占了陡沟子,守将满人凤翔与汉人程德全节节抵抗,抵抗不住,凤翔负伤,呕血而死,程德全奉了黑龙江将军寿山之命,对俄军停战议和。俄军在七月底开到黑龙江省会(今齐齐哈尔城)的城外。

八月初四,寿山自杀。初六,俄军入城,把城内衙署的银钱什物劫掠一空,清廷所派的署理黑龙江将军

萨保,与俄军合作,让俄军为所欲为。

俄军侵占吉林省,与侵占黑龙江省,约略同时,而开始稍后。入侵的路线,一路是由邻近朝鲜的珲春,指向宁古塔;另一路是由黑龙江与松花江汇合之处的同江,乘船溯松花江而上,指向三姓(依兰)与哈尔滨东南的阿勒喀楚(阿城县),西南的拉林(双城县);另一路是由西北尖端满洲里(胪滨),指向呼伦贝尔、齐齐哈尔,转而南向。

在整个的吉林省,仅有宁古塔一城(宁安)真正抵抗了俄军,守了四十几天才被攻破。那时候,吉林将军长顺早已奉了清廷之命,“停战讲和”,让俄军进入吉林省会(今吉林市),收缴全省一切枪械及官府的现银。

在奉天地区,副都统晋昌于宣战以后的第四天(五月二十九)拆毁沙河站附近的铁路两小段,铁桥两处,打死俄国的工程人员一名。这算是“其曲在我”。事后,奉天将军增祺把一切责任都推到这位晋昌身上,晋昌便成了战犯之一。

六月初四初五两日,蔓延到奉天的义和团份子大举活动,捣毁了辽阳以北、铁岭以南很多处的教堂、车站、煤厂、洋房。

七月初十,拳众进攻营口租界,失利,俄军乘机占了中国的海关。

闰八月初八,俄军占领沈阳。在占领沈阳以前,俄军先占了海城、牛庄、辽阳。

在这个期间,清军只有瑞禄、海禄两个统带(团

长)对俄军在牛庄打了一次硬仗,打死俄军“七八百名”。无耻的奉天将军增祺,于撤离沈阳以后,向清廷大言不惭地报告:“俄马步队先后入城,分抄各路,尚未惊动陵寝宫殿”。

于是,整个的奉天地区也入于俄军的掌握。俄军不费气力,把山海关以外的中国庞大领土完全偷占,对于北京一城便不再有多大兴趣。

闰八月初四,亦即俄军入占沈阳的前四天,俄国政府向参加八国联军的其他列强,递了一个照会,使得这些列强大吃一惊。

照会说:“解救各国使馆的任务已经完成。由于中国政府业已离开北京,俄国政府命令其驻华公使与随员撤至天津,进入北京的俄国军队亦撤至天津。”

这分明是一面向清廷讨好,一面对英德日法等列强拆台。列强虽未必如有些人所说,有不再承认慈禧光绪而另行拥立庆亲王奕劻为皇帝之意,但确有长期占着北京,以一致行动对慈禧光绪索取相当代价的决心。俄国把俄使与俄军撤出北京,等于是告诉清廷:所谓“八国”,在主张上并不“一致”。

在列强之中,英德两国最恨俄国施展如此手法。俄军在事实上并未完全撤出北京,仍旧留下了两个连。而俄国公使格尔思不撤往别处,偏偏撤往李鸿章即将来驻的天津。

李鸿章在英德的眼中,自从“中俄密约”以后,已是十足的“亲俄份子”。因此,慈禧虽则早就在北京沦陷以前的七天(七月十三)发表了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负责议和，而英德的反应始络极其冷淡。

李鸿章于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以后，丢掉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于戊戌年百日维新之时，丢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之职，所剩的只是大学士虚衔。政变以后，慈禧一度派他去山东查看水灾。次年冬天十一月，任命他署理两广总督，于五个月以后实授。

实授了一个月，慈禧对全世界宣战。又过了一个月，六月十二，慈禧调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可谓官复原职。李鸿章到了上海，便停了下来，不急急于北上就职。

再过一个月，七月十三，慈禧派他当负责进行和议的全权大臣。李鸿章仍旧滞留上海，不肯立刻去北京找洋人的公使开谈判。

七天以后，北京沦陷，李鸿章更不想去。又过了十天，慈禧从太原的行宫（巡抚衙门）里，再颁一道上谕给李鸿章：“着准便宜行事，将应办事宜迅速办理，朝廷不为遥制。”

李鸿章继续拖了七天，同时多方试探列强的意旨。挨到八月初七，他才打了一个电报给慈禧，要求（一）加派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荣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全权（议和）大臣；（二）下诏罪己；（三）剿办“拳匪”。

八月初九，他会同刘坤一、张之洞，奏请责成直隶总督（他自己）剿办拳匪；处罚抵抗俄军的黑龙江将军寿山、吉林副都统晋昌。

慈禧见到李鸿章露出可以北上的意思，十分兴

奋,除了“如拟”加派奕劻、荣禄、张坤一、张之洞等人为全权大臣以外,很恭维了李鸿章一顿:“该大学士此行,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转乾坤,匪异人任,勉为其难,所厚望焉。”

李鸿章一面电令奉天吉林黑龙江的将军,对俄不许抵抗,一面于八月二十一搭招商局轮船北上,于俄军入占沈阳的一天到达天津。

李鸿章在天津住了十天,到了闰八月初八(10月1日)才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时候,他已是虚岁七十八岁的老人了。俄军派了一队骑兵保护他,他也只和俄方的人员来往。

闰八月初十,他乘帆船去北京与他的老朋友总税务司赫德会面。赫德把清廷颁来的“全权大臣”关防转交给他。

另一位全权大臣,庆亲王奕劻,原已于北京沦陷之时逃往怀来。其后清廷的留京办事大臣,大学士昆冈,接到赫德的建议,奏请在旅途中的慈禧,叫庆亲王回京,庆亲王只得在八月初十(9月3日)回来。英日两军派兵将他保护。三天以后,他分访各国驻华公使,准备讲和,未得要领。公使们告诉他,关于具体的和平条件,他们尚在等候本国政府的训令。

(庆亲王一向以贿赂公行著名,然而这时候俄国以外的洋人对他颇具好感。原因是,在拳众与甘军围攻使馆的期间,他以总理衙门的“首席大臣”的资格〔地位次于管理总理衙门的载漪,但实际上仍在负责处理公事〕,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请准慈禧,向各国

公使通函,表示愿意护送他们去天津。)

李鸿章来到北京之时(闰八月初十),各国公使依然不曾接到本国政府有关具体和平条件的训令。

甚至连笼统的条件也仅有俄德两国政府已作表示。俄国的条件是:只要能避开东三省的问题不谈,对清廷差不多可以“无条件讲和”。德国的是:惩办元凶(载漪刚毅等人)。

倒是法国人头脑细密,首先在闰八月十一(10月4日),亦即李鸿章到京的次日提出了六项原则:(一)惩办祸首;(二)禁止军器输华;(三)索取赔款;(四)使馆驻扎卫兵;(五)拆毁大沽炮台;(六)天津大沽之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

经过了二十二天,奥比德英义日西俄美九国的公使于先后接受了这六项原则以后,会同法国公使,起草了一个共同照会,交给庆亲王与李鸿章。

在这个期间,为了对付俄国,英德两国奏了一支插曲。英国首相兼外相骚利斯伯哩勋爵(Lord Salisbury)与德国驻英大使哈次肥勒狄特(Hatzfeldt),在10月16日(闰八月二十三日)签了一件“英德协定”。协定的内容是:(一)在英德两国势力所及的中国领土内,河川沿海各港,无差别自由开放给无论何国的臣民,从事贸易及其他各种正当的经济活动。(二)英德两国相约不利用现时之纷扰,夺取中国领土,并相约维持“不变更中国领土”之政策。(三)若他国欲利用现时之纷扰获得中国领土,英德两国……应协商应付。(四)两国将此次协定通知有关各国,并劝告接受

此次协定所采之原则。

各国对英德协定的反应,在大体上均是客气一番,避实就虚。义奥两国根本是德国的朋友,因此义国的答复是“毫不踌躇”,承认协定的原则,奥国呢,“深愿接受”。美国说“我国早已发起了门户开放的运动”。日本也是回答了一句“毫不踌躇”。答复得最狡猾的仍是俄国。

俄国的答复,特别指出英德协定所谓河川沿海港口的自由开放,既只是对英德二国势力所及的地区而言,“俄国政府自可承认。”

俄国驻华公使格尔思,这时候已从天津回到北京,参加公使团的会议。他在会议席上,总是一味唱“对华人不可敌视”,“中国现政府必须维持”的高调,藉以向中国人民再度扮出“救命恩人”的面孔,掩盖俄国在东三省的侵略。

瓦德西和德国的新任公使穆默的态度,与格尔思的态度恰好成一个对比。瓦穆二人坚持,必须对中国政府及中国人民严厉报复。

瓦德西甚至宣称,将派兵西进,占领慈禧所驻蹕的太原。慈禧听到消息,于是又拖了光绪,在闰八月底离开太原,向西安奔逃,于九月初四日到达。

公使团开出一个名单,要慈禧答应先将下列诸人处死:载漪、载勋、溥静、载灋、载滢、载澜、董福祥、刚毅、赵舒翘、英年。

在这些入之中,只有溥静、载灋、载滢三人尚待向读者介绍。溥静是怡亲王,康熙第十三子胤祥的后

裔。载灋是载漪的哥哥；他与载漪载澜均为醇亲王奕詝的儿子。奕詝是道光的第五子，死于光绪十五年。载滢呢，是恭亲王奕欣的儿子，而奕欣是道光的第六子，死于光绪二十四年。

慈禧对于惩凶的要求，在原则上接受，但是不愿意把这些人一概处死。

挨到十二月二十五日（1901年2月13日），慈禧以光绪名义颁下谕旨：庄亲王载勋赐死，载漪载澜发往新疆禁锢，英年赵舒翹褫职论斩，董福祥褫职解任。

其余四人：载灋已于闰八月间削爵，溥静载滢已于九月间交宗人府圈禁，刚毅已于偕逃西安之时中途病故。

公使团仍不满意。慈禧只得又在辛丑年正月，将英年赵舒翹二人赐死，将病故的刚毅追判斩罪；将董福祥的“褫职解任”改为褫职听勘。

于是侥幸从轻发落的仅有董福祥一人。原因是：董福祥的军队（甘军）在西安，而且护驾西逃有功。

公使团于原提的名单以外，补了李秉衡、徐桐、启秀、徐承煜四个人的名字。李秉衡早已于战败之时在通州自杀，徐桐（是大学士），也已在北京沦陷之时上了吊。慈禧给他们两人补判了一个斩罪。

启秀和徐承煜在正月初八日受刑，身首异处。启秀是礼部尚书，徐承煜是徐桐的儿子，官居刑部左侍郎。

在各省官吏之中，首先（在正月初四）处斩的，是山西巡抚毓贤。他把山西境内的洋人几乎杀光，可谓

罪有应得,其实也未尝不是“奉旨行事”。

此外(在三月间)被斩的有归绥道郑文钦,阳曲知县白昶,衢州都司周之德。先后被充军或革职的大小官吏,在一百人以上。

至于拳乱期间被斩的袁昶、许景澄、徐用仪、立山、联元、张荫桓,均于庚子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开复原官”。

惩凶的问题解决了,次一问题是赔款的数目。德国的开价是七万万两,而当时清廷的每年收入仅有一万万两,支出倒有一万万一千两,无款可赔。俄美两国建议把这个问题交由荷兰海牙城的国际法庭解决,被其他的列强反对。

列强互相争论到辛丑三月,决定了以四万万五千万两为基数,从该年阳历7月1日起计息,年利百分之四。清廷想减少一点,公使团不准。

这四万万五千万两,按照下表分配给十三个“国家”:

俄	一三〇、三七一、一二〇
德	九〇、〇七〇、五一五
法	七〇、八七八、二四〇
英	五〇、六二〇、五四五
日	三四、七九三、一〇〇
美	三二、九三九、〇五五
意	二六、六一七、〇〇五
比	八、四八四、三四五
奥	四、〇〇三、九二〇

荷	七八二、一〇〇
西	一三五、三一五
葡	九二、二五〇
瑞典挪威	六二、八二〇
杂项	一四九、六七〇

在这十三国之中，有五国并未参加八国联军，而一体分肥。这五国是：比、荷、西、葡、“瑞典挪威”。

在五国之中，比荷西瑞均多多少少说得若干“公私损失”，而葡国可谓毫未波及。然而，（一）葡国是近代帝国主义的老前辈，（二）慈禧本已对一切的“远人”宣战，葡国自然也可以被包括在“远人”之内。于是，葡国虽然并未发动一兵一卒来应战，也成了“战胜国”之一了。（“瑞典挪威”这时候是一个国家，到了一九〇五年以后才分成两个。）

所谓杂项，实际上是为了凑成四万万五千两整数而生出来的一个尾数。下落如何，只有当时经手的人才能说得清楚。

意大利比起葡萄牙来，更为幸运。葡萄牙虽则不劳而获弄到了九万二千多两。意大利所派出的兵数不多，却分得了二千六百六十一万七千零五两，合意币九千三百万里拉(lira)以上。

赔款虽则以中国的库平银两为单位，在支付之时却必须按照各该国的国币市价折算。以后每年分期支付之时，又必须按照每一年外币的市价折合银两。

《辛丑条约》签定之时，外币的折合率，是：每两等于

英金	三先令
美金	七角四分二厘
法币	三点七五佛郎
德币	三点零五五马克
俄币	一点四一二卢布
日币	一点四零七日元
奥币	三点五九五克隆
荷币	一点七九六盾

其后银价每况愈下，中国所受的损失极大。

《辛丑条约》规定，赔款分三十九年还清。每年除付“本”之外，加付“余债”利息百分之四。预计付到一九四〇年之时，全部本利共为九万万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

《辛丑和约》的两大问题，惩凶与赔款，既已获得具体解决，其他枝节也就费不了多少折冲。

到了七月二十五日，亦即阳历9月7日，庆亲王奕劻与李鸿章，便会同十一国驻华公使在条约上签了字。这十一国是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

和约的本文共有十二款，所根据的是去年（庚子年）闰八月十一法国所提出的“议和原则”六条，与十一月初三公使团交给奕李二人的“和议大纲十二条”。和议大纲是在十一月十七被慈禧完全接受的。

《辛丑和约》的第二款与第六款，分别规定了惩凶与赔款的具体办法。

第一款与第三款规定：中国应派遣地位相当的大臣，分赴德日两国为克林德与杉山彬二人被杀的事道

歉。而且,要为克林德立碑于“遇害”之处。(这一座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了之时被中国北洋政府拆毁,换立了一座“公理战胜”的牌坊。)

第四款规定,凡是“诸国被污渎及挖掘各坟墓之处,也一律立碑。其地点于附件之中,列表说明”。

第五款规定,禁止军火及制造军火之机器与材料输华,为期两年。

第七款规定,在北京划出一个“使馆界”,由使馆自行管理,自行设防;界内不许中国人民居住。(除了东交民巷以外,肃王府等处也划入这使馆界。使馆界的地图,作为辛丑条约的附件之一。)

从此,清朝中央政府,处于使馆界炮火威胁之下。民国成立之时,孙中山先生之所以反对在北京建都,这是原因之一。

第八款与第九款规定,将“大沽及有碍京师至海(的)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准许各国驻兵于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

这么一来,不仅洋兵可以由洋船运来,在大沽或塘沽或秦皇岛登陆,直至北京,横行无阻,而且从北京到山海关的铁路,也完全被控制于列强的铁骑之下。

第十款规定:在全国各府、厅、州、县,张贴禁止人民仇教仇洋的各次上谕,包括禁止“结会”的上谕,停止某些地区文武考试的上谕,严办不尽力弹压的官吏的上谕,等等。张贴上谕的期间:两年。

第十一款规定:直隶白河水道与江苏黄浦江水道

必须整修。整修白河的经费,由中国负担。整修黄浦江的经费,由中国出一半,列强出一半。

第十二款规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此后应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各国公使觐见中国君主的礼节,也必须“变通”。至于如何变通,则在附件之中说明。

这辛丑和约,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屈辱文件。然而,倘若列强不互相勾心斗角,而始终沆瀣一气,其内容之毒辣更甚于此,可谓不幸中之大幸了。当时慈禧已无丝毫的抵抗能力,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也都不是敢于和列强继续作战的人,列强本已可以要什么便有什么了。

(节录传记文学社,《细说清朝》。)

武昌起义的完整史实

(一)

武昌起义前五天,辛亥年八月十四日,黄兴从香港发出一封信,寄给在旧金山的冯自由。信里说,居正从上海托人带了信来,武昌的同志已有了两千多,分布在清军各个部队,组织得很严密,情绪极热烈,急于发动。胡瑛虽已入狱,他所领导的也有一千多人,其中颇有加入居正的团体的,很能合作。“今既有如此之实力,则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大略有二十万左右,即足为完全之预备。至少四五万,亦可发起鄂事。”“故特由尊处转电中山,想我兄接阅,必为竭力援助!”

黄兴在写信的时候,并不知道武昌的同志早已在八月初三举行了一次会议,决定在八月十五(中秋节)半夜之时动手。会议的地点是胭脂巷十一号,主席是共进会会员孙武,出席的是各部队革命同志的代表,包括第八镇工程营的熊秉坤,宪兵队的彭楚藩,炮兵第八标的蔡济民,步兵第三十标的杨宏胜,第二十一混成协步兵第四十一标的刘尧澂等等,共三十二人。(清朝的“镇”,相当于后来的师,“协”相当于旅,“标”相当于团。)

熊秉坤也是共进会的会员,与孙武相同。彭楚藩属于“文学社”;他为了谋求两个团体的合作,特地加入了共进会。蔡济民属于共进会,为了同样原因,也加入了文学社。杨宏胜与刘尧澂二人,均只是文学社的社员,不曾参加共进会。

共进会创始于东京,奉同盟会的总理孙先生为该会的总理,以同盟会的“中部总机关”的湖北主持人居正为精神上的领导者,而实际上的主持人是刘公(姓刘名公)。他原名刘仲文,籍隶湖北襄阳。刘公的最大助手,是孙武。作为这个会的最初发起人,同时也是奔走最力的热心份子的,是湖南浏阳人焦达峰。焦是同盟会的调查部长,负有联络会党之责。因此,共进会吸收会员的对象,也就是会党英雄,特地为他们创立一个“山头”,称为“中华山”。共进会之所以不自称为同盟会的支部,一则是为了避免清吏注意,二则是为了自成团体,行动自如。

文学社的前身是振武学社;振武学社的前身是群

治学社；群治学社的前身是军队同盟会；军队同盟会的前身是日知会；日知会的前身是科学研究所。

科学研究所的最初发起人，是两位自动从戎，为了兴汉排满而跑到清军第八镇工程营当小兵的书生胡瑛与张难先。他们不但鼓动了营中的许多士兵，而且也联络了许多文武学堂的学生，包括武备学堂的吕大森与“文普通学堂”的宋教仁。科学研所在甲辰年（光绪三十年）五月成立，以吕大森为所长，胡瑛为总干事，宋教仁为文书。六月间，黄兴来到武昌，和他们约好在十月初十，武昌与长沙同时起义；他们也就积极准备起来。到了九月间，秘密被人泄漏，科学研究所被搜，但是清吏不曾捕到一人，只是开除了宋教仁及其他一个学生的学籍了案。

同志之一，刘静庵，利用基督教圣公会附设的日知会，继续鼓吹革命。日知会本来只是一个阅报室，已被刘静庵改组成革命团体，于光绪三十二年正月成立，受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余诚的指导，办了东游预备科、明新公学及群治社等等机关。十月间，孙先生派了在东京加盟的胡瑛与朱子龙、梁钟汉，回到湖北，策应刘道一在醴陵浏阳所发动的义军。他们来联络日知会。二十三、四两日，胡瑛、朱子龙、梁钟汉与刘静庵、张难先、李亚东及其他同志三人，一齐被张之洞逮捕下狱。

日知会的同志之一，任重远，与狱中的李亚东密商，集合了军中的同志黄申芎等四百余人，于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开军队同盟会成立大会于武昌

洪山罗公祠。李亚东而且在狱中主办了一个《通俗白话报》。不久,清吏加以取缔,会务无形停顿。

十一月二十日,军队同盟会的黄申芎等在小东门外三里左右的金台茶馆开会,成立群治学社,黄被选为社长。学社办了《汉口商务报》,(以宛思演为经理,刘尧澂为襄理,詹大悲为总主笔,何海鸣等为撰述,)使得武汉三镇的革命空气日益浓厚。宣统二年三月,学社准备起义,未成,《商务报》被封,黄申芎于宪兵来捕之时逃逸,去了上海。

这一年七月间,群治学社的同志杨王鹏等,在清军第四十一标第一营左队(第二连)队部,成立振武学社,杨王鹏当选为社长。十月,光绪皇帝病故,杨王鹏准备起义,被协统黎元洪撤职,振武学社的社务因此停顿。

宣统三年正月元旦,振武学社的同志蒋翊武、刘尧澂、詹大悲等人,在黄鹤楼的风度楼开会,改组成立文学社,以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尧澂为评议部长。成立以后,由于领导得人,社务突飞猛进。

(二)

同盟会在香港的统筹部,于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广州起义,事前,统筹部派了湖南同志谭人凤来湖南湖北,布置将来响应与迎接北伐军的工作。谭人凤到了武昌,与共进会颇有联络,对文学社却不十分

重视。共进会居正孙武等人,积极准备了一顿,不幸广州起义失败,一切又成白费。

孙武等人甚不甘心,决定了虽则广州方面已经失败,仍在武昌发难。

远在宣统二年的夏天,居正与宋教仁、赵声、谭人凤等人在日本朝夕会谈,已经感觉到,与其在边远的广东等地开始武装行动,倒不如先在长江流域着手的好。到了宣统三年春天,广州起义失败,宋教仁就毅然决然邀约陈其美、潘祖彝、吕志伊等,于闰六月成立了一个“同盟会中部总机关”,以宋、陈、潘、谭及杨谱笙为总干事,以居正为湖北“分机关”的主持人,曾杰、焦达峰为湖南主持人,南京安徽等地,也各派一人主持。他们在宣言中声明,“奉东京本会为主体,认南部分会(统筹部)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

“中部总机关”正式成立之时,居正尚在武昌汉口,忙于促成共进会及文学社的联合。这一项工作,到七月初才办妥。双方领袖举行联合会议,公推文学社的将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共进会的孙武为参谋长兼政治筹备处主持人,其他各人分任参谋、文书、内政、交通、财政、传达命令。军中各单位同志分别选出代表,预定事成以后即各由其代表任指挥官。一般的同志,纳入秘密的军队化的组织,以二十人为一支队,五支队为一队,支队设支队长,队设队长,临时总司令部设在小朝街八十五号,政治筹备处设在汉口法租界长清里九十八号,炸弹制造处设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分机关部”设在武昌胭脂巷十一

号。

发难的日期暂不预定。准备的工作,限于七月二十日以前完成。

七月二十四日,一切的布置大致就绪,居正去上海,向“中部总机关”报告,同时托陈其美买手枪,写信托黄兴向冯自由请款。

共进会于谭人凤来鄂之时,经由居正之手,收到同盟会统筹部的协助款项八百元。其后,居正与焦达峰设法盗取蕲春洗马坡的达城庙的金菩萨,功败垂成。有一位同志邹永成,知道他的伯母有钱,用麻醉药放在酒里,但是伯母饮了五杯,仅仅头昏而已。最后,大家还是劝了刘公(仲文)献出家里给他捐官的五千元,才把革命机关一一维持,手枪炸弹分别购制。

黄兴一面向冯自由开口要二十万,以便各地同时大举,否则至少五万,单在武汉一地起义;一面劝居正转告武汉同志,稍候,候到阴历九月初,十一省同时行动。武汉的同志不愿意等待,理由是:⊙因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政策而引起的保路风潮,正在扩展,由川而湘而鄂,已经把武汉人民的怒火点起,⊙含有同志颇多的第三十一标与第三十二标,已被铁路大臣端方带往四川,其他部队难免不在短期间又被带走。

八月初三,大家在胭脂巷分机关部举行会议,议决:在八月十五日中秋节的半夜十二点钟起事。会议也议决了作战计划。

作战的攻击目标,是湖广总督瑞澂的衙门。其

次,是第八镇统制(师长)张彪的司令部。再其次,是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旅长)黎元洪的司令部。

瑞澂的直属武力是:卫兵(机关枪队)一队,宪兵一队,武装消防队一队,巡防营五营(内四营分驻外县),水师五营(皆驻外县),警察(人数不详)。

张彪的第八镇,有步兵四个标,马队炮队各一个标,工程、辎重、宪兵各一个营。它们的番号与驻扎地如下:

步兵第十五协

第二十九标	第一营	驻武昌中和门外
	第二营	同 上
	第三营	已开往襄阳、郧阳
第三十标	第一营	驻武昌中和门外
	第二营	驻汉口
	第三营	驻武昌中和门外

第十六协

第三十一标	第一营	已开往四川
	第二营	同 上
	第三营	同 上
第三十二标	第一营	已开往四川
	第二营	准备开往四川
	第三营	已开往宜昌

马队

第八标	第一营	驻武昌南湖
	第二营	已开往襄阳
	第三营	驻武昌南湖

炮队		
第八标	第一营	驻武昌南湖
	第二营	同 上
	第三营	同 上
工程队		
	第八营	驻武昌黄土坡
辎重队		
	第八营	驻武昌平湖门外
宪兵队		
	第八营	驻武昌楚望台附近

黎元洪的第二十一混成协,有步兵两个标,马队炮队各一个营,工程辎重各一个队(连)。它们的番号与驻扎地如下:

步兵

第四十一标	第一营	已开往宜昌
	第二营	已开往岳州
	第三营	驻武昌宾阳门内
第四十二标	第一营	驻汉口居仁门内
	第二营	驻京汉铁路沿线
	第三营	驻汉阳兵工厂内

马队

第二一营 驻武昌南湖

炮队

第二一营 驻武昌武胜门外塘角

工程队

第二一营 驻武昌武胜门外塘角

辎重队

第二一队 驻武昌武胜门外塘角

在这些部队之中,步兵第三十标之中的革命势力较弱,因为其中的满旗人与汉旗人不少;工程第八营之中的革命势力最强,由于接受革命的宣传最早。而且,在工程营所在地的黄土坡,同志们设立有一个同兴酒楼,经理是邓玉麟。

八月初三所决定的作战计划是:午夜由塘角辎重营的同志放火为号,黄土坡的工程第八营进城占领楚望台的军械库,南湖的炮队由三十二标协助进城攻总督衙门,南湖的马队在城门警戒,三十一标与四十一标的留守部队占领蛇山,在汉阳的四十二标第三营占领龟山,在汉口的四十二标第一营,会同第二营,向北发展,占领鄂豫交界的武胜关。

因此,作为上述各个部队的“代表”的,责任十分重大。而熊秉坤虽则位仅排长,却是工程第八营的总代表。

(三)

当天下午,发生了一件意外,南湖炮队的同志瞿殿臣、孟发丞、钱芝生、张若舟等人,替一个被迫请了长假的徐青夫同志饯行,慷慨悲歌,声达户外。排长来干涉,于是发生冲突;队长(连长)袒护排长,要将瞿等四人鞭打,瞿殿臣抢了炮,想放,找不到炮弹,于是四人便带了枪走。连长派兵追,孟发臣中了一弹,飞

奔到胭脂巷十一号报告孙武。孙武想立即提前在当天起义,刘尧澂不赞成。但是,不将起义的日期提前,便须将它移后,大家讨论的结果,把它改定在八月十八(比原定的日期晚三天)。

谁料到,好事多磨,在八月十七又出了事。这一天中午时候,孙武在汉口宝善里赶造炸弹(他是一个专家),埋头工作。旁边有一糊涂同志刘协卿(名同,刘公的弟弟),大抽其纸烟,把火药搞得烧了起来,浓烟四起,弥漫室外,虽则不曾发出轰然巨响,却已惊动了四邻,向俄国巡捕报了火警。孙武呢,已被火药烧得焦头烂额,慌忙走到一家日本人的私家医院去疗治。不久,俄国巡捕来到,搜去了不少的火药、炸弹、手枪、旗子、布告、簿子,也抓走了呆待在这里的刘同。一会儿,刘协卿和刘公的小老婆李贞清,回来搬衣裳与零用的东西(因为李贞清一向也住在这个机关),二人均被俄国巡捕带走。

消息传了开来,同志们十分焦急。簿子,大家以为是名册。于是,人人自危。而且李贞清与刘协卿被引渡到清方的江夏道衙门;他们怕挨打,把所知道的秘密,完全说出。

清吏如临大敌,满街布置了巡逻兵。共进会与文学社的领导份子,于八月十八日早晨在小朝街八十五号举行会议,才听到孙武烧伤的事。蒋翊武刚好为了当夜要起义,已经从岳州赶回武昌,主持会议。大家谈到下午五点,谈出头绪,公推蒋翊武以革命军临时总司令的名义颁发“起义命令”。

命令的内容在大体上是依照八月初三的作战计划：塘角辎重营放火，黄土坡工程营攻占楚望台军械库，南湖炮队第八标进城攻总督衙门，四十二标进占武胜关。所不同的是：攻打总督衙门的任务，改由二十九标第二营为主，三十二标第二营协助，炮队第八标第一营在楚望台架炮射击。此外，关于何一部队负责各城门的防守，布政使衙门与官钱局、善后局、电报局等地的攻击与占领，江上兵船的制压，也都有具体的指定。

可惜，一方面由于当局宣布戒严，军警机关与学校一概禁止出入，这命令极难传递，负责放火与放炮的单位，到时候并未照办；一方面，在当天晚上军警便来到了小朝街八十五号，把蒋翊武、刘尧澂、彭楚藩和三个其他同志与住在这房子里的张廷辅的眷属、警察高等学堂的学生二十几名一齐抓去。起义的事，并未如期实现。

蒋翊武运气好。他辫子还不曾剪，穿的衣服又是长袍，枣红马褂，土里土气，到了警察局，先问警察，“抓我为什么？”警察以为只有剪了辫子与身穿西服的才是革命党，便把他放了。

彭楚藩与刘尧澂被解到总督衙门，由武昌知府陈树屏等人审讯，被判斩首，在八月十九黎明就义。和他们一同就义的，是杨宏胜。杨宏胜在右旗后营门他家里被捕。他原为三十标的正目（班长），为了革命而请长假，开了一个小店，负责传递炸弹给各部队的同志。

彭刘杨三烈士,是武昌起义之中最先牺牲的同志。今天武昌有一个三烈亭,便是纪念他们的。

(四)

杨宏胜于被捕以前,还到了黄土坡,送炸弹与两排步枪子弹给工程第八营熊秉坤,守营门的刚好是一位同志。步枪子弹平时本不必送,此时因当局已经收缴了子弹(除了所谓可靠的官长以外),所以杨宏胜不能不送。

熊秉坤觉得仅有这两排子弹,不敷应用,又托了本营别的同志向官长偷来十排。他把这些子弹分给了营内若干人,作为起义之用。

八月十八,熊秉坤等到半夜,不见塘角火起,又听不到中和门外南湖炮队的炮声。他等到夜半以后,仍旧毫无消息。

八月十九,彭刘杨的噩耗传到各部队,空气更加紧张。同时,也有同志传来口讯,说“改于今夜起义”。但有人说是仍为夜半,有人说是改在下午七点第一次点名之时。

事实上,蒋翊武在当天早上,托了胡培才告诉大家“一切照原令办理,夜半起义”。其后,他见到街上贴有官府悬赏捉拿他的布告,就匆匆忙忙地去了天门县,找刘英。

蒋翊武不曾来得及在武昌汉口和刘公与张振武会面,刘张二人也未能彼此会面。他们当仁不让,于

群龙无首之际，分别颁下命令“改在十九起义，但时间提前在下午七点。”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他们之所以把时间提前，可能是为了实行孙子兵法上的“出其不意”。

然而到了下午七点，既无塘角之火，亦无中和门外之炮声。

熊秉坤在黄土坡工程营，这一天又约好大家静等。等到熄灯号吹了，灯也熄了，大家仍旧在等，希望等到半夜之时，会看到塘角火起，听到中和门外炮响。

工程营后队的同志特别兴奋，一边在等，一边在切切私语，被值日的排长陶启胜听到，带了护兵来稽查。他查出金兆龙与程正瀛二人抱枪而卧，吩咐护兵将二人绑了，护兵却不敢上前。他自己动手，抓住金兆龙手腕。程正瀛来不及考虑，立刻就用枪柄对准陶启胜脑袋一打，陶启胜狼狽奔逃，程正瀛追着放他一枪，刚好打中他的胸膛。（程正瀛的另一个名字是“定国”。）

这一枪，成了武昌起义的信号。

熊秉坤听到枪声，跑来，对着那仍在狂奔的陶启胜，加放一枪，未曾打中。

代理管带（营长）阮荣发，率领司务长与右队队官（第三连连长）赶了来，意图弹压。他们三人拿着手枪乱放，不曾打死革命党，却先打中了迎面而来的陶启胜。这位陶启胜连中程阮二人的两枪，于三天以后才断气。

革命同志纷纷放枪，把阮荣发连同司务长与右队队官一齐当场打死。

熊秉坤见到事情发展到了如此地步，惟有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开始起义。他集合了四十多位同志，离开黄土坡，向楚望台的军械库前进。守库的是左队队长（第二连连长）吴兆麟。吴兆麟原为日知会会员，在刘静庵胡瑛张难先等人被捕以后，未敢继续参加革命活动。他在这一晚，听到工程营营本部枪声连响，吓得弃库而逃。因此，当熊秉坤率领了第一支革命队伍走到军械库之时，不费一弹，将军械库占领。

熊秉坤打开库里的各个储藏室，欢喜不尽。其中步枪子弹，简直是用不完的。而且又有步枪、手枪、指挥刀。熊秉坤叫大家尽量取出子弹备用，自己拿了一柄指挥刀在手，以革命军第八工程营总代表名义发号施令。

这时候，不但守库的全体士兵作了他的部下，第八工程营营本部不曾跟他来的士兵，听说他占领了军械库，都陆续前来，要求参加。

他的第一道命令是：派金兆龙率领二十人，出中和门，迎接南湖的炮队（第八标）。他又发了几道命令，派遣同志分别巡逻楚望台附近及通湘门、中和门一带，占领千家街要道与楚望台的高地，向着第二十九标与第三十标放枪，催促其中的同志响应。

首先响应的，是第三十标的方维等一百多人。其次，是陆军测绘学堂的李翊东等一百多人。再其次是第二十九标的蔡济民等数十人。他们都来到了军械

库。然后第四批,第三十标的排长马明熙及其全排官兵四十余人。第五批,是第二十一混成协的第二十一标第三营的阙龙、郑继周、王世龙三人。这三人是跳了营墙出来的。营中有一位邹玉溪,想冲出大门,被协统黎元洪当场砍了。第六批,是混成协驻在塘角的工程与辎重两队的李鹏升等七十余人。李鹏升等并且按照起义命令,先在塘角放了火。在第五批与第六批之间,又有零零碎碎的队伍,由吴醒汉等人继续带来。最后,第七批,是张鹏程带来的二十多人,也属于第三十标,恰好于此时奉了清方上峰命令,出来守通湘门。张鹏程在通湘门看到塘角火起,便立刻带他们来军械库参加革命。

张鹏程看见军械库前前后后挤满了人,高谈阔论而毫无动作,不禁勃然大怒,像发狂一般吼了起来:“你们在干什么?守这么一个楚望台么?守到天亮,大家都死!”

这一句话提醒了大家。大家立刻决定,留一部份人守楚望台,其余的都走下台去,攻打总督衙门。

(五)

总督瑞澂似乎早已有了准备。他除了掌握着驻在督署的督练队一营以外,又调来了武装消防队一队,巡防营三营(武昌原有一营,可能是从外县调回两营;另一可能,是所调回的并非巡防营,而是水师统领陈得龙所统率的水兵,待考)。他的卫兵(机关枪队),

这时候仍在身边。他并且选了两个当过统带(团长)、善于指挥的军官,李襄邻与白寿铭,调来督署。陈得龙这时也在督署,是他的“武胆”。

瑞澂在总督衙门的外围,也布了防。张程鹏率领若干人走到津水闸保安门,被武装消防队截住,打不过去,无可奈何,退回楚望台,打听消息。熊秉坤告诉他,蔡济民、阙龙、王世龙等人攻打署前门,都尚不曾得手。(实际上阙龙已经中了一弹在咽喉,被抬到医院去了。)张鹏程于是又邀了一百多人,跟他出了中和门(居正说是出望山门),到南湖去设法叫混成协的炮队第二十一营来。

他和这一百多人,路经马标(第八镇马队第八标)的所在地,赶上了先他们而出发的金兆龙一批与马明熙一批(马明熙这一批是蔡济民派来的)。而且,遇到了炮队第八标的全标同志。炮队的同志正在向马队第八标外面放炮,告诉标内的同志,叫他们出来。

原来邓玉麟在当天正午,便已不惜辛苦,从汉口绕道汉阳,过长江走到了南湖。他把炮队第八标的代表徐万年与瞿殿臣等一共九个同志一齐找到,开了一个会,告诉他们:自从蒋翊武、彭楚藩、刘尧澂、杨宏胜等人被捕(他还不知蒋翊武已经脱险),群龙无首,他自己特地到了汉口找孙武,孙武的伤很重,但没有性命危险,孙武叫他转告大家,一切仍按照原定计划,改在今夜举行。然而,他不能确定塘角的辐重营同志是否接到今夜按照原令起义的通知(虽则他也托了人,

这是他职责所在,他是革命军临时总司令部的“交通”)。“无论如何”,他说,“我在今夜到你营门口放枪,请你们届时率领同志到我放枪的地点集合。”

到了晚间,还不曾到半夜,邓玉麟忽见塘角的火光,欣慰之至,赶紧走到了炮队第八标的南营的门口,大放特放。营内的蔡汉卿打了赤膊,从床上跳了起来,大声高叫,“同志们,起来!”他的队官(连长)柳百顺将他阻止,被他用脚一踢,踢出一丈以外。别的官长吓得纷纷逃命。他集合二十多位同志,拖了一尊炮出来,与邓玉麟见面。

邓玉麟陪了他们到标本部,向天发炮,出来了几十人。邓玉麟一看,说:“糟啦,太少!”蔡汉卿说,“这个容易!”说罢,他便向右队(第三连)放起真炮来,果然右队的官长被吓得让革命份子自由出来参加。然后蔡汉卿又向第一营射了三颗真东西,第一营的同志也得了自由。这两批,连同营本部的一队(番号不明),蔡汉卿的一队,统共拖出十二尊炮。全标革命同志,推徐万年当总指挥,浩浩荡荡,向中和门的方向进发,路经马标所在地,向马标开炮,却遇到金兆龙、马明熙、张鹏程所率领的三批来迎的队伍。

马队第一营与第三营也是吃了真东西,才有同志出来。(第二营不在武昌。)

这一大批人马,有步兵、骑兵、炮兵,军容甚盛。他们由中和门进城,占了中和门城楼与蛇山,把炮架起,对着总督衙门轰。同时,分了一些同志与炮,由李作栋率领,到总督衙门前门,帮助蔡济民、方维等人。

张鹏程也带了他所率领的一百多人,再度去攻督署。马云卿在衙门前受了重伤。

这时候,来攻总督衙门的各部队同志,越来越多。然而,敌人有机枪,而革命军没有。最勇敢的莫如蔡济民,蔡济民的一队冲了很多次,均被机关枪挡住,而且被逼得退了下来。然而,机关枪的声音稍有间断,蔡济民就领着人又冲了上去。

许多队伍挤在一起,犹如乌合之众,进退极为不便。而且,缺少一个阵地上的指挥官,各干各的,不像是规规矩矩,打硬仗的样子。因此之故,虽则有了炮火助威,依然毫无进展。

(六)

忽然,来了一个“临时总指挥”。谁呢,吴兆麟!

吴兆麟自从逃离了军械库,犹如无家可归的游子。他知道,倘若去第八镇司令部向张彪报告,准被军法从事,治以失守之罪。再回来向熊秉坤“归队”,也无甚颜面。因此,他徘徊在楚望台下的小街小巷,躲躲闪闪,却被他的一位部下汪长林发现。

汪长林连拉带劝,把他领到军械库见熊秉坤。熊秉坤与留守军械库的多数同志,一见他来,都十分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虽则离开了革命阵营,却从未做过出卖革命同志之事,而且在参谋班当过学员,军事学识高人一筹,不仅是官阶(连长)比大家高而已。(熊秉坤与汪长林均是排长。)

有人提议请吴兆麟当临时总指挥,熊秉坤首先赞成。吴兆麟说:“必须大家肯服从我的命令,不服从的军法从事,我才能答应。”大家说:“绝对服从你!”于是,他立刻就了职。第一道命令:令汪长林带第八工程营前队(第一连)一二两排,攻总督衙门前门;派邝汉卿带右队(第三连)一二两排攻总督衙门后院。不久,听说汪长林被阻挡在保安门正街,邝汉卿畏缩不前,带队回营休息。吴兆麟发出第二道命令:令熊秉坤率领第八工程营后队(第四连)全队,主攻总督衙门前门,马明熙、徐明达、彭纪麟,各率队伍追踪跟进,支援熊秉坤;调伍正林一支兵沿着城墙,向望山门前进,向清军侧击;黄楚楠率领第八工程营左队(第二连),经王府口,小都司巷,攻衙门后路;姚金镛率领二十九标三营右队(第三连),跟进应援;陈国桢率领炮兵,带两门炮,架到保安门城墙之上,由曹飞龙率领第八工程营左队(第二连)兵士一排,加以掩护,第三道命令是:令方兴、李翊东、李鹏升统率测绘学堂学生与混成协辎工两队同志,留守军械库。

吴兆麟自己也亲临前线,就地指挥。

前线的士气立刻高涨。然而,依然无甚进展。

蔡济民动了肝火,灵机一动,想出了放火的主意。说干就干,来不及向临时总指挥请示,就吆喝着叫衙门附近的老百姓搬家。一会儿,他就放起火来。张鹏程见到此计甚妙,也在王府口放起火来。吴兆麟于是也下命令,在水陆街、保安门、王府口三处放火。顷刻之间,把总督衙门附近一片地方,照耀得好比白天一

样。

蛇山楚望台的炮,开始发生作用:目标清晰,百发百中。

这么一来,大家都上了劲,一齐冲锋。熊秉坤临时组织了一个敢死队,连他自己,共有三十三人参加。这敢死队真是厉害得很。一冲,便冲进了东辕门,把敌人逼去了西辕门;又向西辕门冲——不幸,被敌人放在衙门大堂的机关枪手,把三十三人切成两截,马明熙等十儿人陷入西辕门敌人的重围。

敢死队的另一队员纪鸿钧当机立断,拿起一桶煤油,跑进门房去烧。一时门房火起,延烧到大堂,把大堂的机关枪手吓走。——可惜,纪鸿钧本人也被烧死。

瑞澂在“上房”早已六神无主,心惊胆落。他向在他旁边的陈得龙说:“可真厉害啊!倘若一颗炮弹又打到这里,可真不得了!”话刚说完,果然就有一颗炮弹落在上房院子的院门口。大堂上的火虽则还不曾烧进来,他已经下了决心,赶快逃命。

他派人在后院子的围墙打一个洞,带了卫队一排,鼠窜而去,到长江边,上了楚豫号兵船。他一走,守衙门的清军一哄而散。衙门被革命军占领。

再说张彪。张彪听到本镇第八工程营与混成协的辎工两队相继起义以后,曾经去了大都司巷司令部一次,用电话传谕各部队长官,“竭力维持”。他也架起了机关枪,在司令部门口想放几下示威。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机关枪的撞针早被“革命”党偷走。于

是他爬上保安门城墙,张起用白布写成的布告:劝革命官兵回营,既往不咎。城门下的革命同志杀来,他命令武装消防队冲锋,冲不出所以然。他赶快回文昌门他的公馆,听说混成协的炮队全体士兵响应了革命,又听说总督衙门已被革命军占领。于是,他打电话出去询问,发现电话线已被割断。最后,他派人把家眷送往外埠,自己跑到平湖门外第八镇的辎重营,带了这一营人去汉口,扎在刘家庙。

黎元洪呢,虽则是官居混成协的统领,在武昌城内仅有一营步兵(第四十一标第三营)驻在宾阳门附近。马炮营与工辎二队均在城外。他听到自己的工辎两队响应第八镇的工程营起义,十分恐慌,赶紧到了这宾阳门内的第三营,亲自镇压。他下令紧闭营门,而且亲自砍了想冲出营门的革命份子邹玉溪;阙龙等人却跳了后墙出去。他于是派兵站上营墙,下令说,“敌人来了,就开枪。”不久,他又下令,“敌人来了,不许开枪,用好话劝他们走”。最后,他下令,“敌人来了,就退守营房。”这时候,传来了炮声,他就离开四十一标第三营,逃到黄土坡,一个刘参谋的家里。

他走了以后,在天刚黎明之时,四十一标第三营的兵士都加入了革命阵营。

八月二十日(阳历10月11日)正午,整个的武昌城入于革命军之手,包括布政使衙门及其所属的官钱局等等。库存的银子、钱票等等,共值四百万元左右,不曾有人抢夺或偷窃。

(七)

革命军的领袖们,从上午起,已经在省谘议局举行会议。当前最大的困难,是没有领袖。蒋翊武,已去天门。孙武,谦称面伤未愈不便出来领导,情愿让贤。刘公,谦称不懂军事。原已事前选定的副都督刘英,远在京山。张振武,有胆有识,大家属意于他,而他力荐黎元洪自代。黎元洪虽则无能,却颇有忠厚长者的虚声,张振武以为倘若能得此人作为形式上的领袖,便可以安定军心民心,号召远近。

大家没奈何,只得抓了黎元洪来,于下午一点四十分到达。大家请他当都督,黎表示绝对不就;请他在布告上签一个黎字,他也不肯。结果,还是李翊东替他代签了。大家把布告抄成若干份,贴了出去。

黎元洪被留在“都督府”(谘议局),饮食起居,都有同志们热忱招待。他两天两夜不吃饭,不说话,看样子是想以一死报清朝了。

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在汉阳的混成协第四十二标第三营响应革命,占领了汉阳。当天正午,混成协第四十二标第一营也响应革命,占领了汉口市区。

蒋翊武也在这一天从天门回到了武昌。他召集革命同志开会,决定了先在汉口成立一个军政分府,以詹大悲为主任,何海鸣为副主任,慢慢等候黎元洪

回心转意。

黎元洪在二十二日,回了一半心,转了一半意,他吃饭,说话,而且剪了辫子。(这一天,刘英在京山起义,占了京山,也占了天门。)下午六时,蒋翊武等人再开会议,请黎元洪参加。黎元洪出席了这一次与以后各次的会议,这一次的会议,正式规定了军政府的组织,军政府以黎元洪为都督,下设谋略委员会(委员蔡济民等十五人),参谋部(部长张景良,副部长杨开甲、吴兆麟),军务部(部长孙武,副部长蒋翊武、张振武、吴绍忠),政务部(部长汤化龙,副部长张知本),外交部(部长胡瑛,副部长王正廷)。

军政府的革命军,设四个协(旅),分别以吴兆麟、杜锡钧、陈炳荣、张廷辅为协统(旅长)。汉口军政分府也有一个协与一个团,以胡廷佐为协司令,黄继超为团长。

二十三日,居正与谭人凤到达汉口;晚上十点钟,来武昌见黎元洪与军政府各领袖,商谈一切。这一天,军政府议决增加一个协,以熊秉坤为第五协协统。第一协协统吴兆麟调回,专任参谋部副部长,遗缺以标统宋锡全升任。又加设敢死队四大队,分别以方兴、马荣、金兆龙、徐少斌为大队长。

二十四日,由于据报清廷派荫昌当钦差大臣,率领第二镇与第六镇南下,黎元洪第一次以都督的名义颁发作战命令,令第二协协统何锡藩(原任杜锡钧调差)赴汉口,准备攻刘家庙与大智门,第一协协统宋锡全负责支援,并防护汉阳,第三协协统陈炳荣与第四

协协统张廷辅保卫武昌,第五协协统熊秉坤积极准备赴汉口增援。这命令颁发之时,张景良一意阻挠,用他的头颅撞黎元洪,居正主张军法从事,蔡济民为他缓颊,于是暂行逮捕下狱。张景良原为第八镇第二十九标的标统,根本反对革命,为了怕死,才勉强就了参谋长之职的。其后,放了出来,被任命为“指挥官”,在汉口作战,又因私通敌方,于九月初六日被汉口军政分府主任詹大悲下令逮捕枪毙。

八月二十五日,经由居正建议,军政府举行了一个军民大会,祭告黄帝,由谭人凤授剑给黎元洪,黎元洪宣读誓师词,居正演讲同盟会革命之精神及创立民国之意义。全体在场军民三呼中华民国万岁,四万万同胞万岁,黎都督万岁。

九月初一,湖南光复,焦达峰被选为都督,派兵到湖北来支援军政府。九月初五以后,革命军又陆续增设了三个协,共为八个协。

初七日,黄兴到达武昌,十三日被军政府任命为总司令。这一天,居正在汉口以督战员的资格参加作战,受伤。

黄兴在汉口连败敌人,其后因敌方于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之后,一再增兵,而失掉汉口、汉阳。然而汉口汉阳失掉之时,陈其美等人先后光复了上海与苏州南京,使得武昌转危为安。黄兴离职东下,黎元洪也退驻武昌城外的洪山,赖有蒋翊武再度出任总司令,在武昌苦力支撑,最后的胜利,终于被革命同志取得。十七省的代表在南京集会,公举孙文(中山先生)为临

时大总统。孙先生于民国元年元旦在南京就职,替中华民族开创了新的历史纪元。武昌起义的先烈与先进,大功告成。

(1961 年)